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回归人间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毛泽东回归人间

序

魏 巍

石玉山同志是长于写随笔小品的作家。近些年来，他热情很高，写作甚勤，收获颇丰。一部《石玉山随笔》刚刚出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而撰写的，这部《毛泽东回归人间》的新集子又将付梓了。

近年以来，石玉山连续在《光明日报》、《中流》杂志上发表了五谈《读一点毛泽东》的文章，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我国政治思想战线开始发生转机的时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造成的迷雾需要进一步廓清的时候，石玉山同志能够提出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和特别适时的。这无异在百万军中登高一呼，必能激励革命战士奋然前行。

这部书的名字叫《毛泽东回归人间》。题目很有意思，是对当前一种社会现象的概括。既然讲“毛泽东回归人间”，那就是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一定程度上是失落了，或者至少是冷落了。当然，在坚定的革命战士心中，不论风云变幻，潮起潮落，毛泽东仍然是毛泽东，是任何时候也不会失落的。可是在某种社会气氛的影响下，前几年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有的城市连买一本毛泽东的“两论”都困难。甚至有的步兵团竟找不到一套完整的《毛泽东选集》。马列书籍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跑几家书店找不到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事也出现不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作为人民共和国和军队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竟遭如此冷遇，也足以使人感慨的了。

其实，这些事都极平常，是不须挂齿的。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前些年，一些报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贬损、嘲讽和辱骂。尽管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作出了庄严的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作了历史性的分析和结论，但是某些人、某些报刊完全置决议于不顾，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仍以指名和不指名的方式，进行阴一句、阳一句的诋辱和攻击。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一些人胆子越来越大，此种邪风恶浪越掀越高。一直到 1989 年春夏之交发生动乱达到高潮。安徽有一个刊物叫《百家》，那年发表过一篇极其下流的文章《毛泽东现象》，其中对毛泽东进行的肆意诬蔑可谓登峰造极了。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人民是公正的，客观事物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的。而且有些人和事，往往距离得稍远一些才能够看得更清晰；一些真理也需要经过反复地检验和比较才能够显示得更鲜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是这样。生活毕竟是严厉的教师，它可以告诉人们很多的东西。随着岁月的推移，在不知不觉中，事物又悄悄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看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威望，又在回升了，又在由冷变热了。比较明显的是青年人。听说在大学里一些青年人又在开始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和马列著作。书店里毛泽东的著作以及毛泽东的传记、纪实文学相当畅销。到毛主席纪念堂参谒的人也显著增多。据说平时每天平均两万多人。而每当毛泽东诞辰或逝世的那一天，全国各地自动赶到纪念堂来参谒的人就更多了。由此也就可想一般了。

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蕴含着多么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教训呵！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俗话说，“宝剑锋自磨砺出”，这话不错。同样的，真理之剑也要经过

实践的反复磨砺，才能显得愈加锐利和明亮。近年来国际上的一系列事变，已经用惊心动魄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的许多论断，是何等的正确！如果漠视或者否定这些，将会吃多么大的苦头呵！真理是可贵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以及以鲜血为代价获得的真理，无疑是更加宝贵了！

我从许多事实觉察到，敌对营垒中的人，有时候比我们自己的人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清楚。比如说那个方励之吧，他在讲话中就从来没有忘记过“批毛”。他说：“一定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革。不能绕开这个关键问题。”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革，这种改革还能是什么样的改革？就是完全复辟资本主义。他很明白，毛泽东思想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也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思想对于革命的人民是如何值得珍贵了。

这里，我衷心祝贺《毛泽东回归人间》的出版。我想，它能够给予我们的，就正是这些最珍贵的东西。

哀悼石玉山同志

魏巍

《中流》1993年第8期发表的《毛泽东百年祭》一文，是石玉山同志最近寄给我的。另外，还附了一封短信：魏巍同志：

您好！在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为《中流》写了一篇文章叫《毛泽东百年祭》。这是我前几天在医院住院时写的，主要是写的自己的认识和心情，顺便也回答了一点问题。现在打印寄给您，在不影响您的写作和健康的情况下，请过目一下，望能求得您的指教。

顺致

敬意

石玉山6月5日

当下，我便读了这篇文章，认为是一篇极其诚挚的富有感情的散文。玉山同志近几年来有志于杂文，写此类散文较少，这次一开手就写得这样好，使我很为高兴。正想给他打一个电话，意外的事情发生了。8日早晨，我刚刚吃过早饭，妻子告诉我，石玉山的夫人周杏梅打来电话，说石玉山病危。我登时吃了一惊。我说：快买些东西，去看看他。因为他上次住院，怕打扰我，就没有告诉我，我也没有去看他，颇觉过意不去。妻子迟疑了半晌，才说：不要去医院了，人已经走了。事情竟来得这样突然，使我一时无法接受。我说：这不可能！他平时身体不错，怎么会这样快就完了呢？

我和妻子很快赶到军事科学院他的家里，看见他的女儿早已哭成泪人，周杏梅脸色憔悴，勉强支持着自己。我问起玉山逝世的情况，杏梅强忍着悲痛说，昨天下午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吃了12片硝酸甘油还过不去。后来送到医院，经过抢救，多少缓解了一些，可是转移到病房时，人已经完了。

经过详细了解，才知道，他上次住院患的就可能是心肌梗塞，不过没有这次严重。按说这种病，至少4个月后才能出院，仅仅28天他就出院了。上面讲的那篇文章就是他住院期间带病写的。出院以后，让他全休一个月，他没有听，立即又投入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那套丛书的编辑工作。编辑部的同志们说，他的家距编辑部是一个上坡，他每次来都是气喘吁吁的。同志们就劝他，不要来上班了，有稿子就在家看吧。可是他仍然去上班。本来预定8号上午还要去参加一个会，可是7号下午，病就突然发作，这次是大面积的心肌梗死，遂至一搬不治。这样，上面讲的那篇《毛泽东百年祭》，也就成为石玉山的最后遗作，也是作者最后献给这个世界的一片赤心了。

石玉山同志今年61岁，河北省束鹿县人，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入党的老同志。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经受过战争和基层的锻炼，后来长期做部队报纸的编辑工作，又从事我军军吏和战史的研究工作，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离休以后，仍孜孜不倦地忙于写作，一天也没有休息过。去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经党中央批准，将由毛岸青、邵华同志主持编辑出版一套丛书，名叫《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石玉山同志又彼聘请到这个编辑部里，以全副热情投入这项工作。他为人正派，对同志谦逊热情，尤其工作兢兢业业，有一种拼命精神，以致最后抱病工作，以身殉职，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

近些年来，玉山同志很关心我国青年的思想问题。从1979年以来，他在首都军内外报刊上写了大量的杂文、随笔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

《石玉山随笔》，于 1990 年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前言中曾说：“从林林总总的题目上看来，笔者写作的题材是比较广泛的，……好像是用笔在打烂仗。其实不然，我的内心还是有一个总的企图的。那就是以青年朋友为主要对象，面向实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力求从生活、工作、学习、思想和知识海洋的更多的方方面面，为他们提供些有益的精神食粮。不过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排除一切的干扰，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沿着人生的宽阔大道，健康地成长，不断前进。”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他总体的思想了。由于这本书有好的思想内涵，又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写得生动活泼，我很高兴地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石玉山同志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诚笃的信仰者。1990 年他为《中流》写了一系列《读一点毛泽东》的文章，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今年举行的“菊花奖”《中流》评荐活动，曾被读者推荐为 12 名受表彰的作者之一。作者将有关毛泽东的同类文章，结集为《毛泽东回归人间》，已经交给出版社了。不想这本书还未问世，他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如果他再活几年，肯定是会作出更大贡献的。这是特别令人痛惜的！

由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长期斗争，尤其是连续 22 年的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胜利之后又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民群众已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应当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了根的。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外部帝国主义文化的广泛渗透下，在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已经大大削弱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有些人已经渐渐模棱了，疏远了，甚至动摇了和有名无实了。在这种情况下，像石玉山同志这样笃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深情地执著地追求真理，是多么地可贵呵！正是从他们许许多多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真正的希望。

1883 年 6 月 18 日

毛泽东百年祭

一个不寻常的日子——12月26日。

在百年前的这一天，您——一轮红日从韶山冲悄然升起。从此，这一天就被铭刻在人类历史的纪念册上。

随着时光的流逝，您由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渐渐的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棵中华民族的参天白杨村，一位东方巨人。

您在世的时候，曾不断地为别人祝寿，为自己的战友祝寿，还为外国朋友祝寿。但从不要别人为您祝寿。

您同一般人一样，也过自己的生辰日，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地，有时在旅途的火车上，把身边的工作人员或家里人招在一起，只不过是共同为您吃上一碗“长寿面”。

然而，今天在您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就由不得您老人家了，从中央到地方，人们都要用他们的真心实意，来隆隆重重地纪念一下这个不寻常的日子——1993年12月26日。

只要读一读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想想中国的过去，再者看新中国的今天，就会懂得您毛泽东是何等之伟大，何等之英明。

您是我们这支军队、这个党和我们这个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是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做到了很好地结合，把一个被人称为劣等的民族，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海中解放出来。从此，中国——母亲，一个天资玉质之美的丽人，再不是受人欺负、面貌憔悴、衣裳褴褛、污秽不洁（方志敏语）的“叫化子婆娘”了。在20世纪的中华民族的功劳簿上，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同您相比。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本来也不该忘记。

在危难关头，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使中国历史上的这条险些沉没的航船，重新驶入正确的航道。

战胜左右倾和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之后，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您大呼一声：刀下留情！解救了人民英雄刘志丹。不仅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而且拓展了一个新的更大的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主张革命大本营应离开陕北这个贫穷的地方，到华北去，到富足一点的地方去。您却死活不同意，在说服不过的情势下，您表示了您的决心：要走，你们走，我一人留下！

结果证明您的战略眼光高人一筹，您是对的。

周恩来同志曾说，您“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在这块看来不起眼的、而对革命有着许多有利条件的黄土地上，曾孕育和产生多少宝贵的革命财富！

您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成为全党最优良的作风，至今应该大大发扬。

这个时期您创造的理论财富，无论怎样估价它，都过高。

它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震撼了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您紧接着成功地领导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以您为表率，养成了十分良好的社会风尚。尤其令人敬佩的是，您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顶住了国内外敌人和一切反动派的破坏、进攻和封锁。

现在有人竟埋怨您不搞改革开放。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解。美帝国主义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还将其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国民党蒋介石不停地叫喊反攻大陆，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其他仇视新中国的外国反动派，也在卡我们的脖子，在那九死一生的包围中，我们怎样开放，向谁开放？

您不怕帝，不怕修，不怕鬼，不怕魔。因为有亿万人民群众在支持、信赖您，更有千真万确的真理在您手里。您又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因此，那些豺狼虎豹，尽管对您恨之入骨，在您面前张牙舞爪，也无奈您何。

您对人民的敌人，一生都是那样恨，而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是那样的爱。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吃不上肉，您也吃不上肉，群众浮肿，您也浮肿。您最喜欢的、而且一生努力实践的，是鲁迅先生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百年来的历史特别是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着一个真理：

没有您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您的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您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然而，您却是如此地谦虚。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四周要刻八块浮雕，有人提议其中一块表现您领导的秋收起义，您不同意，坚持说：“还是刻八一南昌起义！”大家要读您的著作，您坚持说，不要光读我的著作！人民喊您万岁，您喊人民万岁！

您逝世后，您对这个世上的任何人，都没有任何一点人为的约束力：然而，人们依然一如既往地从内心里敬仰您。您可知道，有多少歌唱家在歌唱您，有多少学者在评述您。然而您却是一部永远唱不完、颂不尽的美丽动人的诗篇。更重要的，您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理解您，信赖您。

为纪念您的诞辰百周年，全国各界将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毛岸青和邵华将主编一套30本计450万字的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意在反映他们和亿万人民群众的心意，从诸多方面反映您老人家的光辉成就与功绩。几十位上百位的专家、学者、作家、跟随您战斗工作大半生的老同志和在您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积极参加到这项工作中来。这将是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然而，目前在社会上的少数人中，对您依然是众说纷坛。尽管一小撮敌人说您是秦始皇，是暴君，是独裁者、权术家，是当代中国的罪人，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您头上。而人民的绝大多数，对您老人家是敬慕的，他们采取的是公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曾经跟随您战斗大半生的老同志（其中包括在政治运动中被错误对待、受过委屈的），总是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述说您的功德、韬略、才华和远见卓识，他们说：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一位伟大人物能赶得上您。

那些研究撰写或歌颂您的学者、专家、作家或文学艺术工作者，每每谈起您，往往是那么情不自禁地伸出大拇指：毛泽东，真了不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与骄傲！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您一生的经历、思想、实践、生活、学习和品德与人，全方位地、总体地认识了您。

曾经在您身边工作的那些同志谈起您，更是激动不已。他们称您，不仅是亿万人民的杰出领袖，也是他们的师长、亲人。谈起那些感人的事迹常常使他们热泪盈眶。这又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同您朝夕相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亲身感受到的是一个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

实的毛泽东。

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无限怀念、崇敬您。“恩人”、“救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等等，那些发自内心的语言，说了多少年，至今说个没完。这是为什么？

因为您为他们创造了绿色——春天，
您给了他们希望——温暖；
您给他们树立了理想——信念。

有人说，现在的中老年人对您老人家的感情和认识，那是板上钉钉，没说的，青年人和少年儿童就不行了。其实并不尽然。

延安北关小学 12 岁的秦媛媛说，她最崇拜的伟人就是毛泽东。

总之，有人说您好，有人说您不好，有人褒您，有人贬您，有人理解您，有人不理解您。我想，这对您来说都无关紧要，您如若在天有灵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

您在世时，一次有人向您反映：××人说您的坏话，要定成“反革命”。您听了不以为然，说：无非是骂我是秦始皇，人家受了压，心里有气，说几句气话怕什么，通通不算数！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就是对于真正的反革命，您往往也是采取改造的态度。您说，我们可以把“反革命”这顶帽子拿在手上，他只要能悔过自新，重新作人，就不一定给他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您的理由是，反革命分子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还要有子孙后代……

您的心胸是一个大海，在这片宽大的海洋中，似乎任何庞大的舰船部不会相互撞击，都不会沉没似的。

您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您说您自己是三七开。我作为您统领下的一名战士，为您取得的每一个巨大成就而欢欣鼓舞；也为您晚年的某些失误而感到遗憾和不安。然而我始终坚信，中外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英雄和伟人，拿破仑、林肯、秦始皇或成吉思汗等人，可以说哪一位英雄或伟人的功勋都不如您毛泽东。

每一个人的生与死，都是一样的。

来时不会带来什么，去时也不会带去什么。

然而不同的，是去时为人民留下些什么。这一点您同一般人就不大相同。

您毛泽东给人民留下的是无比珍贵的、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

有人称自己是一只为光和热而斗争的飞蛾。飞蛾为了光和热扑打而死的精神是可贵的。

而毛泽东您可不仅仅是这样一只飞蛾。

您是天空高山的一只雄鹰。

您率领人民群众推翻了一个冷酷而黑暗的旧世界，创造了一个火热而光明的新世界。您为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苦苦战斗了一生。您把人世间最珍贵的情感，奉献给了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使这个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民族，站立起来了，永远地站立起来了。为此，

您不愧为一代巨人！

无愧为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丁玲同志在歌颂宋庆龄同志的一篇短文中说：“有人说上帝造人，但上帝能造出您这样美丽的灵魂吗？”

我们不妨借用这句话：上帝创造了人，但上帝能创造毛泽东这样的人吗？不能，一万个不能。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么是谁创

造了您这位巨人，这位英雄呢？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
是中国革命的巨大洪流，
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最近一个人对我讲现在可不是毛泽东那个“左”的年代了。这番话令人感慨，也令人深思。我认为绝不能把毛泽东同“左”的错误划为等号，认为“左”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就是“左”。如果有人硬是列出这样的公式，那是错误的。因为它不符合实际，党中央也从来没有作出过这样的结论。

毛泽东晚年确实有过“左”的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失误，那些都可以说是好心办了错事。但从根本上讲，您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您最讲实际，最爱科学，最尊重的是客观规律。

可以说，您一生都致力于探索和认识客观规律。

为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您不是成功地探索到走农村包围城市、搞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规律吗？

为使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尽快脱离贫困，富裕起来，您提出要学我们不懂的东西，又继续探索和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有的虽然是失败的，付出了巨大代价，但那毕竟是探索、是试验，目的还是找到客观规律。

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曾三起三落，被孤立、被罢官、不被理解，受到过委屈；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您那伟大形象遭到了歪曲。但实践证明您是对的。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您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搞拜金主义等等，依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有人断然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是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句号，一个终结，这在某些人的观念中也许是事实。但它是错误的，或者说是一种误解。邓小平同志说得好：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人们纪念您毛泽东 100 周年诞辰，正是人们进一步深化对您的认识、学习和研究的开始！

目前，世界格局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但我们坚信，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无论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不会改变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都不会影响您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都不会动摇您给人民指出的对历史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念。

您的英明和伟绩将与神州同在，与日月同辉。

您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过时。她已经列入全党始终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之中。只要认真坚持下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杆大旗，就会永远矗立在世界的东方。

1093 年 5 月 8 日写于 309 医院五病区 17 床

敬爱溶于评价中

毛泽东同志曾提倡过“读一点鲁迅”。这样做，对于提高全党全军全民对鲁迅的认识、对于抵制否定鲁迅的那种思潮的蔓延，无疑是有益的。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坚持“读一点鲁迅”。然而，今天我们还应该倡导的是读一点毛泽东。

读一点毛泽东，当然包括毛泽东所写的全部理论著述，继续阅读是肯定无疑的。笔者在此所说的读一点毛泽东，除了读毛泽东的著述以外，着重在侗导读有关毛泽东的传记文学作品和有关的回忆文章。这一类的著述不少，过去有一些，近来尤其日渐增多。其中不乏有歪曲、猎奇或平庸之作，但有些作品是好的，是很值得一读的。例如：美国作家特里尔著《毛泽东传》、美国作家施拉姆著《毛泽东》，我国作家权延赤编著《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红墙内外》，以及曾跟随毛泽东多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写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包括电影《巍巍昆仑》等。这些作品中所记述的事迹和观点虽然不尽相同，某些章节的内容略有重复，有的内容也不尽实际，但仍不失为佳作。它们各有其特点，大都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生动事实，形象地概括了毛泽东的一生。证明他不是神是一个人，是一个大写的人。通过阅读这些作品不难体会到，其中有许多东西是没有写进毛泽东著述里面的毛泽东思想；它既是文学著述，更是全面正确的认识与评价毛泽东一生功过是非的良好依据。

有史以来，无论哪个阶级，对本阶级的伟人领袖，在他们寿终正寝之后，都将会作出公正的认识和评价。我们无产阶级对待自己的伟人和领袖尤其应该如此。我们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做的。

就以马克思说起吧。1883年3月14日，就在他停止思想的这一天，恩格斯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信给李卜克内西，简要叙述了马克思病逝的经过之后，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都应当归功于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直到现在还会在黑暗中徘徊。”这种评价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是大得人们赞同的。

由此，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邓小平还讲过这样的话：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在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下，我们党还会在黑暗中苦斗。总之，全党一致确认这样一个铁的事实：“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请看，这些闪光的话语是多么深刻啊！这就是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自己的新纪元，如果没有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记得，1949年10月1日，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自己当家做了主人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的重重压迫和长期黑暗生活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不能不庆幸得到毛泽东主席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在这几部传记作品中，就记录下陕北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说过的类似的话。以我看，这些话，直到今天，也还完全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意的。在此以后的多少年来，人民一想到翻身后的地位和过上的幸福生活，不是很自然地就想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想到毛泽东和他的一些老战友们吗？

然而，究竟如何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在一些人的内心世界中并没有真正解决。今天认真读一读有关他的传记著述或许有益。

当然，正如传记中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毛泽东是人，而不是什么神。在他的晚年同样不可避免地犯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错误，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因为这些错误给革命、给国家、给人民造成了一些损失。在谈到他老人家的历史功勋的时候，不能不正视他的那些错误。然而，在谈到他的错误的时候，又不能不首先肯定和感谢他老人家为人民建立的永不磨灭的伟大功勋。他的功勋总还是第一位的，失误毕竟是第二位的，绝不能以一眚掩大德。在对待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上，我以为感情、立场和态度是极为重要的。不妨学一点鲁迅。鲁迅对待刘半农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说：“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从此，我们会不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呢？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从传记中可以看出，他一生都是公而忘私的。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是一样的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始终没有忘记人民群众，始终没有忘记他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他曾为人民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所遭受的苦难流过眼泪，人们吃不上肉他也不吃肉，人们浮肿，他也浮肿，我读着这些感人肺腑的事迹不由得几次也掉下了眼泪。他的思想和模范行为影响着中国的一代人或几代人。因此，我们对他所犯错误的立场、感情和态度，也应该是同志式、朋友式的。而不能是其他。黄克诚同志说得好：在对待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上，我们决不能感情用事。

对毛泽东的敬爱应该溶于正确的认识与评价之中。

在此，我还想起鲁迅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的短文讲的一桩趣事。他说：“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鲁迅说，因为“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伺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对待毛泽东的一生，难道有谁学会那位照相师吗？可以断定，我们党和在党领导下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对于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了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其他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决不会采用类似照相师那样的做法，更不会学苏联的赫鲁晓夫。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直到毛泽东，人们将永远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评量他们的功过，去学习他们、去怀念他们，并运用他们的思想和理论于共产主义的事业中。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一时间否定一切的歪风四起。他们要否定新中国成立40年来的建设史，要否定建国前22年的革命战争史，甚至

要否定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其中心就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即否定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也包括否定毛泽东，以达到他们使中国全盘西化的目的。我们说，历史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否定，毛泽东也不能否定。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层次、更高的角度上去认识毛泽东。他在晚年虽然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但在一定意义上讲，他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骄傲，一个时代的象征，他同我国几十年的革命史、同党史、军史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史、建设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指导我们前进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说“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邓小平语）。在纪念毛泽东 90 周年诞辰的时候有一位老作家曾说过这样的话：有的人他今天否定毛泽东，明天就要否定共产党，后天就要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紧跟着就是“还乡团”来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那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一场天下大乱。事实不正是要这样的演变吗？

由此可见，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是一件顺乎民意的大事，是关系着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事业及他们为我们树立的光荣传统能不能继承下去的一个问题，也是关系四项基本原则是不是真正落实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涉及文学艺术方面能否正确贯彻“二为”和“二百”方针的一个问题。故此，应该把它看作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项重要内容。

话又说回来了，对于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每个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评价。或者是全面肯定，或者是全面否定，或者是肯定他应该肯定的，否定他应该否定的。究竟哪一种更合乎其实际，更合乎人民的心意，虽然党中央已作出了公断，但在一些人的思想上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有一点是应该明确的，那就是对于毛泽东如果采取敌对阶级的态度和做法，那人民是不会答应，也是不会原谅的。

否定一切，在我国政治思想领域中或历史研究领域中出现这种现象，正是从否定毛泽东这里开始的。他们否定毛泽东有一个公式：即毛泽东的功绩与过错加起来等于零，或者叫他的前半生是成功者，后半生是失败者，或者叫他的前半生给中国带来了幸福，后半生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有的人在“但是”后面作文章，即“肯定”之后是全盘否定。似乎是两点论，实则是一点论。有人打着彻底清除封建主义的旗号，来全盘否定毛泽东。说法和做法不一，目的一致，就是在世界大气候和我国小气候的影响下，全盘否定毛泽东，从领袖人物身上打开缺口，进而达到全盘西化、卖国的目的。令人奇怪的是曾在—个时期，有人公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却无人吱声；攻击咒骂毛泽东的人竟成为英雄，竟至出现天安门前涂辱毛主席画像那样的事件。

最近几年以来，特别是 1981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毛泽东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评定以后，对毛泽东的研究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毛泽东晚年的实践和晚期思想的研究在国内更有新的进展，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出现了不少好的论著和专题研究文章。这是非常必要的，有益的。然而，现在看来，对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对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有那么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一种是好心的人，是想通过批评或者叫清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使毛泽东回到毛泽东本来的面貌，使党的事业健康的发展，一种是坏心的人，是想通过批评或者说利用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全盘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党的一切，企图使

党的事业倒退、垮台。人民欢迎的是第一种人，反对的是第二种人。这第二种人虽然是极少数，但制造舆论的能量不小。他们打的虽然是“启蒙”、“扬弃”、“更新”、“超越”等口号，但目的仍是在于全面否定毛泽东，直至否定人民革命的一切……。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对他本人来说，的确是个悲剧。但是更大的悲剧莫过于对他的刻骨仇视、全面否定，以及因此对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的损失。

当然，那种仅凭朴素的阶级感情来认识和评价毛泽东，不承认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一些错误，全面肯定的做法也是不对的。那样对党的事业也是不利的。我十分赞同李希凡同志最近在中宣部召开的首都文艺界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后的晚年时期，的确犯有不少错误，但他在领导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中，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小平同志最近特别强调指出他在党的第一代领袖中的核心作用。可是近几年来，一些小丑竟然全盘否定他的功绩，以无理谩骂、侮辱他去取悦敌人，这是很不正常的。”（见《光明日报》，1989年7月18日第2版）我看，这话不仅适用于公正地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也适用于公正地对待毛泽东一生。这是今天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一个典型范例，是符合《决议》精神的，要趋向这种认识和评价，的确是有一个立场、方法、态度和感情的问题。做到这一点，需要迎着否定一切的风潮，读一点马列主义，读一点毛泽东。

铺垫人类进步的阶梯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述，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十年流血奋斗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体。它不但铭刻着毛泽东一生斗争的心血汗水和他科学的思想体系，还标志着中国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所走过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它不但记录着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过去，又在一定意义上指出了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未来。

俄国著名民主主义战士、思想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赫尔岑（1812——1870）谈到书的时候这样说：“书——这是这一代对另一代的精神上的遗训，这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这是行将去休息的站岗人对接替他的岗位的站岗人的命令。”他还说：“书本——它是未来的纲领，因此，我们要尊重书本。”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述，所蕴含的理论和思想，不但指导我们从胜利走向了胜利，而且它的确又是一部难能可贵的“遗训”、“忠告”、“命令”，是我们奔向共产主义“未来的‘纲领’”。由此可以说，它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书，它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哲学著作和贯通在他的全部科学著述中的深邃的哲理，更是我们凭之战斗，开拓事业新局面的一种锐利的思想武器。

伟大的举世文豪高尔基也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述，正是铺垫人类进步的阶梯之一。中国人民沿着它，越过险山恶水，登上了一座座胜利的顶峰。

然而，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他本人一样，一段时间却遭到了一些人极不公正的对待。那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毛泽东同志的议论讲得太重了”的时候，也曾一度影响到对他的科学著作的看法和学习，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从“文革”中那种不正常的高温度，一下又降到不正常的低温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这种不正常的局面，邓小平同志认为是应该加以纠正的。1978年，他旗帜鲜明的提出要“四个坚持”，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1980年3月19日，在谈到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意见的时候，他又及时地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建议中央提倡读书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他还循循善诱，举陈云同志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为例，说：“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他在延安的时候，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并根据当时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的问题，具体点出了学习的书目，并建议选编成册，供大家学习使用。在当时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究竟如何正确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如何正确地对待毛泽东同志和他的科学著作，邓小平同志首先确立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并身体力行首先为大家做出了好的样。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

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而且《决议》中对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中集中概括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做了阐述，这些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问题。接着《决议》又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这就再明确不过的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作出了肯定的结论。

应该说，邓小平同志的论述和《决议》的通过，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和他的科学著作的历史地位及重要意义起到了一个定盘星的作用，在党内外、军内外、国内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影响到现在，而且还会影响到未来。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举。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名言要理仍然没有引起一些人的重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却做出异样的或根本相反的回答，特别是在那资产阶级自由化大肆泛滥的日子里，尤其到了使人难以容忍的地步。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极力鼓吹“意识形态消亡论”，“淡化政治”、“淡化社会”的论调，企图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淡化掉。其实，何止于此？10年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竟成了他们肆意歪曲、践踏、攻击和发泄的主要对象，没有哪一条马列主义原则没有被他们批判过，没有哪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被他们非难过。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真可说是‘万般皆上品，唯有马列低’。马克思主义遭受了空前的大劫难。毛泽东同志和他的科学著作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肆意歪曲、践踏、攻击、辱骂和发泄的主要目标，成为国内外反动势力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向人民进攻的突破口。他们对毛泽东同志科学著作中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没有哪一条、哪一句不曾给予明目张胆地、或阴一句阳一句地批判过、非难过。可以直言无隐地说，用无数革命先驱的鲜血和亿万人民炽烈的革命热情成就的这一科学著作，无论从局部或整体，无论从微观或宏观，全被他们一古脑儿地加以否定或歪曲。

至于说到对毛泽东同志本人，那就更要被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者万箭齐发了。他们对毛泽东同志施行人身攻击的包围战术，进行了种种活动。有的人为了个人的名和利，为迎合某些读者的心理，挖空心思，到处钻营，写了那么多所谓“鲜为人知”的东西。自以为得计，在当前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条件下，正是给国内外反动派提供了向人民进攻的炮弹，起到了国际反动势力起不到的作用。有的恶毒咒骂毛泽东是封建主义“大杂烩”，是斯大林一样的“暴君”，说“毛泽东还不如蒋介石好”。阶级敌人的这一套，我们早已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公司领教过了。它丝毫毁伤不了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更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有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吹鼓手倒不那么赤膊上阵，他们把资产阶级的种种“名著”、“新观点”大批贩运进口，忽而掀起萨特热，时而又拿出弗洛伊德……你看市场上的小贩，高声叫卖，着实热闹了一阵子。他们妄图以此取马列、毛泽东著作而代之。甚至对毛泽东不借进行人身攻击，造谣和中伤。道听途说，胡编乱造，有的话简直叫人难以启口。令人痛心的是，在我们的队伍中，对毛泽东同志和他

的科学著作也出现了冷漠和淡化的现象，不顾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诲，违背《决议》的基本精神，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热浪的冲击面前，有的人失去理智，搞乱了自己的阵脚。有的在敌人对毛泽东和他的科学著作的攻击、辱骂和歪曲面前麻木不仁，不但不能给以有力的回击，反而随波逐流，对毛泽东同志和他的科学论著也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头挑起骨头来。并任意推断，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读书就种下了晚年犯错误的思想根子。有的人有意或无意地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本人分开来，或把毛泽东著作同毛泽东思想分开来。甚至有的跟随毛泽东同志革命大半生的，历来就是靠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中吸取营养，成长壮大，拼搏战斗的人，今天当提到毛泽东和他的科学著作的时候，却心有余悸，疑虑重重，话到嘴边留半句。有的单位不分青红皂白，将珍宝当敝屣丢掉，竟找不到一套完整的《毛泽东选集》。如此这般，有的人嘴上还在喊着什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岂不是笑话吗？恩格斯说，违反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可想而知，酿成1989年春夏之交那样的苦酒，发生涂抹侮辱毛主席画像那样的事件，绝不是偶然的事情。至此，才使许多同志痛定思痛，开始清醒起来。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

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我们曾不止一次他讲过高举，讲过捍卫，包括十年动乱那个极不正常的时期。究竟什么是真正的高举，什么是最纯正的捍卫？当前，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解放战争开始后的战略防御阶段，人民群众高呼过“毛主席万岁！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的口号，那是因为我们面临国民党蒋介石百万大军的进攻，人民革命事业进入了危局，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为使革命走出危局的需要，那时毛泽东同志的确是胜利的希望、战斗的象征，如若没有了“毛主席”这个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来支撑着，来鼓舞着，结局实在是不堪设想的。回顾延安整风以来直到建国初期，全党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路子对，学风正，取得的胜利也大。60年代初，学毛泽东著作和学雷锋的群众运动也是生动活泼、扎扎实实，效果显著。可惜“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家利用了、褻读了。今天，人们提出读一点“毛泽东”，“寻找毛泽东”，是因为近10年来，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涛冲击下，毛泽东和他的科学著作仍然遭到冷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目的还是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毛泽东和他的科学著作恢复本来的面目，并求得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伟大人物一旦成为一种理想、一种信仰、一种事业的代表，对他本人的评价和毁誉就不是他个人的事了。”这些年来，正是通过正反面的实践，进一步懂得了这样一个真理：对毛泽东和他的科学著作都不能“过热”或“过冷”。过热当然不好，过热会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也会损害毛泽东本人的形象；过冷也不好，过冷同样会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也会损害毛泽东本人的形象。既不过冷，又不过热，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办事，科学地评价和认识毛泽东，认真地学习和运用他的科学著作的基本观点，全面地、准确地把握他的思想体系，我看，这才是真正的高举，真正的捍卫呢！

现实在呼唤

最近以来，江泽民、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强调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特别是强调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在这一号召的鼓舞下，在一些单位和地区重新掀起了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据报道，北京一些大学校园里，出现了过去很少见到的《毛泽东选集》及《实践论》、《矛盾论》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单行本，在大学生中出现一种“毛泽东热”。在青年学生们的藏书中，毛泽东的著作占有一定的数量。江西大学成立了 60 多个马列学习小组，参加学习的学生 800 多个。许多学生的书架上摆上了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的著作又成为工人的“精神支柱”。位于武钢附近的红钢城新华书店，仓库中积压多年的毛泽东著作一天之内全部售出，求购者仍络绎不绝。武钢烯气厂宣传部为满足干部职工学习“毛著”的要求，刻蜡板油印分发职工，最近又选了五篇著作送印刷厂赶印了 1500 份。据该厂提供的情况，全厂目前学“毛著”的干部达 93%，工人达一半以上。干部工人学习的“毛著，主要有《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人民服务》等。在总政治部的具体号召和组织下，我军也进一步展开了学习毛泽东科学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哲学著作的活动。如果有人一定要问：现在强调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呢？这个问题是需要作出严肃而肯定地回答的。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全在于丰富它，发展它，现在强调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以我之见，至少可以讲出三个方面的好处：

一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需要。多年来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西方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过敌视和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大体从 30 年代始至 50 年代初，帝国主义发动了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一系列战争，妄图将共产党领导与建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革命势力消灭在摇篮和成长之中。谁知道，经过反复殊死的较量，它们的梦想破灭了，失败了。然而，多年来它们那种一贯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却丝毫没有改变。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它们妄图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用“没有硝烟”、“不流血的战争”将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个渗透、吞噬掉，使之重新沦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

有位朋友说得好：为此它们不仅有系统化的理论准备，而且早已有了一系列的实际行动；不仅有战略方面的宏观部署，而且还有战役、战斗方面的微观行动。它们在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和配合下，就是阴谋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政变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的确是非常毒辣的，其核心首先是抽掉我们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精神支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们攻击的目标，不仅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他的科学著作，而且还有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以及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当然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推翻共产党，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俄国自然科学家巴甫洛夫有句名言：有机物借着神经系统的力量对外来的各种刺激必须做出适当地答复，否则这种有机物就会灭亡。我们面对今天西方反动势力实行“和平演变”、“没有硝烟”的战争所带来的各种“刺激”，同样必须做出适当地回答，否则也会有“灭亡”的危险。“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白岿然不动”。最好地回答就是针锋相对，制定一个反“和平演变”的战略计划，并付诸实际行动。毛泽东同志在他的科学著作中曾经反复阐述关于帝国主义的本性、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关于防止和平演变、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和在战术上重视一切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肃清自己内部一切软弱无力的思想观点，等等，仍不失为制定这种战略计划，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锐利武器。

二是克服党内腐败现象，密切联系群众的需要。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的党的这些优良作风，在战争年代打下了一个良好而坚实的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初的50年代，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党风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无不廉洁，人民群众无不心悦诚服。时至今日，人们还在称道那个年代，怀念那个年代的人和事，那个年代的党风、军风、民风的确给人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记忆，是党的光辉史册上值得回首的一页。然而，在十年动乱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党的这一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却遭受了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为加强党风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境况有所好转，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花大力气。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赵紫阳同志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消极、“改造”，党风建设又受到了严重影响，党内的腐败现象又有发展，有的甚至发展到严重脱离群众的地步。经过去年那场风波之后，党中央对此采取了具体措施，使党风有所好转，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好评。然而，要巩固与发展已有的成果，并进一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以为仍然需要学习毛泽东同志那种打了胜仗只吃一碗“扣肉”补补脑子、别无他求的精神，并从他的科学著作中找取答案：“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27日版，第36页）今天读一点“毛泽东”，认真回顾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那些嘉言懿行，对克服党内腐败现象，加强党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是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的。

三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搞好四化建设的需要。不久前李瑞环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普遍真理。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而是因为它是指导我们走向胜利的科学。我们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也仅仅是能够指导行动。他还说：“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应重点学好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学好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这不仅因为这些著作通俗易懂，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我们比较熟悉，更重要的是它们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的灿烂明珠。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为我们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我们更应当加以重视。我以为这些话不仅清楚不过的阐明了当前学习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的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大家指明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和方

向。由此也不难看出当前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建国 4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十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历尽艰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块贫穷落后的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东方巨人真正站立起来了，并在国际事物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产生过种种不同的错误，特别是十年动乱，“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样的错误，给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困难是很多的，矛盾是复杂的，形势是严峻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接受历史的教训，使之由感性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如何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规定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如何更好地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正确的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好改革开放，克服种种障碍，走出困境，如何把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乱了的思想理论重新纠正过来，把人们的情绪理顺，让我们豪情满怀地沿着正确的轨道继续前进，等等，这就需要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指导。百贯穿在毛泽东科学著作和其他著作中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和知行统一的观点，关于唯物辩证的观点，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的观点，关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观点，关于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观点，以及学习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克服片面性的观点等等，都是指导我们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有效的武器。

谈到学习毛泽东科学著作的现实意义，还可以讲出许多，但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它那深远的历史意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有必要特别强调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由于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许多理论问题被搞乱了，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有的人甚至站到动乱一边去了。国际敌对势力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在国内，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也将长期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一点“毛泽东”又是长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里面集中概括的毛泽东思想，以及反映毛泽东思想的那些基本观点，可以说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全面而系统的理论基础。如果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比喻为一座高大的建筑物，那么经过半个多世纪已经证明了的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那些正确的思想理论，就是这座高大建筑物的根基，对构成这个根基的基本因素，是万万不能任意地削弱或忽略的，否则就会影响这座建筑物的稳固存在，弄不好在当前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面前，还会影响到它的平衡，不仅会使它倾斜，甚至还有倒塌的危险。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是一条永恒的真理。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人们的生活中，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在整个人类解放的事业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在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大逆转、大倒退的历史条件下，读一点“毛泽东”，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无疑其战略意义就显得更加明显了。

伽利略有句名言：科学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业。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既然是群众智慧的结晶体，当然又是倍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也是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有些人读了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书觉得有味儿，越读越感到心旷神怡。特别读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就更感到亲切、好懂、好记、好用。有的同志说：这些和西方的玩艺儿不同，它适合我们的国情，是我们寻找的真经。不再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什么远离现时的东西了，尤其是一些青年朋友读了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书以后，从内心深处便产生了一种“顿悟”，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早读一读这些书，早读了不致犯错误，不致上当受骗。人们的共同呼声是：让“毛泽东”回归人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科书，再也不能在我们的课堂、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现在提出认真阅读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并非是只读他一个人的著作，而是要广收博览马克思主义的“群书”。毛泽东对这一点就有个明确的要求。早在1935年，毛泽东对抗大教职员的学习就抓得很紧，在一次会议上，他对大家说：“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得书多，掌握得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当时在抗大政治部工作的穰明德，一次去毛主席办公室汇报工作。毛主席正在伏案写作，见他来了，同他握手寒暄过后，接着就问他：“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呀？”他如实地回答说：“在读你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另外还读了一本……”毛主席说：“你呀！光读我写的书不行。要博览群书嘛！像你这样的同志出身苦，有斗争经验，但文化程度不大高，尤其应该多读书，这样可少犯经验主义错误。你只读我写的书，远远不够，要多读别人写的书，这样你可能还会发现我书中的错误呢！”“主席说得对，我一定照办。”穰明德为毛主席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关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自己也曾有过多解释和论述。在延安整风时，中央党校的党员在讨论什么叫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毛泽东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他还说，“我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我也会犯错误。”这反映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宽阔胸怀，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的。

然而，现在值得指出的是：一、在人们的读书生活中，对于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不是读得多了，而是读得太少了。二、有的人对毛泽东个人正确的东西强调得太少了，而对毛泽东个人错误的东西却强调得太多了。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对的，对党的事业是不利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学习毛泽东著作曾有过最好、最见成效的时期，那就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那些年，即雷锋成长的年代。我们应该回顾和总结那个年代群众学“毛著”的经验，努力达到那个年代群众学“毛著”的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前进一步，力求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活动中取得可喜的成效。

我看，这正是现实在呼唤，时代在呼唤！

而今迈步从头越

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指出：“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我们的事业就遭到挫折。”笔者以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当前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党同群众思想上的沟通和感情上的联系。而读一点“毛泽东”正是加强党同群众思想上的沟通和感情上联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因为，读一点“毛泽东”是时代的呼唤，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大多数群众的共同心愿，也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体现。只有如此，才会更好地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的事业才会无往而不胜。

话说到这儿，有的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提出读一点“毛泽东”，这不是又回到“文革”中读“毛著”的“老路”上去了吗？这种担心反映了时下某些人的一种“逆反心理”。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对所说的读“毛著”的老路，我看照列宁的教导也该做些具体地分析。读“毛著”的老路，如果说是回头走十年“文革”中所走过的那段路，确实是令人忧虑不安的。那是一段什么样的路呀！？那是一段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把毛主席著作支离破碎，充满着学习形式主义的路，把“毛著”同马列主义分隔开来，把毛泽东拥向神坛、从而使毛泽东孤立起来的路；把广大群众读毛主席的书的热忱引向极端，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的路。这条路今天当然是不能再走的了。人们也不会再走这样的路。现在主观和客观的情况不同了。这是因为：一经过拨乱反正，摆脱了当时那种极左的思想影响，二经过实践是认识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人们的分辨能力提高了，三清除了个人崇拜的因素，以及批判了简单化、绝对化、神秘化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四克服了盲目性，提高了自觉性，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所以说，读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担心走十年“文革”回头路的顾虑是不必要的。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学习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这就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走一条学以致用，为祖国四化建设寻求思想武器、开拓新天地的路，如果说走老路的话，说到底就是党在延安时期树立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路，我们党就是凭着这条路，在战争年代培养了大批文武干将，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不也是凭着这条路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培养了张思德、王铁人、雷锋式的一代新人，从而取得了4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吗？我们今天要走的的就是这条路。这是一条党的传统之路，这绝不是一条复旧之路，更不是林彪、“四人帮”曾经利用过的那条路，而是一条继承、发展与创新之路。这是时代的需求，也是我国的国情所定呵！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倡读：一点“毛泽东”，走这条路，豪情满怀地走这条路。这也是我们党、我们的民族大有生气、大有希望的表现。这是在走自己的一条希望之路，传统之路。老路和新路是一脉相承的，没有继承怎能谈得上发展，这难道还会有什么怀疑。

有的人觉得毛泽东同志晚年发生了失误，似乎他的科学著作和有关他的传记等书籍也不值得认真一读了。这种认识和做法是不对的，是不足取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失误是任何人都不会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绝不能把他的错误同他的有关著作和他一生的伟大之处划等号，更不能把二者混淆在一起。正确而科学的做法应该是：把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同毛泽东的科学著述、毛泽东一生的伟大之处、毛泽东思想整个科学体系严格区别开来。因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同他一生的著述和他的思想的科学体系毕竟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而毛泽东同志“自己正确的东西”正是体现在他的那些大量的科学著作和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之中的。

当然，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也并非“句句是真理”，他个人一生的经历也不能是完美无缺的。人们也不可能“靠上帝口中所说出的每句话生活”。人们更不会依照两个“凡是”的模式办事。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中和他的经历中也难免有个别偏颇、失误和不够完备之处。但这些只不过是白璧微瑕，丝毫不会影响他的思想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不会影响他那伟大而光辉的巨人般的形象。因此这就不能构成不需要认真学习他的理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杜寒风，最近在大学生“寻找毛泽东热”座谈会的发言中，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毛泽东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乃至世界进程的领袖，我想，产生大学生‘寻找毛泽东热’现象的最重要原因，是不能归于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被冷落的原因的。寻找毛泽东，我以为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这个风云人物给中国现代历史所带来的不可轻易抹煞的巨人影响。我强调毛泽东的巨人影响，指的是毛泽东作为历史巨人的双重影响，也就是作为一种人格态的毛泽东与作为一种理论态的毛泽东的影响。人格态的毛泽东就是指毛泽东的道德、情感、气质层；理论态的毛泽东则是指毛泽东的观点、思想、体系层。这两个层面是相互交叠融合的，虽然我们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二，实乃为融汇的有机体。”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大多形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在社会主义时期又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是我党几十年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我党今后继续前进的指针，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不但在历史上曾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至于说到毛泽东的“道德、情感、气质层”，那是当代伟人中少有的，同样是值得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学习效仿的，它同样是影响我们的事业胜利前进的不应该忽视的因素。

今天才谈到读一点“毛泽东”的时候，不能不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失误持有一个公允的态度。他晚年的失误固然应该由他自己负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一切过失全归罪于他一个人，更不能因此而抵消了他一生的伟大成就，其中包括他在理论方面的成就；相反在一定意义上说，他的智慧、成就和为中国人民所建立的伟大功勋，倒可以补偿他的一些过失。正是在这个包含着深刻的辩证的意义上，有的人犯了以偏概全，以一管掩大德的错误。我看，王忍之同志的话是令人深恩的：“毛泽东同志晚年有错误，应该纠正。但是中国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共产党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走向胜利的。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应该磨灭也无法磨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他的错误和他的功绩比起来就会显得越小。”（《求是》1990年第4期）我们还应该看到，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失误，

毕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况且他的每个失误，又无不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或一些主观或客观方面的原因。同时严格说来，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拓性的事业，是一项十分复杂、困难重重的事业。同进行自然科学试验一样，不知要试验多少次，失败多少次，才会找到真理，或接近一点真理。如果将他们在试验中所犯的错误的。一定要拿来同他正确的东西——成就相抵消，或一定要扣上个什么“空想社会主义”之类的大帽子，甚至一定要抓住他的错误不放，不予谅解，这样就一定会影响到对他的科学宝藏的开掘，不但对其本人不公允，就是对事业也不利。在这方面如果谁要硬是苛求前人，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有眼光、有远见、有头脑的人，是不会把珍珠当做泥沙丢进沧海的。在如何对待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包括对待他的科学著作上，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这是值得人们称赞并需要认真学习与效仿的。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妖风的吹动下，一时呼叫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论，也严重影响了人们读一点“毛泽东”。这在目前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几种不同的层次。一种是有些人、特别是有些青年人，他们根本没有读过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对毛泽东的一生也所知甚少，对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然无知。他们读得多的是西方所谓的“先进”的东西，听得多的是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失误。他们盲目地崇拜西方，盲目地否定自己的传统，盲目地跟着起哄。本来是幼稚可笑的，还自鸣得意，自以为是。在此，不妨奉劝那些愿意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青年朋友，请你读一点“毛泽东”吧！它不仅为我们党提供了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对毛泽东人格的了解，还会帮助你探索人生的真谛，帮助你丰富人生的内涵，帮助你超越人生的障碍，帮助你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一句话，它会使你不断地更新，真正成为一个人“四有”新人。当你读了，并且是认认真真地读了一点“毛泽东”的时候，你从他身上看到的就不会全是疮疤，或僵死的偶像，而更多的倒是伟大、光辉的象征了。那时，你会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和人品在我们事业中的功能、地位和意义。青年人的记忆是洁白的，“没有玷污的记忆一定是一种绝妙的宝库——是纯净的滋补品的无穷来源”。千万要警惕呵，且不能让自由化的污水涌进你洁白的记忆的宝库。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充实你记忆的宝库才是啊！一种是有的人虽然读了一点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但没有读通、读懂，没有认识它的体系，更没有抓住或领会它的实质，一句话，就叫没有打下马克思主义这个根基，或者说这个根基打得不稳固。他们对马列、毛泽东著作只会背诵其中的若干词句，或其中的一些观点，“徒有虚名并无实学”。他们正像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引用过的那副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由于他的思想深处没有打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基，所以只能是“人随潮流草随风”，一遇到气候变化，就随风摇摆。用现在的话说就叫“骑墙派”或“风派”。人家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他也跟着叫“过时了！过时了！”人家辱骂、丑化、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始人或继承人，他也跟着帮腔助威，成为“过时论”的“走卒”，甚至是积极的呐喊者。难怪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中，有的人站在了动乱的那一边。由此可见，这种根基不牢的危害也是够大的。过去的已经过去，将来再遇到类似的政治风浪又该如何呢？看来还是丢掉“过时论”的奇腔怪调，老

老实地读一点“毛泽东”，在灵魂深处建立一个牢靠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才好。一种是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如今有了权，有了钱，有了名，有了地位，生活条件变了，什么马列的书、毛主席著作呀，共产主义信念呀，通通都放在脑后。这种人中，原来的精神状态也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在“毛泽东高高飘扬的旗帜”下，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什么的，也曾视死如归地奋斗过，或者说，他们也曾是某条战线上的佼佼者，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出过大力，有过贡献，原来他们也立志死后去见“马克思”的。然而现在不同了，自以为革命到头，先烈们壮烈牺牲的情景淡忘了，自己该享受了，就是死后也要进“天堂”。至于国家的未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等等，“随他的便好了”。这二一种人和前边说的那两种“过时论”者不同的是，他们嘴上并不喊多少“过时”的言词，或者说在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号召下，他们也唱落实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调，但只是当一当正面的演员、唱唱而已，不见有多少实际行动，更看不见有多少积极地发挥。因为要奋斗，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牺牲。他们是只肯索取不肯做出什么牺牲了，生活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向西方先进国家看齐，至少是向比自己现在高一等的水准看齐，其实这种人倒是十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论者。持这种立场、观点的人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怎么还能读得进去呢？

还有一种人也是应该提及的，那就是建国后极左错误的受害者，特别是十年“文革”中的受害者。其中有的人同党、特别是同毛泽东同志在感情上有了隔阂，有的甚至耿耿于怀，多有辱骂、怨恨之词脱口而出。因而对毛泽东就不能持一个公允的态度，更不能作出一个公正的评论。在他们的心中似乎无不闪动着“毛泽东”过时的阴影。这无形中就影响了读一点“毛泽东”。这种感情上的伤害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所持的态度和作法却是大可不必的。在我们党内和党外，受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之苦的大有人在，不光是在高级干部中有，就是在一般干部中也有。丁玲、黄克诚等革命家、文学家即是，他们可称得上是不论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的典范。不记个人得失者，就是在古人中也不乏其人。如《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是。据说陈的父亲因为马谡失街亭受到牵连，被诸葛亮治罪。然而陈不计私仇，对诸葛亮作出公正评价，不但为诸葛亮立了传，还编撰了诸葛亮文集。这种尊重历史、顾全大局的现实的和历史的作法，都是值得学习的。

读一点“毛泽东”的确是有个立场和感情的问题。立场对头，感情浓烈，就读得进去，收效明显，对我们的事业就较为有利。反之效果就差。但同时也有个方法问题。方法对头，效果就会相对好。这个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比较法和联系法。第一是联系国际共运史、中国革命斗争史、我党党史、军史，学习研究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和他的革命实践，这样才更容易看出他的思想理论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历史地位；第二是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经典著述，学习研究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和他的革命实践。这样才更容易弄清毛泽东同志是怎样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运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并充实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第三是联系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和江泽民等同志的重要论著，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和他的革命实践。这样才更容易了解毛泽东同志是怎样似他毕生的精力、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及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又怎

样来更好地发展和丰富毛泽东思想。历史经验证明，这些久违的学习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是科学的。

读一点“毛泽东”，无论联系什么、怎样联系，在思想上必须确立一个大前提，这就是要着眼于从宏观上、从总体上、从革命战略的高度上看待毛泽东，看待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可以这样说，世界上有许多高山，由于人们站的位置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看一座高山，有的山从近处看并不显得多么高，而从远处看才看出它的高度，有的山从远处看并不显得多么高，而从近处看才能看出它的高度。不妨把毛泽东和他的科学著作也比喻为一座山，如果你能掌握了战略高度这样一个大前提，那么你无论远看，还是近观，都可以看出它是矗立在神州大地、矗立在世界东方的一座巍峨的高山。现在看来，登上它的顶峰，开掘它的宝藏，除了有个正确的立场和方法之外，还需要有一点胆识和勇气，即敢于从它那里找回人们曾一度失落的财富，让“毛泽东”重新回归到这个世界上来，并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1990年3月20日草于北京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我将要提笔撰写这篇有关毛泽东同志的文字的时候，我怀着十分敬重的心情，又一次拜读了一些有关他的传记作品和一些他的科学著述。掩卷感恩，那些似乎都是盖棺论定、关于评价他的功过事非的话语，又悄悄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

——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创立和发展，为我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同志立党为公，为政清廉，艰苦奋斗，恢弘无私；

——毛泽东不是神，而是人。但他用兵如神，具有超人的智慧和毅力，具有一个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素质、魄力和威望；

——毛泽东同志一生勤奋不辍，博览群书，通经谙史，知识渊博。他不仅精通历代诗词、戏曲、小说、杂文，还是一代杰出的语言大师、诗人和书法家；

——毛泽东同志在晚年虽有失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事业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月色如银，群星眺望。初夏之夜，既没有春寒，炙热又未到来。我回想着这种种的评价，”再一次地陷入深思。在我躺在床上，静静地想了想之后，顿时觉得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以至在这世界的东方，矗立着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一个全心全意、一个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他的名字就叫毛泽东。

请问，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什么特点呢？难免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说，有的。他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概括起来是：

一、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标准。他强调，要全心全意，诚心诚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不能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或半真半假，留有余地。194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还曾告诫全党：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把为人民的利益而死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最高标准。他的最闪光的话语是：“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总之，我们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离开了这些就谈不上什么为人民服务。

二、指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和实质，即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为无

产阶级劳苦大众，还是为资产阶级或其他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人服务。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在谈到人民军队的时候，他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他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它也是我们党和军队力量的源泉、动力和前提。忽视了这一条，什么“全心全意”、“诚心诚意”，就都失去了意义，也就无所谓为人民服务了。三、明确了为人民服务的方法、手段和内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中，强调为人民做所谓一般的好事，但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上，体现在每个党员干部和一切国家机关人员，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行动上。他说：“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时他还认为，为人民服务是有阶段性、针对性和现实性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曾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实，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必能完成的。这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战略转变问题。为了服务的更好，更有意义，实践证明，必须注意到这个转变。

四、展示了为人民服务的最终目的。毛泽东同志确立为人民服务的现实目的是，为人民办好事，为人民谋利益，而最终的目的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他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出发，一贯主张，要把为人民服务的一切活动，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人类最美好的未来结合起来。他在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样的人。早在1937年5月，他还意味深长地说过这样的话：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他讲的上篇就是现在，他讲的下篇就是未来。接着他又说下去：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为人民服务，同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所从事的慈善活动或为别人做点好事，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它是在一种崇高的理想指导下进行的，它是一种最文明、最高尚的活动。

五、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持续性和长期性。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为人民服务，不只是一时一事活动，而是指一生一世，终生不懈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在1944年11月15日给《延安解放日报》纪念邹韬奋特刊上的题词中，就这样写道：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1940年1月15日，为吴玉章同志60寿辰写的祝词，更为令人深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他讲的“好事”，就是为人民服务，他讲的“一辈子做好事”，就是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永远做人民的公仆，而不当人民的老爷。

人们有许多这样的活：“天下有忧身先挡，天下有乐人民享”、“爱国胜爱家，为她舍得一身刚”、“人生一世间，存心要为公”，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百乐”。孙中山先生也说过“天下为公”的话。这些似乎都有为人民的意思。然而，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却为之增添了全新的内涵，他把为人民服务当作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当作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特征，他还把为人民提到了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度，并作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规范和最高表现。他的有关为人民服务的论述，除了比较集中的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论联合政府》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著作中，还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从中充分体现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实质，并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人说，它是对无产阶级建党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对我党根本宗旨的绝好概括，也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以为，这些评断是有道理的。无疑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确是我党的宝贵财富。

令人感叹的是，毛泽东同志既是为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创立者、倡导者，又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体现者、实践者。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可以说，他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美好形象的缩影，也是老一辈革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代表。

在此，请允许我讲一段毛泽东的卫士小封亲身经历的记述吧：

这时正是毛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前夕。夜深了。我陪伴着毛主席。他已经三天两夜，很长时间没有吃饭了。每逢大事，主席的生活便更无规律可言。忽然，主席将头朝上仰去，张开嘴，深深地吸气。我抓住时机，请主席吃饭。他摇摇头又点点头，说：“不用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我到厨房烤熟6个小芋头端去。一进门，就听到响亮的鼾声。他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笔，又睡着了。我便退到门口坐等。十几分钟后，主席咳嗽一声。我手捧碟子进去：

“主席，芋头烤好了。”主席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噢，想吃了。”他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吟诵起他过去的一首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自得其乐。他的饮食既随便，又艰苦。好么，四菜一汤，差么，一碗面条。很多时候只是用搪瓷缸子在电炉子上烧一缸麦片粥，就算一餐饭。一天24小时，他吃两餐的时候多，也有吃三餐或一餐的时候。我们在主席身边，他老人家入口的东西必经我们之手的。我跟随主席的10年中，没见他老人家吃过任何补品。当他脑子消耗过度，饥饿感强烈时，就吩咐“来碗红烧肉，肥点的，补补脑子”。如今讲给人听，多数不信。他们习惯于拿身边的某领导比较。事实终究是事实，主席和总理艰苦奋斗，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

毛泽东一生渡过83个春秋，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东奔西走，四处寻求为人民服务的真理。为摸索出一条使人民走向新生的光明之路，他几十年如一日，费尽心血，受尽苦难，终于使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达到最好的结合，同他的战友们一起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至此，全国人民才得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28年的卓绝斗争，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从而结束了近百年来世界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结束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他的丰功伟绩早已载入史册，他的思想还将产生长久的影响。这些都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的。但他生来从不居功自傲，对人民毫无索取。无论

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一贯严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信条，勤恳奉献，终生不辍。1937年1月30日，他给徐特立同志60寿辰的祝寿信中，称徐老“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实则也是对他自己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崇高精神的写照。他一家曾有6口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第一位就是他“亲爱的夫人”杨开慧。

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1921年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湘区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这年8月，毛泽东利用“船心学社”的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杨开慧参加了筹建工作，并负责筹集资金，为培养早期党的干部作出了贡献。1922年，毛泽东创办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了这个馆的负责人。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毛泽东被迫离开长沙来到上海，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别离。1924年夏，杨开慧和母亲带着长子毛岸英和次子毛岸青，也来到上海。到年底，杨开慧又随毛泽东从上海来到韶山冲，并协助毛泽东在这里办了一所农民夜校，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把队伍拉到井冈山，湖南省“清乡”司令何键悬赏大洋1000元，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1930年10月，杨开慧不幸被捕入狱，还有她8岁的儿子毛岸英。在狱中，杨开慧经受了各种形式的威逼和利诱，说只要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马上就可以得到自由，却遭到了她的坚决拒绝，她对前去看望她的亲友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毛泽东）革命早日成功！”11月4日，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国民党杀害，当时她才29岁。

第二位就是他的大弟毛泽民。

1919年10月至1920年1月，由于父母相继去世，毛泽民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1921年，在哥哥毛泽东的影响教育下，加入了革命的洪流。首先在毛泽东任主事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搞校务，后又在毛泽东创办的长沙自修大学任庶务。1922年10月，长沙笔业工会成立，他又担任该会秘书，并领导了工人罢工斗争。就在这一年的冬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受党的委派，到江西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并担任了工人消费合作社的领导工作。1924年，党组织派他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第二年毕业后又被派到上海工作。1927年，反革命政变后，他根据党的指示，回湖南准备秋收暴动。尔后，他又在上海、天津、香港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他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为苏区的财政工作立了大功。在红军长征中，他一直担负着管理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红军给养的艰巨任务，保证部队到达了陕北。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他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病情日益恶化，1938年初，党中央决定他去苏联治疗休养，行至新疆，恰遇新疆与苏联的交界处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他便留在迪化，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化名周彬，出任了新疆政府财政方面的工作，并作出了很大成绩，为新疆人民谋了福利，得到新疆人民的信任。到1941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德国法西斯又进攻苏联，于是新疆军阀盛世才便撕下他“亲苏拥共”的假面具，对共产党人下了毒手。1943年9月27日夜，将毛泽民、陈潭秋等人，从牢房中唤出，秘密杀害。第三位就是他的小弟弟毛泽覃。

毛泽覃，号润菊，1905年诞生在美丽的韶山冲。从小就受到毛泽东的关怀和教育，他参加革命后，在急风暴雨的年代里，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是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他既作过青年工作、从事过工农运动，又参加过革命

战争。在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名红军的优秀指挥员。不幸，于 1935 年在江西瑞金县牺牲，当时只有 29 岁。

第四位就是他的长子毛岸英。第五位、第六位就是他的三子毛岸龙和人们都叫不上名字的两岁的小女儿。另外，还有许多其他亲人。

当人们谈到这些时，他却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死得其所。至晚年他重病缠身，还是念念不忘国家大事。真称得上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呵！但是他仍是以歉疚不安的心情评价自己：我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说到底，他在晚年的失误，同他一生的功绩比较，毕竟是占第二位的。他老人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风范，与日月同辉，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想，这句名言将是永恒的真理。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他的模范行动，都对全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全党养成密切联系群众的良好作风，并出现了许多深受人民爱戴的英雄模范人物。如战争年代的张思德，和平建设时期的雷锋、焦裕禄。他们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爱护人民，以个人利益服从人民的整体利益，他们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这个党和军队，之所以受到人民的拥护与信赖，说到底因为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然而，叫人奇怪的是，不知什么时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流传开一个颇为时髦的名词：“有偿服务”。如今在有些人的言行中，从头至尾全找不到“为人民服务”的字样，为什么？全被删去了，省略了。这是偶然的事情吗？不是。那是人们内心情趣的表露，那是因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根子，从他们的心里拔掉了。为人民无条件服务全被改成了“有偿服务”。满篇写的是“有偿服务”。那末，何谓“有偿服务”？我怀着好奇的心情，曾查遍马列经典、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著述，找不到。《现代汉语词典》收入词条 5 万余条，《辞海》收入词目 9.1 万条，却唯一没有这一条。但是，有偿服务这个字眼倒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者的发明，合理的有偿服务是社会早已存在的。它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单位或个人的技术优势和某种特长，为社会或个人提供方便，创造财富，通过诚实劳动，领取报酬的一种方法。事实证明，在现阶段采取有偿服务的办法，有利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是有利于发展第一生产力。有偿服务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完全视为“一切向钱看”。本来它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无矛盾。问题是有的人利用有偿服务的口号另搞一套。有的报刊也就跟着不遗余力地照此宣传起来。一时甚为流行，于是乎便以“有偿服务”代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往日倡导的“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于是乎，张思德的形象淡忘了，雷锋叔叔不见了，焦裕禄也不提了。于是乎，人们的思想大滑坡，社会风气大变样，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论点也遭到一些人无端地讽刺，一些善良的人们无形之中又怀念起 50 年代、又想起了“毛泽东”。

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狄德罗说得好：“谬误的好处是一时的，真理的好处是永久的；真理有弊病时，这些弊病是很快就会消灭的，而谬误的弊病则与谬误始终相随。”金子毕竟是金子，真理终究是真理。经过 1989 年那场政治风波的磨难，重新显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人们认识了

问题的严重性，也认识了为人民服务的可贵性。于是，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等人们怀念的人物，又返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全党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重放异彩，得到了发扬。毛泽东同志如果在天有灵，他老人家看到这番动人的景象，定会感到无限的欣慰。不过话又说了回来，要是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并持之以恒，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行文至此，无形中想到古人司马光老先生的历史名篇《资治通鉴》。这部书洋洋数十万言，无论从当年统治者的角度，还是从人民大众得以评论历史的角度，都可以称得上是千古不朽的好书。难怪赵项皇帝，也就是那位宋神宗，亲自召见作者，亲自定书名，还提笔写了序言，并将此书定为一部统御学问——帝王的镜子。企图以此镇统环宇，振兴大业。“不过，虽然它自认为和被认为是帝王的镜子，事实上，却从没有一个帝王从这面镜子中获益。明王朝皇帝每天清晨，都要研读它，但明王朝的帝王群，却一蟹不如一蟹。盖权力固可使人发疯，权力同时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见镜子，或虽看见镜子，却觉得镜子里的丑陋映象，原来美如天仙。”是这面镜子不明、不亮、不好吗？非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就叫作理论不能联系实际，或者叫理论与实际脱节，不触及思想，怕接触灵魂。这可以说是往代统治者的一种通病。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人民载舟，人民覆舟。最终的结果是被人民起来推翻。这些过去的事情，看来与我们没有什么相干。不提也罢。不过，切不可忘记《新唐书·魏徵传》里那句“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的话。万万不可学古时封建帝王们那种愚妄无知的做法，有鉴不借，或借而不照，或照也不能从中获益。毛泽东曾经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我们党是人民的救星。在人民群众中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与信任，一是靠她的方针、路线、政策的正确，二是靠她美好形象的感召力。这就是说，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着一条真理，那就是，仅仅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还不行，还必须有一支好的队伍，即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美好心灵的队伍。前一条重要，后一条更重要。毛泽东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做到了很好地结合，所以得到人民的愛戴。

我总以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嘉言懿行，是我们党为政清廉，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人民服务的最好的借鉴。明镜高悬，只要肯抱老老实实的态度去照一照，照出自己确实的映象，并能从中获益，励精图治，苦干四化，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拥护，那样，我们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对这一点，难道还会有什么怀疑的吗？

事物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革命队伍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不是从“左”的一边遭受破坏，便是从右的一边受到干扰，总之都在很大程度上变形了。其表现，要不就是：“口号震天响，行动不沾边”；要不就是：“弃之如敝屣”。在群众中间，个人主义泛滥，唯我主义盛行。在干部中间，特殊化滋长，腐败丛生。人际关系，上下关系，政治风气，社会风气，都被污染，都被破坏，如果说得严重一点，甚至使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坚实基础，都不能不受到危害。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提出号召，作出决定，要求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我体会，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要解决

这个问题。全会通过的文件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正是必经之路和当务之急。只要我们真正为人民服务，我们就不难体察群众的情绪，不难理解群众的需求，不难获得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真正为人民服务，我们就有了加强党和群众联系的强力粘合剂，就有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保证。从这个意义上，防止脱离人民群众，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成了保证我们党、保证我们的国家政权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永不变质，永不改变颜色，也就是防止“和平演变”的一项最根本的战略措施。这也是 1989 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和东欧发生的剧变向我们所提供的最主要的历史政治教训。经过十年内乱，经过那场政治风波，人们在反思中，重新认识了客观世界的形势，重新认识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人们呼唤张思德，呼唤雷锋，呼唤焦裕禄，也是在呼唤毛泽东，呼唤他提出的为人民服务。

现在，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党正在密切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应该相信，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一定能够得到发扬光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一定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正如毛泽东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样，为人民服务也将永远体现在我们的行动中。明镜高悬，时时对照，就是我们的座右铭。

致一位青年朋友的信

我记得你曾经告诉我，人们称你是满带“正统思想”的青年人。这对你来说，是嘲讽还是赞慰，是继续坚持还是却而止步呢？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我看是很值得思忖与探讨一下的。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给人一种印象——一种好的印象或一种不好的印象。人们根据你平时素有的表现、言谈举止，说你满带“正统思想”，其本意可能是嘲讽和讥笑，而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我以为对你倒是一种褒奖，应该进一步鼓起坚持“正统思想”的勇气。

当代青年，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特点？当然，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学好现代科学技术，掌握所需要的文化科学知识，好学上进，不断增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人民服务的本领，特别是要有开拓精神。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一个人的一切言行还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对我们来说，那就是用无产阶级的“正统思想”，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下的青年与别的社会制度下的青年所不同的。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最重要的特点，那还算得上什么当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青年呢？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倡读一点“毛泽东”，正是为了丰富与加强人们头脑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修养，做到很好地维护和发扬无产阶级的“正统思想”，并用这种思想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今天正在青年学生中兴起的“领袖热”，“毛泽东热”，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令人可喜可贺。

然而，一提要读一点“毛泽东”之类的词儿，时下在有些人的眼里，却是很背时的，似乎是僵化、教条、陈旧、保守、过时的代名词。只要谁一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讲共产主义大目标、一讲学雷锋、发扬光荣传统、联系群众、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就说你搞“正统”，进而冷嘲热讽。或挖苦、抱怨你不合时尚。如果硬是要强调讲时尚的话，我却认为，那些抱怨别人不合时尚的人，那些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拼命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倒是极不符合当前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时尚的。

“正统，二字启始于何时，无从考证，仅据一般词书解释，它的含意是指：封建社会一个王朝和另一个王朝的前后相继（按直系血缘世袭皇位而言），或某种思想的一脉相承。后来，被泛用为嫡传或直接继承的意思。其实，道理显而易见，古今中外，不论哪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有代表本阶级利益的那种“正统思想”，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都要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正统思想，和传下去。奴隶社会是这样，封建社会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到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不能例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话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嘴里讲出来的，可真算是讲到了点子上，说到了要害处。试想，一个统治阶级，如果没有一个精神支柱做后盾，没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来保证，那个统治阶级也就很难存在下去了。

应该指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与以往其他社会的统治思想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而我们所要继承的“正统思想”也只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有个很流行的说法，叫作“观念更新”。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有人一提到“观念更新”，就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旧观念”，当作更新的代名词，把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东西当作旧体系，当作“更新换代”的对象，而把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新观念”，当作至宝。究竟谁是“新观念”，谁是“旧观念”？在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上，他们恰恰搞颠倒了。如果硬是讲新旧之别的话，那末可以肯定的回答，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才是“新观念”，而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才是“旧观念”呢。历史老人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人剥削人的制度。早在 14、15 世纪，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中即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西欧从 16 世纪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经过 17、18 世纪的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 18 世纪后半期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17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即完成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随之而来的西方那种资本主义的所谓“新观念”也就形成了。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由马克思、恩格斯参加了革命实践，总结了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批判地吸收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创立的。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列宁主义。谈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对我们来说则是更新、更近的事情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曲折的。从苏联赫鲁晓夫算起，的确发生了许多令人忧虑不安的事情，但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成为“旧观念”了。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人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最有生命力的、独一无二的“新观念”，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世界上还只有一个人相信它是最伟大的真理，它依然不失为是新观念、新意识。而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确产生了不少新花招、新流派，但它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相比，它的多么“新”也是“旧”；而马克思主义无论再过多少年，它也是全新的观念、全新的意识，它也是“新”字辈。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无产阶级老一辈革命家，为了追求、形成和发展这种“新”思想，曾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过去，干革命，打江山，靠的是这种思想；今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离不开这种思想。有的青年人可能又要搬出那句话：科学技术发展了，马列不适宜了。我说，马列向来不是死板的教条，它产生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同时它也将随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但它的基本理论是不会变的，它依然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我非常赞成这样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不在于它给我们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准备了现成的答案，而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经济和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虽然现代化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上提出问题的，但是现代化也必然要与社会的具体条件，包括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文化观念、伦理道德准则等等紧密结合在一起。请想想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除了这种思想之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思想可以依靠吗？难道还有比这更为时尚的灵丹妙药吗？

列宁说得好：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上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上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当前，在一些青年中出现的思想大滑坡的倾向证

明列宁的话是多么的正确。这种倾向的关键问题，就是丢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果造成的就是思想的混乱和谬误。

不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然就会被别的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乘虚而入，例如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之类。实际上，现在有些人的确是在这么办着的呀。他们认为，最有用的就是金钱，什么共产主义理想呀，道德呀、纪律呀，等等，通通都在“金钱”之下。有的不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却信起西方萨特的“存在主义”，追求起西方的民主、自由、文明来了。有的干脆就支离破碎地搬来西方现代哲学中的一些陈腐的东西，作为自己生活的依据，讲求“绝对自我”、“绝对自由”；追求某种抽象的人性和人的价值，“自我选择”西方的现代派、独立派或“中国的现代”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也是从西方搬来）。有的人说：“我们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也不信，不要任何信仰，自己就是上帝。”

这个“不信”和“不要”，也是骗人的鬼话。实际上他们要和信的还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一套。这是很危险的，没有前途的。

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正统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体系，是因为她代表着人类的希望，她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她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这种极其宝贵的东西，在一些人的眼里全都看不到了。在他们那里除了“混乱和谬误”及腐败的东西之外，还能有什么呢？他们所一心追求的是所谓“个性解放”。不过这种“个性解放”可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解放”。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思想解放，是冲破“左”或右的思想的束缚，去开拓、去创新、去丰富、去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天地。而他们所说的“个性解放”，恰恰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离经叛道，另僻蹊径，另立门庭，搞自己的所谓“新观念”、“新思维”。集中到一点，就是欺师灭祖，自立庙门，自立户头，自立祖坟。其实说穿了，也看不出它有多少新东西，弄来弄去，无非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破烂货。不过在国际反动势力积极推行“和平演变”的情况下，需要加以百倍的警惕就是了。弄不好让叫喊“新观念”的人得了手，我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没有饭吃，没有工作，再次陷入被人奴役的生活中，那是肯定无疑的。这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训够多的了。防止这种可怕的情景出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搞好四化，最好的办法还是读点马列、读点“毛泽东”，使我们建立一个可靠的思想基地。

也许有人会说，除了你那位朋友，还有哪个青年人讲什么“正统”呀。这种看法未免以偏盖全了吧。雷锋、张海迪、张子祥、李润虎等可算是坚持无产阶级“正统”的典型，是现实生活中这方面众多青年的代表。他们既是开拓型，又是“正统”型，二者溶于自己一身，构成一个当代青年人的典型性格。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坚持了无产阶级的“正统思想”。正如魏巍在《和青年朋友谈读书》的文章中说的：“如果不是他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汲取了那么多的营养，仅仅依赖少年时所受到的阶级苦难，是不能达到共产主义战士的精神境界的。”像雷锋等这样的青年人，如今在我们周围并不是少见的，他（她）们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些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失误，这是谁都承认的客观事实，而教育方面最大的失误又是什么？我以为这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放松，让出了思想战线上的阵地，使人们、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失去了强大的

精神支柱。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带战略性的大问题。不能说不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读一点马列，读一点“毛泽东”，特别是读一点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对于弥补这种失误，对于在人们的心灵中重新培植那种强大的精神支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生活的现实告诉我们，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一个或几个有威望、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作为崇拜者和遵从者。那种一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说是“旧观念”、“老生常谈”，一提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就讥讽为“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又回来了”，实在是幼稚可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的伟大，他的科学著述及他的一切科学成就的珍贵。对于别的国家的问题我们无需说三道四，无论是“修”呀“变”呀，我们是管它不着的。但对那些有益的经验教训我们倒是有权接受的。

毛泽东说得好，任它“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就是了。

不知你还记得不记得，我曾经跟你提到过歌德说过的一句十分形象而又十分深刻的话：“我们的生活就像旅行，思想是导游者，没有导游者，一切都会停止。目标会消失，力量也会化为乌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体系，那么毫无疑问，她就应该是我们、特别是当代青年唯一正确的思想导游者。一个青年人，以此作为自己思想的导游者，他才会具有远大理想，明确的奋斗目标，他才会心甘情愿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他才会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污染，使自己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从而成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具有现代科学文化水平、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新型青年。否则，他就像一艘没有航舵或没有方向盘的船，只能随波逐流，于是目标模糊了，思想混乱了，“力量也会化为乌有”，以致走到邪路上去。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学潮、动乱以及反革命暴乱中，那些反面的、令人痛心的教训难道还少吗？“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和有用的人，光有诚实的品德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始终不渝的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很难设想，一个缺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合格的青年。那末，读一点马列，读一点“毛泽东”，懂得一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至少在国家处于严峻困难的时刻，使人能保持一下清醒的头脑。

“不是事业为了思想，而是思想为了事业。”（伏尔泰语）读一点马列，读一点“毛泽东”，做到以无产阶级的“正统思想”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思想的导游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代青年的唯一出路，当然也是当代青年的光荣和骄傲。1990年3月23日，江泽民总书记与北大学生座谈时说得好：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毛主席的话现在也没有变。他还说：我相信，在90年代，从年轻的大学生中必定会成长起一批马克思主义者。（1990年4月14日《人民日报》）然而，真正做到这一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固然需要一定的客观的条件，如党的领导，组织的帮助，优良的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影响等，但个人努力去追求却是基本的、主要的。朽木和泥沙是雕不成美丽的维纳斯女神像的。关键在自己能否读一点马列著作、读一点毛泽东的著作，读一点邓小平同志的著作，按着无产阶级的“正统思想”办事。在你读了一点的时候，你也许还会遭到一些人的讥讽或嘲笑，不过这也无妨，应该坚定地相信，你执意坚持按无产阶级“正统思想”办事是完全对的。而且在当前正在兴起的“领袖热”、“毛泽东”热中，你会找到许多同路人的。你只管“自行其事”，“我行我

素”就是了。认真读书，刻苦实践，不怕风浪，勇于攀登，定会达到人生光辉的顶点。

1890年4月于北京

有累清德者戒

我在《毛泽东和他的领袖群》一文中，将谈到毛泽东同志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动人事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伟大成就。而任人唯亲、唯才是举的对立面，则是“任人唯亲，唯亲是举”。所以，当我们在谈到毛泽东同志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感人事迹的时候，又不能不首先讲到有关他老人家以身作则，不搞任人唯亲、唯亲是举的思想和故事。

1949年7月，毛泽东的家乡湖南解放，乡亲们无不欣喜万分。大家听说，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主席带领中央机关已经迁移北平，之后不久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选为共和国主席，便纷纷来信祝贺。也有不少亲朋好友抱着出人望地的希望，来信提出种种要求。38年前曾与毛泽东在辛亥革命中共过事的毛煦生来信，就说他希望进京做事。接着，毛泽东的几个表兄弟也来了信，有的要求毛泽东推荐他们自己参加工作，有的要通过毛泽东介绍别人进京参加工作。这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说话安排几个人参加工作，那不是非常容易办到的事情嘛。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也向他说：“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由于工作需要招收了许多新人。许多老干部的家属或朋友，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介绍就参加工作了。”然而，毛泽东却想到自己是党和国家的主席，我们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是因为我们施行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其中包括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反对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要避免“任人唯亲”，看来必须采取超出“常情”的措施。为此，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斩钉截铁地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我的不能来。我们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章法，我们决不能像蒋介石，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我们如果也那样搞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毛泽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共产党的主席，决心要树立一种无产阶级的新风范。一天，他对身边的秘书田家英特意交待了处理亲友一般来信的原则。他坚毅地说：“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田家英同志领会主席这番话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取得政权以后，还要继续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反对“任人唯亲”，要从我毛泽东这里做起。

田家英同志想，这样处理一般人的来信，还好办，遇到特殊的情况怎么办？恰巧，在别人来信的同时，他的至亲——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也来信了，而且信上说已经准备好就要动身进京了。

这可叫田家英同志为难了。

因为毛泽东与杨家可不是一般的亲友关系呀！

先说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老先生，他既是毛泽东的岳父，又是毛泽东的恩师。正如毛泽东在延安回答斯诺问谁是他最尊敬的老师时说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事实的确如此。

1913年杨昌济任教于湖南省第四师范，这时毛泽东也考入这个学校。不久四师与一师合并，杨昌济便到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也随之转入一师。杨昌济看到毛泽东这个学生好学深思，成绩优异，十分赞赏；毛泽东看到杨昌济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也非常敬佩。当校长张干下令将毛泽东等17名学生

开除时，杨昌济等对毛泽东等同学的正义行动十分同情，要求张干收回成令。接着，杨昌济为此辞去一师的教职。但他和毛泽东等同学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他为了方便毛泽东等同学的学习与讨论问题，竟在自己家里专门辟出一间屋子，供他们使用。毛泽东等在杨昌济和其他进步老师长期的教育和熏陶下，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渐趋成熟。于是，1918年4月便倡导成立了新民学会。通过这个学会的酝酿与成立，杨昌济不仅热情地向他们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各种流派的政治学说、指导思想和伦理观点，而且传播了大量中国古典学术思想和历史知识。同时，还和他们一道讨论当时的时事政治，特别是热情地向他们推荐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正在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教他们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学风，1918年夏天，杨昌济赴北大任教，又推荐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和杨昌济一家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在杨昌济的赞许下，他和杨开慧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和恋爱关系。杨昌济对毛泽东的深情厚意，是令人难忘的。

再说毛泽东的岳母向振熙。1903年杨昌济出国留学，向和一双儿女在家艰难度日，一别就是近10年。杨昌济回国后，向即成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师母。1920年1月杨昌济逝世，留下的家资不多，向精打细算，供养儿女上学。后来毛泽东办文化书社，经济有困难，在杨开慧的请求下，向拿出杨昌济同事们捐募的一笔奠仪费支援。杨开慧与毛泽东结婚后，老人不顾一切掩护他们做地下工作，后来又为他们照看年幼的儿子岸英和岸青。1930年杨开慧被国民党杀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向振熙和妻嫂李崇德装扮成走亲串门的模样，护送岸英、岸青、岸龙三兄弟到上海……。女儿的牺牲，几个外孙流落上海，失去母亲，又无法同父亲联系，面对这种严酷无情的现实，老人的痛苦与悲哀可想而知。

再说妻兄妻嫂杨开智、李崇德。杨开慧被捕入狱，他们费尽心机设法营救。杨开慧牺牲，他们又冒着风险收殮尸体，并委托族兄杨秀生出面，办理棺木，掩埋了她的遗体。尔后，又设法营救她的三个孩子。这还不算，1938年杨开智、李崇德夫妇，又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杨展送往延安，让孩子继承她姑妈杨开慧的遗志，完成姑妈未竟的事业。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杨展在抗日战争中，在1941年同敌人进行反“扫荡”的斗争中壮烈牺牲。对女儿牺牲的这个消息，杨李夫妇直到1949年长沙解放才知道。

对这样一个为革命曾做出无私奉献、给予许多支持的家庭，对这个家庭中一位重要成员杨开智应如何对待呢？今天，革命胜利了，他提出进京找一个工作，难道不应该吗？难道是什么出格离谱的事吗？究竟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结果是田家英想象不到的，不过也应该是他预料之中的，毛泽东仍早毫不含糊。对他说：坚持照章办事。接着，毛泽东本人又向当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首道同志发出指示：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与此同时，他又给杨开智本人发了一封电报，其中悦：“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杨开智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劝告，根据湖南省委的意见，安排在省政府工作。因为他是1925年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因此有关部门根据他的专业和特长，决定他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

这不是毛泽东无情无义，更不是忘恩负义。而是他有自己做共产党人—

——也可说是做共产党的领袖的一套规矩，很有原则性，又很有人情味。那就是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但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事实上，毛泽东对杨开智一家是最富有情感的。1920年杨昌济老人病逝后，是毛泽东同他亲属和友人护送他的灵柩，从北京启运，返回长沙板。

仓故里的。后来毛泽东虽然身为党的领袖，在战争年代指挥千军万马，忙于军务，但还一直把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岳母——杨老太太牵挂在心上。1949年长沙解放后，杨开智将母亲健在的消息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电，敬致祝贺。当他得知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要回湖南省亲时，便托朱仲丽同志给杨老太太捎去一件皮袄，以御风寒。并送开智夫妇两块衣料。1950年杨老太太80大寿，毛泽东让儿子岸英前去湖南老家为老人拜寿，并带去两棵人参，让老人补养身体。老人见之，十分高兴。对岸英说：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赤子之心。老人还高兴地说，过去我常给他做些好吃的，现在不能做给他吃了。第二年，毛泽东又派岸青回湖南，看望老太太，以慰天年。除此而外，毛泽东每月都给老人寄生活费，一直到老人去世，从未中断。1960年老人90岁高寿，毛泽东特意捎去200元，以示祝寿。1962年老人逝世，毛泽东心情十分哀痛，迅即寄上500元，以作丧葬费用。并致电：“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可谓情真意切。

在杨开智要求来京参加工作的事情处理过后，还有两件类似的事情，同样给田家英留下极深的印象。第一是毛泽东的一个表兄给毛泽东写信，要毛泽东出面给胞兄文运昌介绍个工作。毛泽东外祖父家有8个表兄弟，从小相互关系都很好。文运昌是位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人。他既是毛泽东8个表兄弟中的一个，又是毛泽东16岁时到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的引见人和担保人，曾经向毛泽东推荐介绍过《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这个人在引导毛泽东接触新思想上起了关键性作用。毛泽东由衷地称赞他，感恩他。对这样一个表兄，提出要找个工作，又该怎么对答。毛泽东坚持的还是那条原则：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他毅然回信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这件事，就这样回绝了。第二是毛泽东当年的一位同窗好友，此人叫毛森品，是毛泽东在湘乡县立东山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后来两人又一同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学习，关系非同一般。解放后，毛泽东虽日理万机，还曾三次亲笔给毛森品写信，互问长短，交流情感。他还从自己的工资里抽出钱来，几次周济毛森品。然而当毛森品提出请毛泽东给他介绍个工作时，却也被毛泽东回绝了，他委婉地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

毛泽东是位非常珍重故友、学友之间的感情的人，对家乡长辈人和同辈人十分尊重，对晚辈人也很爱护。跟随毛泽东多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同志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湖南农村一位老太太，是毛泽东家乡的老人，来向毛泽东反映村里的事情。毛泽东一改待客常规，亲自搀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搀扶老太太坐，搀扶老太太起。走台阶时，毛泽东像孝子一般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这位老太太依靠着毛泽东，与毛泽东用一样的节奏喃喃着：“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老太太受

之泰然。但毛泽东念旧而决不为旧谋私，他坚持的原则还是那一条：有累清德者戒，不搞任人唯亲。这，新中国成立多年来已传为佳话，并成为党的一个良好风尚。

毛泽东同志的有累清德者戒的主张，大概和他一定不学蒋介石、不当李自成的想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李自成，革命胜利前的那几年，他几次提到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第一次是在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3年至1944年，党中央组织全党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问题进行讨论。最后，毛泽东对这次何论作了演讲。在谈到党内所犯几次骄傲错误的时候，他指出：“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编者注），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要从河北平山西柏坡进北平。一天，毛泽东问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的怎么样啊？”李银桥答：“东西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行动。”“这里呢？”毛泽东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见李银桥不解其意，又接着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要出发了，汽车马达已经轰鸣，毛泽东一脚踏在车上，一脚在下，油然说：“进京赶考去！”他信心十足，“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印象是多么深刻，对李自成的历史教训又是何等的重视。

李自成的历史教训的确是值得借鉴的。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幼年时替地主放过羊，当过骑卒和边兵。1629年他参加起义军，后来在闯王高迎祥的部下当了闯将。1635年，高迎祥等13家72营的首领，在河南荥阳开会，商量对官军围攻的对策，大伙采纳了李自成的计划。这不但显示了李自成的才能，改变了起义军分散作战的方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把明末农民战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636年高迎祥战死，李自成继承了闯王的名号。他带领起义军转战四川、河南等地，队伍很快扩展到90万人。他带领的起义军走到那里，就宣布那里“三年免征”或“五年不征”，“平买平卖，蠲免钱粮”，还到处宣传“迎闯王，不纳粮”。李自成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忱拥护与支持。此后两年，李自成的队伍发展到百万人左右。1644年4月，李自成带领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李自成和他的助手们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自满，滋长了太平麻痹思想，把几十万大军放在北京城，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结果很快走向失败。

毛泽东坚持有累清德者戒的信条，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也正是借鉴了李自成这个历史教训，实践证明他的确是一位比李自成更高明、更富有远见的人民领袖。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一朝天子，一朝臣”。中国数千年的旧官场，历来就是如此行事的。东晋王，人称是创造东晋的元勋，他的政策就是“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唐李隆基，于天宝四年夺取第十八子寿王李瑁之妻杨太真做贵妃，他不但自己纵情声色，极度淫侈，而且对杨贵妃的三姊（韩国、虢国、寿国三夫人）极端宠爱，还大搞任人为亲，封杨国忠为宰相。中唐李适时候，“兵是市井无赖，将是宦官私属”，宦官成为中央集权的把持人。宋赵构、秦桧等人，也是任人唯亲的典型，特别喜欢任用私亲和赃官，行贿以外，还要献媚。元忽必烈，凡官定制，正官必须

是蒙古人或色目人，次官才得用汉人或南人。次官如分左右，汉人不得居右（蒙古族居右）。至于世袭制，更是封建社会的常规了。明朱元璋就是采取前朝的成法，帝位规定由嫡长子孙继承，其他皇子封亲王，亲王诸子封郡王，王位都由嫡长子孙世袭。至清朝，任人唯亲之风更为加剧。清朝虽然标榜“满汉一体”，但实则汉人都无权位，特别是各衙门中掌管银钱的官员大多是满人。总之，这些君王官贵更是无法同毛泽东一代人民领袖相提并论、相比拟的。

《孔子家语·论理》中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意思是，比喻人应当像天、地、日、月那样大公无私。毛泽东不正是这样一个如天、地、日、月一样无私的人吗？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是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大学生，也不过在基层单位担任一个总支副书记的职务。全国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以后，毛泽东决定送儿子出国参加作战，有人劝阻，不要让岸英去。毛泽东讲了应该去的道理，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毛泽东听到岸英在朝鲜前线牺牲的消息，沉默良久，发出催人泪下的一声叹息，还是那句话：“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仅仅十几个字，便披露出毛泽东海一样宽阔的胸怀。

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在坚持干部路线方面，除了不论私交，善于把德才兼备的党的好干部，提拔重用以外，对党外一些有威望，有能力，德才兼优的人士，倒是能委以重任。建国时，推任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郭沫若等人担任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即是明显的例证。在政府部门部长的领导中，也还有不少无党派民主人士。不仅如此，就是对国民党起义人员，也能看其表现或对人民的贡献及能力给一适当的官位，并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这里，最能说明一点问题的是毛泽东对程潜先生的安排。

程潜，湖南醴陵人，字颂云，人称颂公。曾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和护法军总司令。1949年8月，在中共代表的帮助下毅然在湖南长沙通电起义。8月30日，毛泽东亲自致电程潜，邀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9月7日，程潜乘专列火车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亲自到车站迎接。当晚，毛泽东设宴为他洗尘。

毛泽东对自己的私交亲友要求工作掌握极严，而对程潜起义后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安排，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却考虑得至为周到。他先找程潜的族弟程星龄商谈，说：我原打算请颂公当西南招抚使，后来感到不那么恰当。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更不需要这么一个机构了。中央决定分设几个大区，其中的中南大区，属4野作战地区。我们有个党的问题，还有个部队的问题，所以想让林彪当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时，我们还都是学生，林彪比我年纪更轻。我想请颂公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不过从资历来说，又觉得有些为难。请你先考虑一下，再同颂公婉商。政府按月送给他特别费小米5万斤（币制改革后，折合人民币5000元），由他自己开支，不受任何管制。还说：颂公是老人了，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所房子，我们替他在北京也准备1所。他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职务，可在长沙住，也可以在北京住，只要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程星龄转达了毛泽东的这些考虑后，程潜非常感动，说：不仅是这些，毛主席还把属于军事机密的解放军向西南大进军的军事计划都

送给我看了，并征询我的意见。这是极其重要的机密啦！我同蒋介石共事二十二年，蒋的机密从未与闻。毛主席对我，是怎样地推心置腹啊！由此可见，毛泽东并不是一党一家的领袖，而是全国各族人民忠心爱戴的领袖，人们从内心深处呼出那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并不是因为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一铁的事实表明，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无论任他怎样个拼命的反对毛泽东，贬低毛泽东，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德是抹煞不了的。值得提出的是，在我们自己，可千万不可把毛泽东等老一代人留下的这些极其宝贵的东西给淡忘了。然而，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存在。人们在追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这些庄事，议论起当前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谈到为政清廉之时，认为当前有些单位选用干部，恰恰与当年毛主席、周总理的做法相反，存在的一个主要弊端，还是搞小圈子任人唯亲的问题，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在有些被任命的干部身后，总是有个什么阴影在晃荡。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个老问题了，不新鲜。但笔者却认为这是个远没有解决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在有些单位反而份在发展，或在创“新”。其表现概括起来：一是把儿子、媳妇、女儿、女婿或亲戚、朋友，安插在要害部门或关键性的岗位上，在一个单位盘根错节，形成铁板一块，你要搞民主选举、承包、透明度及优化组合什么的，他那里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讥之为，这是要化人民的天下、党的天下，为“张家天下”、“王家天下”、“李家天下”、“孙家天下”——个人天下。二是提拔重用自己顶头上司的子女，甚至连顶头上司的七大姑、八大姨也放在重用之列。对这些人入党、提干、入学深造（包括留学、出国访问），直至越级升迁、走热门等，都在一般人之先。搞不正之风的人有一种奇怪的心理：我不提拔他谁提拔我；我重用他的人正是要他来重用我呀。三是选拔重用自己身边的人，如秘书、司机、警卫员，以及自己办公室的人员，总之凡是靠近自己的人，都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对其中的有才之人，并非不可重用。问题是有些人什么德才好坏、什么年大年小、什么文凭不文凭，都不去计较，听话、顺手、会拍就是好干部。搞这种不正之风的人，往往还持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用来搪塞人的耳目：我是选用我熟悉的人，不了解的人我怎么用呀！人们给这号人的评语是：他们不是为事业找接班人，而是为自己安排“代理人”。

据说，任人唯亲又增加了新的内容，那就是任人唯“甜”，重用一些会给“甜”头的人。这种“甜”头有两层意思：一是甜言蜜语。正如有的人所说，有的领导喜欢听好话，喜欢听恭维的话，乐闻喝彩声。比如讲到成绩时，“甜”者往往把一扩大为十，即用乘法。当讲到缺点时，“甜”者往往把十缩小为一，即用除法。这些做法集中到一点就是溜须拍马，吹吹拍拍。二是请客送礼，即给一些物质的“甜”头，把上下级关系搞成“酒肉朋友”关系，或叫买卖交易、等价交换关系，把上下关系这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庸俗化。此乃也算任人唯亲的一个新支吧。这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中是没有的，他们对此是坚决反对的。

上述种种任人唯亲的怪现象，似乎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关系不大。其实不然，那些有累清德的种种措置，不仅使得人心离散，而且还使党内增长离心离德的倾向。它将阻碍德才兼优、年轻有为的人到关键性的岗位上大显神通。它将败坏党的优良传统、并助长新的不正之风继续蔓延，有碍为政清廉，影响国家四化大业的正常进行。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还证明，这些不正之风还有被坏人利用的可能。请想想看，如

此有累清德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怎不令人深思呢？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为我党多年的优良传统。在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一点是，那种一说干部子弟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就认为是不正之风，也是不对的。关键是看他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不是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老一辈革命家，不但是这一光荣传统的开拓者，而且更是这一光荣传统的维护者、力行者 and 遵守者，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那种任人唯贤的动人事迹和可敬形象，过去是，现在是，以至将来永远是我们学习效仿的榜样。“天地有正气，江山不夕阳”。为政清廉、唯才是举，于国家兴衰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一切搞不正之风有累清德者都在戒惕之列。

打开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人

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一生对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他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在军事上尤为令人叹服。

他自己似乎也这样认为。

1975年秋天，西德前总理施密特来华，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施密特对毛主席说：“我的国务秘书玛丽·施莱，很喜欢你的诗词。”毛主席笑了笑，然后回答道：“顺便说一声，我不会写诗，成就很小。但我懂得如何领导战争，如何打胜仗。”

毛主席说他“不会写诗，成就很小”，这是他在国际友人面前，过于谦虚的说法；他说“懂得如何领导战争，如何打胜仗”。这倒是客观地反映了他真实的情况。事实的确如此。

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指挥军队，同国内外强大的敌人，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打了数不清的大战恶战，真可称得上是“百战百胜”，“用兵如神”的统帅。通过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他不仅探索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且揭示了战争和战争指导方面的许多普遍性原理，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创造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宝库，在世界军事理论之林中占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主要是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总结了历史上的战争经验，探索出中国革命战争所特有的规律，用以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毛泽东军事思想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作战的指南。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革命军队的伟大实践，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先进军事理论来指导。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20世纪中国军事科学最佳理论成果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无疑是指导这一军事实践的最为坚实可靠的理论。只有把这一军事理论成果真正继承下来，创造性地运用于新的实践之中，才能进一步培育出新的军事理论奇葩，才能把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推向新的高度，才能有效地

加速国防和我军的现代化建设。

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和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于实践中，尤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那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是指导军队作战、训练和建设的指南，而且也是粉碎国内外敌人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和进行颠覆阴谋和一切破坏活动的强大思想武器。西方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以其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为后盾，正在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企图通过“没有硝烟的战争”来实现过去用军事手段未曾达到的目的。他们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往往把军队视为重要障碍，为此他们企图通过多种渠道对军队进行渗透。而国内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则与之相呼应，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企图使军队脱离党的领导，蜕变为资产阶级军队，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要使军队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武器，大力加强思想建设。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读一点“毛泽东”，有利于清醒我们的头脑，有利于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有利于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朝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方向胜利前进。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至少包括：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人民军队建设；

国防现代化建设理论；战争观及方法论，即毛泽东军事哲学、军事辩证法这样几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它的主要内容是：

关于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战争观；关于建设人民军队的理论；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关于军事辩证

法，等等。最近以来，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这当然包括“读一点”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包括学习与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理论在内。

读一点“毛泽东”，无疑就包括读一点毛泽东的军事著述、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从军事战略、军事理论的高度来认识毛泽

东，来了解毛泽东。这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军事上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价值来决定的。正如不久前军事科学院蒋顺学院长在全军毛泽东军事思想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指出的：

“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军事活动的探索。古代中国兵学发达，产生过《孙子》那样的千年不朽的军事著作。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

局限，那时对军事规律的认识尚处于朴素的阶段。古希腊、古罗马的军事学，基本上属于对战争史实的感性记述。欧洲中世纪对

战争和军队问题的考察，明显地被宗教神学阴影所笼罩。近代欧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其军事思想逐步摆脱了神学唯心

主义的禁锢，出现了像《战争论》那样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著作，但居于支配地位的则是机械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性飞跃。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崭新世界观考察战争和军队，军事学从此才建立在真正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由于中国革命战争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艰难复杂程度之

甚，最终胜利之辉煌，均属中外战争史上之所罕见，在这样的战争实践中所创造的成功经验也就异常绚丽多彩。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集古今中外优秀军事理论成果于一体。它既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各时期、各侧面的特殊规律，也揭示了现代中国条件下军事斗争和军事建设的基本规律；既揭示了整个军事领域的普遍规律，也为研究和解决军事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长久稳定的指导作用。当然，毛泽东军事思想并没有结束真理，还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历史条件下的某些变化，只能为它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对象，并没有降低它固有的科学价值。”

我以为，这一段话是很有些道理的。

现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有着极高的评价，对于我们中国各族人民，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那就更应该是传家之宝，是不可或缺的“粮食、武器、方向盘”。因为它不仅过去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军情，而且今天仍然适合我们的国情和军情，并永远是我们战无不胜的指导思想。所以，要读一点“毛泽东”，就理应包括读一点“毛泽东军事著述”、毛泽东军事思想，并且要当作一项重要的内容来学习与研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排除对于西方、外国先进军事科学理论、经验和技术的学习、吸收和借鉴。但从总体上说，西方、外国的军事科学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军情的。因此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取代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只能吸取或借鉴，更不能代替读一点“毛泽东”。

近年未，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同其他方面的理论研究一样，取得了很大成绩，在不少领域有了新的突破。这方面学术研究空前活跃，研究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先后出版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探》、《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毛泽东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初探》、《学习毛泽东指导战争的伟大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国防观念现代化》等专著，以及大量的学术论文。有些军事刊物开辟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专栏，有的单位还专门出版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期刊，有关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增多。

例如，1987年8月，由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和大连陆军学院共同发起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国防现代化”学术讨论会，就比较集中地展现与交流了近几年毛泽东军事思想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这次会议推出近百篇论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指导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论证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辩证关系，探讨了把毛泽东军事思想运用于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的新经验，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方面作出的新贡献。

1988年9月，国防大学等军事院校和有关单位，在北京召开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与发展讨论会。会上，大家热烈讨论了关于新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于邓小平在新时期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新贡献，关于新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热点等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军事专业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新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运用与发展讨论会，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根源、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以及新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的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多侧面地探讨。1990年9月，在合肥召开了全军

毛泽东军事思想学术讨论会。会上，就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自觉地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排除干扰，如何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理论等等进行了广泛地研究。在学习方法上，大家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遵循与创新、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的观点，从根本上讲，就是把握理论本质吃透实际。

同时，群众性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活动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从而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引申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成果还远远不能满足国防建设的要求，继续拓宽和深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既是摆在广大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更是发展我国现代化军事理论，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拓宽和深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首先应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进行再认识、再概括。现在有些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战争年代或建国初期的水平上，即停留在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三大块”内容的划分上。这是远远不够的。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毛泽东同志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总结了历史上的战争经验，探索出了中国革命战争所特有的规律，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宝贵财富，内容非常丰富，并且随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续实践、运用丰富和发展，及人们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原有的体系概括已经容纳不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宏博内容和深刻内涵，同时按照原有的体系结构去开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也很难满足新时期国防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需求。⁸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就是那么几条，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可研究、可拓展的了。这是研究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

其实，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不仅仅是以往概括的那几条。例如，从宏观方面看，至少有这些方面的内容可以作深入地探讨：

毛泽东军事思想所含的伟大精神实质，关于对战争和军队建设一般规律和一般指导法则的认识；关于对中国革命战争和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建设的总体规律和总体指导法则的认识，针对中国革命战争和我军发展、国防建设各个阶段的实际情况，从战略高度所作的具体决策；军事辩证法的广泛应用及发展。

再如，毛泽东的国防现代化思想、军事后勤思想、国防经济思想，毛泽东关于战略转变的指导艺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世界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国外的影响，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我军各个建军领域及作战方面的丰富和发展，等等，都值得从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高度上加以研究和作出更科学的概括。

这些，无论在当前或今后，都是具有较强价值的。只有从新的视角。采用新的方法，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及其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作出新的探讨和归纳，才能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拓宽和深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必须把对其书本的研究和对其实践的研究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毛泽东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首屈一指的集政治家、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伟大人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战

争、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实践中，他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以及蕴含着丰富军事思想的政治、哲学、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著作，这些都是进行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珍贵资料，应该进一步研究、分析并向深处开掘。但是，除此而外，在以下两个方面也需要作出积极的努力：一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现成理论，即已经上了书的东西作指导，去总结我军以往作战、建设的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中探索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奥妙，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这样总结起来容易，而做起来颇难。最近几年，通过对我军战史、军史的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很不够。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的问题是，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着不能很好地把我军作战、训练、建军或科学实验的实践上升到理论，即理性认识的高度的现象，往往不同程度的陷于就事论事、资料堆积或资料搬家。有的领域也还未曾完全涉猎到，或者说还没有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如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角度总结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有人说这还是一个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再如，全国解放战争，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毛泽东指挥大的战役最多、最成功，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走向成熟的一个时期。虽然经过一番研究探讨，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很不够。要想拓展与深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这些方面都是不可忽视的。

二从没有上书的有关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伟大军事实践中，来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些大量体现在过去的文电或实践活动的事迹之中。上了书的理论著作是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根据，但并不是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唯一根据。与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军事生涯相伴随的作战、建军和国防建设的丰富而生动的伟大实践，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深入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广阔天地。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党独立地领导和开展革命战争达 22 年之久，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密集、最复杂、最激烈的一段，战争规模之大也是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所不能比拟的，就是 83 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毛泽东同志本人亲自指挥的战役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更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大多数军事家所望尘莫及的。新中国成立之后，除了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之外，在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上也取得了巨大成绩。

丰富生动的实践，蕴藏着丰富生动的经验和有待归纳、概括的理论。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关文献理论，固然是对这些实践和经验的理论升华，但是决不等于已经把我军作战、建军和国防建设的经验毫无遗漏地总结完了，全部上升为理论了。由于实践和认识上的客观或主观局限性，一般他说都不可能把自己的亲身实践和间接经验全部上升为理论。战争年代，毛泽东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南征北战，戎马倥偬，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过多的精力从事军事理论的著述。他们亲身创造的许多成功经验，没有来得及进行理论加工，存在着不少未经雕刻成“美玉”的“璞石”。

不言而喻，实践形态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比文字形态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勤于我军战史、军史和我国国防建设史的耕耘与研究，就一定能够发现比书本上更多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晶体。前人的遗产宝藏，要由后人来挖掘、认识，这可以说是军事理论研究中的一种带规律性的普遍现象。今天，我们责无旁贷地应该担负起深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光荣任务。这

是毫无疑问的了。

从更宽大的地理跨度和更久远的历史跨度加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也是拓宽和深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任何一种科学的军事思想，都是某个历史时期、某种社会形态的军事规律的客观反映，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在帝国主义时代，灾难深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人民，为争得自己的翻身解放而找到一条通向胜利坦途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经验。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导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战争活剧，并产生了符合客观规律的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出现在 20 世纪的中国，是世界上的一大奇观，具有跨国界的影响力，声威播扬五洲，启示了被压迫人民的革命道路。近三四十年来，世界上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胜利的号角此伏彼起，许多老牌殖民主义者在弱小民族的斗争面前纷纷败下阵来，这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力不无关系。正像马克思主义不单是德意志人民的精神财富、列宁主义不单是苏联人民的精神财富一样，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从事军事斗争和军事建设的光辉指南，而且对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所进行的军事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斗争和建设，也有宝贵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当今，毛泽东军事思想正以无与伦比的军事理论优势，在世界上产生起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同《孙子兵法》一样，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军事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并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在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和日本等国，出版了不少反映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成果的专著和论文，他们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价值、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日本军事理论家林克指出：毛泽东创造性地科学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军事理论，建立了与资产阶级军事学说在本质上不同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和军事原则，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菲利普·戴维逊说：毛泽东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列举了毛泽东的历次战争经历后又指出：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英国的迈克尔·爱略特·巴 85 特曼在他所著《东方的失败》一书中称：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国家看到了许多没有政治见解的军事天才人物。在过去 25 年当中，我们往往更多地看到几乎没有什么军事知识的政治冒险家，如当今世界上希特勒、卡西姆一类的人物。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既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又是最伟大的军事家，这就是政治军事天才人物毛泽东。这种天才演变成为一种万古长存的思想，这种思想正开始对历史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还把毛泽东称颂为“打开我们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人”。然而，在我们国内军事学术研究领域中，就毛泽东军事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对世界革命人民的影响问题，做出全面、系统而科学论断的著述，并不是很多的。这个问题该引起我们的深思。由此可见，把我们研究的视角放在更宽大的世界地理跨度上去探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涵和外延、个性和共性，高屋建瓴，更全面地认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时代意义是多么必要。

从更久远的历史跨度上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我国的一部文化史，伴随有一部层出不穷的战争史。战争繁多，兵法发

达，是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一大特点。有人统计，我国历史上发生的战争达四五千次之多，相当于世界上战争总数的近 1/3，我国近代以前的兵书达 2000 余部，比同时代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兵书总和还要多。频繁战争和大量的兵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军事思想的丰厚。但是由于政治的、经济的、地缘环境的、文化心理传统以及各个时代的军事家认识能力的种种局限，我国传统的军事思想既有精华和优长，也有糟粕和缺陷。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今天，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其科学的“体系、深远的理论和全新的内容展现在我们面前，正是毛泽东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统军事思想的精华和优长，同时”剔除和弥补了传统军事思想的一些糟粕和缺陷的结果。譬如：

——在战争观方面，我国的传统兵学素来崇尚道德，对战争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强调用兵作战的目的是为了伸张正义，维护道德，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用兵要以德服人，认为“有德不可敌”。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战争的性质作了具体的阶级分析，科学地揭示了“德”的内在含义，克服了传统兵学关于“德”的论述过于模糊的缺陷。

——在战争指导上，我国历代的著名军事学都惯于和善于出奇制胜，以谋略制敌，传统的兵学哲理性强，具有鲜明的朴素辩证法特色。毛泽东军事思想吸收了传统兵学中的科学内核，抹掉了一些唯心主义的神秘色彩，使之牢牢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并在实践上把运用谋略于战争推向出神入化的地步，从而更加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

——在对战争力量的认识和运用上，我国历代军事家们都是强调将帅主宰一切的英雄史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之初，许多党内外布尔什维克也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突出的超人之处，是最先注意到农民问题。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农业国家，农民始终占据着社会历史的中心舞台。能否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这一特征，成为革命能否成功的重要前提。毛泽东正是率先认识到这一点，创造性地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重要理论观点，并由此出发创立和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从而动员起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使中国革命战争有了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在军队的领导制度上，我国历史上盛行“私兵制”，将帅至上，无视国家，政治上宗派林立，军事上系统森严，军队的性质和行为是建立在个人品质上的。“岳家军”、“杨家将”还算是 87“正义之师”，可那些拥兵自重的军阀，打家劫舍的行帮，往往给国家造成的是分裂，给社会带来的是动乱。即使是所谓国家的军队，多数情况下也是控制在个人手里。毛泽东在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实践中，提出诸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一系列方针原则，严禁争个人兵权，这应该说是历史上恶劣的“私兵制”的彻底否定。1945 年 10 月 9 日，他在答英国记者甘贝尔问时就这样说：“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造的参考。”

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和军事传统积淀中产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几千年的文化史、战争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章，其中不少内容还没有纳入大家研究的视野，甚至存在未经开发的“处女地”。要拓展与深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领域，这也是不容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因毛泽东同志晚年政治上的一些失误，总以为似乎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失去了许多光泽，研究起来不那么理直气壮、不那么起劲了。这是一种误解。毛泽东同志晚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过失误是事实，但同时也有不少正确的理论建树，特别是在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方面，有许多成功的伟大尝试，这一点早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这也是拓展和深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一个方面。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绝不能以偏盖全。毛泽东军事思想放射的真理之光将是永存的。对这个军事补学理论多棱角艺术结晶体的研究，远没有穷尽，而是方兴未艾。要拓展和深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领域，不仅仅在于明确从哪里拓展，向何处深化，更重要的还在于解放思想，纠正与克服我们研究者本身思想上的淤滞和认识的片面性，既要从宏观着眼，又要从微观入手，坚持科学的求实态度和不懈地创新精神。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研究、指导我军建军和作战，最大的特色就是力戒迂腐，不满足现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坚持不懈地改革与创新，不把既有的成功学说、观点、结论、原则绝对化。在我们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以前，应该说科学的军事思想理论早已存在。在中国，有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辞典；在国外，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关于战争的许多科学论著。国内外一些资产阶级军事家（如克劳塞维茨等人），对战争规律也作了若干正确的揭示。但是，毛泽东等人并没有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紧密地结合中国的实际、时代的特征、任务的要求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和自身实践，推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克敌制胜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军事思想。可以说，中国革命如果仅靠孙子兵法、仅靠从外国搬来的教条而没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目前，读一点“毛泽东”，或者说读一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进而使这一学习与研究得到不断深化，我以为深化和拓展学习与研究的领域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思想的深化，是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恶劣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对待毛泽东军事思想上，主要的表现就是四“论”：一是“过时论”，谁要是一提学习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人就会搬出“毛泽东军事思想过时”的论调，说那是战争年代的东西，和今日的国情军情不适应了，二是“学派论”，有的人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归结为一个学派、一个支派，这在外国学者中有，在中国学者中也有，三是“保守论”，或叫“僵化论”，这不是讲别的，而是讲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人，常拿这种论调当作大帽子往马克思主义者头上扣；四是“机械论”，有的人认为上了书、铸成文字的，才叫毛泽东军事思想，表现在斗争实践中的、活生生的事实，不叫毛泽东军事思想，其要旨也是“否定论”。这种种的论调 89 不消除，对读一点“毛泽东”是会有阻碍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坚持、继承与发展的统一论者。要想继承与发展，首先是要认真地坚持。而坚持的前提就有个立场问题，即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上。列宁当年分析过“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想继续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条

件的改变和各国当地的特点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学说，另一派是想推翻马克思学说中的若干相当重要的方面，例如，在哲学上不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而是站在新康德主义方面，在政治经济上是站在那些硬说马克思的某些学说是‘倾向论’的人们方面等等。” 我看，目前对待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责难、推翻与否定。一种是坚持、继承与发展。显然前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后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可以断言，只有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读一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理论才有可能。两股道上跑车，向两个方向使劲，其结果是不可想象的。

希望之光常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之所以能够历久不衰并充满活力，最根本的东西就在于大胆创新。我们必须把改革、开放和竞争的基本精神引进到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中来。克服淤滞的思想障碍，改变陈旧的研究方法，以竞争的精神去创造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丰硕成果。

注： 《解放军报》1990年10月21日，第3版。

《解放军报》1990年10月12日，第3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79页。

毛泽东开拓的建军原则永存

一般说来，世界上任何一种事物，都有他最宝贵而又最值得珍惜、最值得称道的那么一种东西。作为当今中外军事史上的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当然也毫不例外。这支军队，在建军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而由毛泽东同志创造开拓的“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无疑，是最成功、最宝贵，因而也是最值得珍惜、最值得称道、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条。“党指挥枪”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是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的灵魂。实际上人民解放军几十年的建军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成长、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而在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回顾与总结、继承与发扬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经验，实在是一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事情。

一个伟大的创举

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工作，不妨可以追述到 20 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4 年 5 月，孙中山成立黄埔军校时，我党除了从全国各地选派一些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到校学习军事以外，还先后选派了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熊雄、鲁易、包惠僧、高语罕等同志到校担任领导和教学任务，同时成立了特别支部和以蒋先云、陈赓、曹汝谦、李汉藩等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火星社”，创造革命的政治工作，宣传革命道理。

1925 年 8 月，国民政府蒋黄埔军校的学生扩大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将归附革命阵营的粤、桂、湘、滇、赣等军阀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四、五、六军等。在这些部队中，仿照苏联建军的办法，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些职务和部门的工作，多由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黄日葵、彭泽湘等同志担任。

为了迎接北伐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要求所属党的组织必须不断扩大革命影响，坚持不懈地进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于是，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在 1925 年 12 月开办了政治讲习班，讲习班以坐习政治理论为主，由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张太雷、邓中夏等同志亲自任教。

在北方，李大制同志派遣宣侠父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到冯玉祥的部队开展政治工作，后来党又先后派刘伯坚等 200 多人到冯玉祥的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

在历次东征和北伐作战中，共产党员都是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带领广大官兵英勇杀敌，从而获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直到 1926 年底为止，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就有 1500 多人，仅在二次北伐作战中牺牲的就达 400 多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北伐和东征的胜利，就是“以共产党人的模范作用换来的”。

在这个时期，党还建立了自己少量的正规部队。这主要就是，在建立陆海大元帅府铁甲队的基础上，建立的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军攻下武昌后，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的第 24 师、25 师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以朱德为团长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以及后来以叶剑英为团长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此外，在北方还有以中山军事学校与国民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合编而成的许权中旅，等等，党还派人到旧军队中做争取和改造工作，如派周逸群到贺龙任师长的独立 15 师发展党的组织，

建立政治工作，宣传党的主张，使其走上革命道路。

党在这一时期，虽然还没有充分认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还没有意识到抓武装力量领导权的重要性，但在军队问题上已做了大量工作，并从斗争实践中总结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对这一段党抓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问题，后来毛泽东给予了充分地肯定。10年后，他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还这样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毛泽东还说：“1924年到1927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

然而，创造新型的革命军队问题，特别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还是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党领导全国人民武装起义创造红军的过程中逐步解决的；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则是在这一斗争过程中率先提出和解决党对革命军队绝对领导的开拓者。明确而坚定地提出和实践党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缔造中国新型的革命军队中一条首要和根本的原则。这一建军原则的提出和实施，既是学习苏联红军和我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抓军队、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的必然结果，更是毛泽东同志以一个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家的气魄，极富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的必然结果。这在我军的建军史上，堪称是一个伟大创举，就是在世界无产阶级建军史上，也可以说是一大奇观。

毛泽东根据党的“八七会议”决定，于1927年9月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并按照党中央的规定，把起义部队命名为工农革命军。在这支起义部队中，有一部分是工农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和深受旧社会压迫的贫苦工农子弟。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散兵游勇、旧军官和游民无产者，还有一些地痞土匪分子。这些人经受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在长途转战，向井冈山进发的过程中，叛变逃跑，造成部队大量减员。这支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由原来的8000人，剩下不足千人。为了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为了使这支军队能够执行党的土地革命战争新的历史任务，并能够经得起严酷斗争环境的考验，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对部队进行了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重点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营、团建立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建立党小组，和连、营、团各级设立党代表的新制度。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更是一条富有创造性初极大重要性的原则规定。从此，即从组织上确定了党对军队实施领导的制度，这是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第一步。

工农革命军在三湾改编后，由毛泽东率领于1927年10月进至井冈山。第二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民武装也到达这里，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成立后，经过半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部队本身建设上也有很大发展。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进军，开辟了包括井冈山在内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的革命道路越走越宽。

然而，由于当时红军内部旧军队成员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广泛存

在，部队中产生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各种不良倾向。当时毕竟还处在红军的初创时期，对于如何创造新型的革命军队还在进行探索。由于认识上的差异，红四军领导层在建军问题上曾一度发生过意见分歧。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也未能正确解决建军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在上杭县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并结合部队的实际，为大会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内容极为丰富，主要是：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规定了对部队进行马列主义及党的正规路线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原则；规定了部队中党的组织建设的原则，规定了部队实行民主管理和说服教育的原则，以及规定了红军中军事工作系统与政治工作系统的正确关系、等等。

决议案开宗明义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规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针对当时部队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还指出，红军中军事工作机关和政治工作机关的关系，是在党委领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的关系，而不是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更不是所谓“司令部对外。”——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针对当时部队中存在的极端民主化问题，决议要求党“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为了健全红军中党的组织，提高党员质量，决议针对非组织观点问题指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关于党的组织路线问题，决议指出，“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决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每班不能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以排为单位建设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的分配到各班”。并针对当时党组织的松懈问题指出，“将旧的基础厉行清洗。如政治观念错误、吸食鸦片、发洋财、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与此同时，对新分子入党提出五条具体

要求：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吸鸦片，不赌博。

古田会议决议各项内容归结起来，其基本精神就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制度上具体展现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这些，即是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首要条件，是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纲领性的文献，更是数年来我们建设一支“党军”的宝贵依据。为建设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在我军建设的历史上，曾有着许多座重要的里程碑，而古田会议时，毛泽东为红四军起草的决议案，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座。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既通俗又深刻地再一次重申了这一建军的重要原则，他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在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军队历来是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都是帝王将相的私有物。辛亥革命后的一段相当时期内，也是如此。“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从袁世凯、曹琨、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到蒋介石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没有一个不是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的。在他们那些军队的旗帜上写的，无一不是他们自己的大名。

唯独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新时代，到了共产党、毛泽东的时代，一反陈规，从根本上翻新了军队的性质，把军队变成了革命的工具，变成了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在我党的革命史上，曾有过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上百次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之后，诞生了一支支武装队伍。然而，在那些队伍的旗帜上写的，却不是他们个人的名字，而写的是两个共同的字：“党军”。那些老一辈革命家许多早已故去，可是他们亲手培植起来的军队，却一直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一直高举“党军”的旗帜。全军将士时刻牢记毛泽东的教导：“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谁能说，这不是一个伟大的开拓、一个伟大的创举呢！

在斗争中前进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提出，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同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无产阶级武装斗争学说的重大发展，它决定了我军这支人民军队忠于党、忠于祖 1 97 国、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最高的道德标准和最突出的政治本色。然而，这一重要建军原则的坚持、运用、贯彻与逐步健全，却是从不断地同种种错误思想和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得以实现的。

1930年5月，党中央召开全国会议，这次会议对红军适应形势的发展，从游击队向正规红军的转变起了促进作用，但也反映了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一些主张和政策，在会议颁布的《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军事指挥员必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团委与政治委员间发生争执时，团委应当执行政治委员的指示”。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过分强调政治委员的作用，而削弱了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的问题。这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的第147号通知中又规定：“红军本身的领导机关即由政委、党的书记、军事主管官三人组成军事政治苏维埃（即现在的前委），以政委为主席，决定一切工作。”这样一来，就更加助长了削弱党的领导现象的发展。

1931年1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排挤了毛

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对红军的正确领导以后，把问题进一步推到严重的地步。他们“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只知照搬，不知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并热衷于发展政治工作的形式主义。特别是在这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上，错误地作出了取消红军党委制的决议。决议指责红军的党委制犯了“党的包办主义错误”，指责红军的党委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理论的遗毒”，“应即取消”。会议还提出彻底“改造”红军中的党组织，“转变”党在红军中的一切工作的错误主张，而把政治委员作为党在红军中的全权代表，用个人领导代替党委制的集体领导。这就为在红军中，正确贯彻执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造成极大困难。

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欢迎，而王明等人的错误主张却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抵制。许多单位不愿意轻易放弃“曾经实行有效”的党委制，因而对那些错误的决定迟迟不去执行，有的部队名义上取消了党委制，实际工作上还是执行的党委集体领导的原则。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党和红军的错误领导，实际上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为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提供了新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加强。在继续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多次强调：“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恢复了红军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加强了连队党支部建设。首先是在中央红军军团一级领导层建立了党委，接着，2月1日又给远离党中央转战湘鄂川黔边地区的红二、六军团发出指示，要求他们迅速恢复和建立党对军事的集体领导制度。明确指出：“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肖（克）、王（震）为委员，贺（龙）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2月5日又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央分局和红军部队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和其他二人组成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应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在加强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的同时，红军总政治部于2月15日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以最大力量，在短期内建立连队中党支99部工作。接着于4月16日发出《关于连队支部干事会（按，即支委会）组织问题的命令》，重新规定了连队党支部的组成和所应该进行的各项工作，5月2日，总政治部又发布《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的组织，“最高度的提高支部在连队中的领导作用”，“要使支部在连队中起最高的领导作用”，“要消灭支部由书记或指导员包办的现象”。“连队的指挥员及指导员应尊重支委的职权与提高他们的威信，并积极帮助支书与支委的工作”。

如果说，在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上，克服“左”的王明错误路线曾经历了重要斗争的话，那么，克服右的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则更是一场严重斗争。1935年6月，长征中的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党中央随

即确定了北进方针。之后，8月初，中央作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再次重申了北进方针，并深切地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可是，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同焘却拥兵自重，把军权高于党权，当一、四方面军于9月上旬快要走出草地、胜利完成北上任务时，他公然违抗党中央的命令，向党闹独立性，甚至另立中央，企图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中革军委同张同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进行了坚决斗争，从而保证了党的团结与统一，维护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至理名言，就是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讲的。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以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原则的贯彻，又面临党内、军内和党外、军外种种新形势的考验。在我党的努力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出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情况。国民党蒋介石则以为这是“解决中共及其武装”的极好的机会，故而提出：红军改编后，要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派人参加，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政府派人充当，并提出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各师直属行营（南京）指挥，参谋长也由南京派遣，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还十分荒谬地提出要“朱毛出洋”。与此同时，在我们党内军内有的同志对国民党蒋介石缺乏应有的警惕，出现了以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为荣，不愿到艰苦地区去工作等现象，加上受到王明推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军队中也产生了削弱党的领导的现象，曾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军阀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也有所发展。

这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此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断然“拒绝了国民党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坚持改编后的红军应有“独立自主的指挥权”、应“独立自主担任作战任务”，同时制定了红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这样一来，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设立了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的指挥部，随后又同意将红军在南方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名义发布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还曾明确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告诫全党全军：红军虽然改编，但有一条不能改，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员不许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动摇。这样做的结果，致使国民党蒋介石那种企图通过改编未夺取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进而达到控制红军以至消灭共产党的阴谋，不得不最后宣告破产。

改编后，有的同志对于要换上国民党军队的帽子，想不通。刘伯承在一二九师抗日誓师大会上，激动而又耐心地解释说：“同志们，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决不会动摇！”“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

白的，可我们的心永逸是红的。”

由于毛泽东及全党的努力，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及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不因“改编，而改变。事实上也是如此，除王明等极少数人以外，全党同志对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这一建军的根本原则，从未动摇。抗战8年，我军由5万人发展到120多万正规军，恰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为了继续坚持古田会议决议精神，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毛泽东还亲自写信给谭政、莫文骅同志，信中称：“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具体指导谭政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这个《报告》对我党我军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政治工作，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明确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任务和方针，成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又一历史性文献。这个文献对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全国抗战力量的中流砥柱，人民武装力量的大幅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股“交枪做官”的右倾思潮，企图通过和平谈判，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夺取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对此，毛泽东给了蒋介石一个既幽默又肯定的回答：“交给他们（指国民党蒋介石——编者），他们岂不是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又一次挫败蒋介石的政治阴谋。为了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效地对付蒋介石发动的全面进攻，解放战争开始后，各部队认真贯彻落实“七大”的精神——按照古田会议确定的原则，在部队中先后恢复了各级党委，实行对军事、政治工作的一元化领导，继之，1947年总政治部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条例草案》，明确规定营以上各级设置党委会，“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之一切领导与团结的核心”，“支部委员会为全连之最高领导机关”。同时撤销了“由司令员、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团以上各级军政委员会、旅以上各级党务委员会和团总支、营分支。至1948年9月，毛泽东又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后来，毛泽东针对实际工作中产生的问题，对党的领导问题还有多次论及，这样，使得党对军队实施领导的根本制度就更加完善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在这方面的斗争实践并没有因为由战争环境转到和平环境而放松。因为党内某些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封建军阀主义思想影响严重的人，又在“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题上作起文章来。如高岗提出了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鼓吹“军党论”。后来，林彪反革命集团又大肆宣传军队由林彪“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党营私，大抓军权，江青也竭力插手军队。他们都处心积虑地谋求个人的兵权，其目的就是实现反党篡权的野心。然而在全党全军全民的一致反对下，他们的罪恶阴谋都未能得逞。毛泽东在总结历史教训时曾指出：“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决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103

60多年来，许多历史事实都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能不能很好地贯

彻毛泽东开拓的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即能不能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关系到人民军队能不能保持无产阶级性质、能不能成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强有力的工具的问题。我军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并胜利完成历次作战任务和其他一切任务，直至发展到今天拥有相当数量、具有现代化先进水平的强大国防军，实际是由于党的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根本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宝贵的，但是来之不易，它是从同种种错误倾向长期斗争的实践中得来的，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因此，我们应该倍加珍惜。

在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提法，是1932年红军总政治部下发的几个有关文件中，以“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字样开始载入史册的。但早在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把这一建军原则，不仅作为指导思想已经确立起来，而且已经贯彻到红军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后来，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又不断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许多精辟论断，使这一原则逐步得到完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和朱德、彭德怀等几位老师，对这一建军原则的确立和完善，也都从实践和理论上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坚持与完善又有新的建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军思想，“党指挥枪”建军原则的确立与发展，是全党全军的宝贵财富，然而纵观历史和现实的全局，毫无疑问，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做出的贡献却是最突出的。

历史的新要求

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后反复强调：“加强军队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符合我军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英明论断。“党指挥枪”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是处理党和人民军队之间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从理论与实践、老传统与新情况的结合上，认真学习与研究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创立的“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毫不动摇地继承坚持下去，是当前加强军队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我们学习与研究人民军队建军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我们在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原则和制度。如果要问，究竟如何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呢？那末，我以为概括地说来，主要的就是：

——建立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作为对部队领导的核心，军队必须无条件地、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军队闹独立性，都不允许争个人的兵权。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不经中央和军委授权，任何个人都无权擅自动用和指挥军队。

——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坚持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及党“支部建在连上”等制度。除了党和它的助手共青团员以外，其他政党、团体和任何宗教都不能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和进行活动。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对军队实行领导的根本制度，部队中的重大问题，在各级党组织讨论后，由军政首长分工负责贯彻实施。

——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对军队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军队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和坚决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以保证军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其中最重 105 要的是保证军队的一切活动，都能服从和服务于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思想、政治和行动上同中央保持一致。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还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许多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这就是说，通过许多德才兼备的干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带领和影响群众，坚决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实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作用是无声的命令。党的一切号令，终究是通过她的各级组织和在这些组织中工作的干部党员实现的，作为她缔造和指挥的军队也丝毫不能例外。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是“建军之魂”、“立军之本”，是人民军的命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我军当前的实际出发，着眼于中国的大势和世界的大势，对这条建军原则，不仅不能放松，而且急需下大力抓紧、抓好，继续坚持下去，党中央、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建军原则的继续贯彻。邓小平同志说：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江泽民同志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更好地发扬人民军队忠于党的优良传统，使我军永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对我军建设的这个根本原则，都不能动摇。杨尚昆同志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还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要自觉地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而奋斗，坚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就是说，“党指挥枪”这一马克思主义建军原则，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军建设的根本。然而，有一些对我军的建军史了解甚少，或对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原则和传统制度不大清楚的人，或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治军之道的人，竟认为我们“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过时了，认为“那是战争年代的东西，不大适应新时期军队发展的需要了”，甚至错误地认为“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有化”倒有些道理。这是当前我们队伍中学习研究我军的建军史、继续坚持“党指挥枪”建军原则的一大思想障碍，必须予以清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后来又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列宁的口号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他还指出：军队是“为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这支军队“现在由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这支先锋队领导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遵照马列主义军事原理，在中国建立了

自己的军事武装，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即“绝对”二字发展成我军建军的一大特点和一大优点，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军队建设史上的一“绝”。这一“绝”也就是一“宝”，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需要坚持下去。这是因为：

第一、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是继承与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继续保持人民军队性质的需要。

我军在几十年的征战和建设 中，养成了许多与中外军队不同的、别具一格的非常优良的传统。这些优良传统主要是，心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尊干爱兵，官兵一致，上下一致，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机动灵活、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等。然而，这其中 10 最重要的一条优良传统，是听党的话，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党指向哪里就奔向那里，党指到哪里就打到那里。由此绘成这支军

队攻必克，守必坚，所向无敌的那么一种高大英雄形象。铸造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光荣传统，是我军一切优良传统的核心，是军队生存的命脉。这一点，对经过战争考验和受部队生活长期熏陶的老一点的同志说来，是有深刻体会的，而且是坚定不移、坚信不移的。但是，正如最近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所说，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部队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和部队成员的不断更新，不仅是那些年轻战士，就是干部、甚至有的中高级干部，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党指挥枪”这一建军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都缺乏深刻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关键时刻，有的竟发生动摇。这种状况是令人深思的。

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这样的教训，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太平天国运动，在大约两千年的过程中，曾兴起过大大小小数百次，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武装起义、武装斗争。他们也曾有过好的愿望、好的纪律、好的斗争成果，有的也曾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和尊敬。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领导，最后都不得不走向失败的结局。

由此可见，无论从历史的教训还是从我军的现状出发，都要求我们从建军的高度着眼，必须抓紧抓好“党指挥枪”这一优良传统的宣传教育，下大力强化“党指挥枪”的思想意识。常抓不懈，深深扎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军人民军队的性质长久不变，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是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职能建设和正确履行其职能的需要。

在谈到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职能建设和如何正确履行其职能的时候，人们不能不首先想到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军队”。列宁在 1905 年发表的《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一文中称：“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后来，他还说过这样的话：“红军比什么都重要。苏维埃俄国的每个组织都要把军队问题放在第一位，”毛泽东也指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我军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保卫者和民族利益的维护者，是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钢铁长城。抵御外来侵略和军事威胁，巩固国防，保证领土主权完整，是我军的主要职能。同时，我军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反对暴力颠覆、捍卫国家政权，保证国家有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正常进行，是我军职能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 40 多年来，国际敌对势力一直企图使用军事手段置我于死

地，我国周边也一直存在军事挑衅和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之所以能获得一个安宁的外部环境，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进行建设，并保障了我国在国际交往中应有的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军发挥了对外职能的结果。大陆解放后，我军先后执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西藏平叛，新疆平叛，制止台湾国民党军队窜犯大陆等多次作战任务，并取得很好效果，其主要原因，也还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积极进行了对内职能建设和正确履行其职能的结果。

那末，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还有没有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继续进行对内职能建设和继续履行对内职能的必要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存着阶级斗争。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我军作为阶级统

治 109 的主要工具，在敌对势力危及国家政权和社会安定时，听从党的指挥，履行以武力镇压和军事威慑的专政职能，是义不容辞的，也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只有在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这支军队才能很好的完成这种任务。这支军队也只有听命于它的指挥，才能真正成为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工具。因为它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它高瞻远瞩，统筹全局，它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在它的坚强领导下，就能明察大势，辨明是非，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一点，已经为铁的事实所一

再证明。

然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却极力鼓吹“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的谬论。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是对我军“党指挥枪”建军原则的一种挑战。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贯彻“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面地加强对内对外职能的建设，并正

确地履行这种神圣的职能。

第三、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是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抵制“和平演变”，保持无产阶级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需要。

抵制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是当前摆在我军政治思想建设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多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干涉、颠覆和渗透，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在赤裸裸的运用武力的一手一次次失败后，即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政界人物、特别是美国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界人物，发表了大量的反动言论，而且越来越紧锣密鼓地付诸于实际行动。他们声称：西方要与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地、慎重地、和平地促进关系，培养自由的种子”（肯尼迪语），他们“要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杜勒斯语）。诬蔑说“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宣称要“用和平方法使中国得到自由”（杜勒斯语），美国“应该施加压力，促使东欧和平演变”。他们说，共产主义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西方“可以加速这一变化”，而“西方的希望就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要“不战而胜”（尼克松语）。

事实的确如此，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已经成为当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多年来，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了许多次武装进攻，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他们战胜，相反，他们却用和平演变这一手，把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吃掉了。纵观这几年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形式、手段和突破口是很多的，而在改变党和军队的性质、分离党与军队的关系上下功夫，却是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在向党猖狂进攻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地想抓军队，他们向军队极力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崇拜西方民主化、自由化；大肆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企图瓦解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改变“党指挥枪”的根本建军原则，涣散军队中党的组织，培植政治上的反对派，逐步动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许多事实说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而破坏和分裂党同军队的关系，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则是他们搞“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也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一条共同规律。所以，在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竭力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情况下，认真坚持“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对我们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迫切。

对于抵制“和平演变”的问题，毛泽东生前早有许多论述，50年代他就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江泽民和其他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也多次强调加强对和平演变的防范问题。只要我们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真研究抵制“和平演变”的经验教训，永远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个心眼跟党走，我军就会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

第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需要。

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是毛泽东同志建军一贯的指导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提出：“革新军制离不开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建设的客观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又及时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了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在长期的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不断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继续提出了新的任务，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根据毛泽东同志一贯的建军思想，邓小平同志于1981年强调：“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1987年他在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举办的我军新时期建设成就展览的题词中，又发出“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的号召。

10多年来，我军遵照党关于国家建设的大政方针，围绕现代化这个中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和改革，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路子。并描绘出今后注重从质量上建军，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我军下一个世纪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宏伟蓝图。这是完全合乎毛泽东建军思想发展逻辑的思考。然而，这种宏伟蓝图，只有在党的坚强

领导下，才能完满实现。这就是说，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解决好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各个方面的关系，主要是：

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我军几十年的建军史上，创造与积累了许多非常宝贵的东西。其中最可宝贵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我们讲继承，主要是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我们讲发展，主要也是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无古不成今”，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我们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主要是表现在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点上。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当然就谈不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也就不会有自己的现代化。

二、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我们有一个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强烈愿望，也有一个实现这一愿望的战略构想，这是主观的一面，基本的一面。但还有客观的一面。在客观上，有许多有利条件，但也有许多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和困难。我们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使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必然会遇到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要达到主观愿望和客观可能的统一，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只有依靠党的坚强领导，不断地解决新矛盾、新问题才能做到。

三、内容与性质的关系。我们这里讲的内容，就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就是现代化的技术与装备；我们这里讲的性质，就是我军人民军队的性质、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内容与性质的关系，就是在现代条件下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的问题。内容如同军队的手足，性质则是军队的灵魂。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必须保持我军的政治优势，继承我军的优良传统，坚持“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如果丢掉了传统、改变了性质，失去了党的领导，那么，无论有多么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也会失去意义。所以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惟有如此，才能正确处理好内容与性质的关系。

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坚持“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使这支人民军队继续保持与发扬“共产党的党军”的崇高称谓和光荣传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加强我军建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也是当前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我们应该从党和国家利益全局的高度，认真研究与总结“党指挥枪”的历史经验，学习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有关论述，学习江泽民等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体制和领导制度上，保证“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进一步贯彻执行，把我军真正建成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堡垒，让党和人民放心，这是党和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赋予我军的一项光荣任务，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研究我军建军史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我们应该高呼一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拓的“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万岁！毛泽东的建军路线永放光芒！

毛泽东和他的领袖群

读一点“毛泽东”，无疑就包含着学习毛泽东和研究毛泽东，“从学习中研究，从研究中学习。我以为，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只有把学习毛泽东和研究毛泽东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抓住毛泽东思想的真谛，才能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重大贡献。

好，我在这里，就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学习和研究一下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秘诀。走向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那就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造就出一批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经得起考验的领袖和干部队伍，以至使这支队伍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成为国家的栋梁。题目不妨就叫“毛泽东和他的领袖群”。为了阐述问题的方便起见，我想从1937年的5月谈起。自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的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中日矛盾成为重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于这年的5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他除了给全党明确了目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号召全党以极大的努力，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发挥和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和领导作用之外，他还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鲜明地提出了党的领袖和干部问题，特别重要的是关于党的领袖和干部应具备的标准问题。他认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猥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

那么，这些最好的干部和领袖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也就是这些最好的干部和领袖应具备什么样的标准呢？也就是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性格和作风呢？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还不够，他还说：“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谈到这时候，他又同在场的同志们，共同回顾了历史，他说：我们死去的若千万数的党员，若干千数的干部和几十个最好的领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也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无疑地应该学习这些东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

关于阶级政党的干部和领袖，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是没有多少论述的，或者说并不多见，是毛泽东同志根据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党的历史经验，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作了这样比较全面地论述。这些概括起来就是：一懂得马列主义，二具有政治远见；三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四大公无私，五善于密切联系群众；六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七不搞宗派主义，八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九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十顾全大局，等等。总而言之，集中到一点，就是第二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无疑，以德才兼备作为我党干部和领袖的基本标准，它的最初的发明权应该是属于毛泽东的，它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一个丰富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中国特色的一举。它又是对中国古人经验和历史文化的借鉴。司马光先生在其历史名著《资治通鉴》中就有这样的论述：

智瑶所以覆亡，在于他的才能胜过他的品德。才能和品德是两码事，普通人很难辨认。看见一个人能干，就称赞他贤明，于是，常常看错了人。才能的意义是“聪察强毅”（聪慧、明察、有魄力、坚毅不拔），品德的意义是“正直中和”（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和平温暖），才是品德的资本，品德是才能的主宰。……才能和品德兼备，就是“圣人”，才能和品德全都没有，就是“愚人”，品德胜过才能，就是“君子”，才能胜过品德，就是“小人”，任用一个人担当大事，假如物色不到“圣人”“君子”，那么，与其用“小人”，还不如用“愚人”。原因何在？盖“君子”把他的才能用到善行上，“小人”却用才能去干邪恶。把才能用到有益于社会工作，犹如锦上添花。把才能去从事邪恶，可是一种灾难。“愚人”虽然想干坏事，智慧既不够，力量也不足，好像初生的小狗，想要咬人，人只要一举手，就可把它制服。而“小人”不然，智慧足可以发挥他的邪恶，能力足可以完成他的暴虐，简直是老虎生了翅膀，带给人们的祸患更为严重。“品德”使人尊敬，“才能”使人喜爱，尊敬的容易疏远，喜爱的却容易成为亲信心腹，所以 117 很多掌握权柄的人，被有才能的人蒙蔽，而忘掉了有品德的人。自古以来，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子浪子，因才能有余而品德不足，促成覆亡的例证，多得不胜枚举，岂只智瑶一人而已。在此，我特别指出，国家领导人假如能真正了解才能和品德的分别，知道选择的先后，便不致重蹈覆辙。

司马光老先生的基本点就是：“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这大概是古人以德才兼备作为选才用人的最早，也是最完整、最系统的一段论述吧。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也有过“亲贤臣，远小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说法。到唐代，对形成“贞观之治”作出杰出贡献的大臣魏征，就主张“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清代康熙皇帝也同意宋代司马光的见解。我国古人的这些选才用人讲究“德才兼备”的思想，无疑对毛泽东是有影响的。然而，毛泽东同志对当代无产阶级领袖和干部应具备的德才标准却注入了全新的血液。

毛泽东同志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他在 1938 年 10 月，即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对党的干部政策和干部路线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地阐述。他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

是一个“任人唯贤”的路线。鉴于张国焘实行“任人唯亲”，拉拢死党，组织小派别，坚持分裂主义，结果叛党而去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把坚持正派公道的作风，正确的选才用人，促进党的事业的不断发展，当成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然而，毛泽东同志大谈用才之道，依着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才用人，并非在确立了领袖地位以后才开始重视起来的，而是在中央苏区最困难的时期就注意到这项工作。有这样两件事，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1930年的春夏之交，红国军缺少一名能够和军长林彪搭配得来的政委。当时，作为红四、五、六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必须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依照毛泽东同志选才用人的标准，必须具备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必须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要有在非原则问题上的灵活性。毛泽东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结果选中了罗荣桓同志。罗荣桓是湖南衡山县人，在武昌中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鄂南组织起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了三湾改编。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生活上关心体贴战士，成为战士的知心朋友，深为士兵爱戴，给毛泽东同志印象最深的是，罗任第31团三营党代表时，由于他出色地工作，使这个营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1928年毛泽东带这个营南下执行作战任务，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好记录，很好的完成了任务。这与罗荣桓同志出色的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感慨地说：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他认为，罗的确是个人才，经他介绍和推荐，罗以一个下层政工干部的身分，参加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前委委员。后来担任一一五师政委、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委、总政治部主任，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一员巨匠，军队政治工作中唯一获得元帅军衔的人。

在此，我要讲到毛泽东同志启用左权将军的例子了。左权将军1905年3月15日诞生在湖南省醴陵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1924年3月，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他学习刻苦用功，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称赞他是黄埔军校的优等生，并两次接见他和他的同学。左权在党的教育影响下，逐步树立起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1925年2月由陈赓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参加了东征和回师广州讨伐军阀和平定军阀叛乱的战斗。因学习、战斗表现突出，1925年11月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先入莫斯科中心大学，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成绩优良，名列前茅，为尔后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0年学成回国后，被党中央派往红军中工作。在他担任第15军军长兼政委期间，因王明等人实行极端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大搞肃反扩大化，左权将军被诬陷参加过托派组织，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并被撤销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而左权将军能正确对待现实，仍然为党努力工作，并做出突出成绩。毛泽东同志认真考虑了左权将军的历史和现状，认为左权同志是党的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应该重用。故而，1933年12月，在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不久的紧张时刻，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左权为红一军团参谋长。当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苦时刻，部队行军作战频繁，参谋长的工作纷繁复杂，左权将军竭尽职守，与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及军团广大指战员一起，为挽救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所造成的不利形势，尽了

最大的努力。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红一军因为前驱，左权将军常随先头部队指挥战斗，斩关夺隘，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占领施秉，抢渡乌江，飞夺泸定桥，跨过大渡河，突破腊子口和直罗“奠基礼”的战斗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到达陕北后，他又参与指挥了东征和西征及山城堡战斗。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主席等发布命令，宣布左权将军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从此他辅佐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为创建和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做出了卓越贡献。1942年5月牺牲在抗日前线，被称赞为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给人们留下无限的怀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在谈到个人力量的时候说：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他还说：“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马恩在这里讲的个人自由，我认为，就包括着个人的才能、天才和智慧只有在联合中才能充分发挥的深刻含义。

我不知道毛泽东同志是否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这段话。然而我却觉得，在他注重选用人才，培养和使用干部的行动中，对这段话的深刻含义已经得到很好地体现。特别是在确定了他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以后，选才用人就尤其成为他的一项不可须臾放松的重要职责。他高瞻远瞩，胸怀坦荡，大公无私，任人唯贤，表现了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风尚。这一点，王明及张国焘之辈，是根本无法比拟的。他依据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不计个人恩怨，不讲个人得失，善于选用那些懂得马列主义、肯实干、有能力，又能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干部，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来。他认为，这是保证党的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所在，同时，他还敢于把那些一味追求个人权利，专横跋扈，夸夸其谈，不务实际，玩忽职守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他认为，这样的人是不能担当重任的。这也正是他的英明与伟大处，是古今中外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

不仅如此，他的高明之点，更在于他还善于把在实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不断地吸收与充实到中央领导核心中来，加强中央的集权领导，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个人和各方领袖的作用，特别是集体领导的作用。这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发展的三个阶段（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1年1月至1942年12月；1943年1月至1945年8月）中，表现最为明显。抗日战争时，为迎接胜利早日到来，即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推举刘少奇、任弼时同志为书记处书记，就是典型的一例。

刘少奇同志于1898年11月24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早年曾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回国，先后参加并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从大革命时期起，就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白区工作中曾作出了突出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担任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书记，卓有成效的领导了这些地区抗日根据地的组织创建工作。1937年，他在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对华北作了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的工作部署，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义勇军、自卫军等人民武装，

号召城市的共产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到农村中去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和《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等著作，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战略上的重大作用。在他的指导下，成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他在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时，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领导作出发展中原地区敌后抗战的部署。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他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重建新四军军部，领导整编部队，恢复和发展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他还是党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有关党的建设的论著，被毛泽东同志视为“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重要文章而赞不绝口。在这次调整中，刘少奇同志除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外，还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在抗日战争及尔后的工作中，成为毛泽东同志的重要助手。

再说任弼时同志。1904年4月30日，他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唐家桥新屋里，在长沙读书时就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0年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也曾赴苏留学，但他同王明等人不同，他不喜欢搞教条，务重实际，具有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坚强的党性，不计名利，埋头苦干，严守纪律，为人谦虚诚恳，从而获得大家的一致尊敬。在1927年6月中共中央举行的扩大会议上，他坚决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8月参加“八七”会议，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年在湘赣根据地任省委书记时，他抵制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保护了一批党的干部。1934年他率红大军团同贺龙率领的红3军团会合，成为红军团结的模范。在长征中，他作为红二方面军的政委，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耐心细致地做干部的思想工作，推动二、四方面军北上，与第一方面军会师，维护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红军的团结。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后来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和组织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得到毛泽东同志的信任和器重。在尔后的解放战争中，协助毛泽东主席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1943年3月中央机构的调整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还推举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为军委参谋长，杨尚昆为军委秘书长。这些从多年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群众领袖，成为毛泽东同志指导抗日战争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帮手，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列宁在《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中指出：“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权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毛泽东同志深知这样做的重大意义，他为形成一个由德才兼备的领袖组成的领袖集团，继续作着他的努力。他善于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党的实际斗争的经验教训教育大家，他还善于引导干部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断提高，并善于识人之长，不拘一格选人才。他这种努力，到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取得惊人的成就与最大的成功。在这次会上产生的中央核心机构——中央书记处，除了原来的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以外，又增加了朱德、周恩来。同时，还产生了一个包括陈云、徐向前、彭真、邓小平、聂荣臻、李先念、

薄一波等 44 位正式中委，又包括王首道、邓颖超、程子华、王震、宋任穷、赵振声（李存华）、吕正操、陈赓、习仲勋等 33 位候补中委在内的中央委员会，并产生了一个其中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 13 人组成的政治局。他们代表全党当时 121 万党员，他们就是毛泽东同志在 1937 年所预言的“成万数的干部”和“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的代表。他们既懂得马列主义，具有政治远见，富有牺牲精神，能联系群众，又具有领导政治、经济、党务、统战、外交等方面工作的才能，更具备统帅军队，驰骋疆场，战胜强敌的军事谋略。他们是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造就的中国历史上最优秀、最杰出的一个领袖群。这个领袖群，很好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与智谋，这个领袖群又以无私的奉献精神，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思想体系；这个领袖群，如同一块时代的巨大无比的岩石，产生了时代的巨大的重量，时代的冲击力，这个领袖群带领亿万人民，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世界——新中国。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和他领袖集团的成员们。扬眉吐气，精神焕发，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开国大典，并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领袖集团，有了这样一支按德才兼备的标准培养成长起来的干部队伍，中国人民才得以从抗日战争的胜利走向解放战争的胜利，才得以在世界的东方出现一个又一个令人神往的奇迹。今天，他们为什么还能引起人们那么大的兴趣和深沉的怀念？那是因为他们富有独特的性格、优良的品质、超人的智谋、少有的天才，以及在事业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袖群，是我们事业的风范。由于他们的努力，特别是由于他们那种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和谐一致的、巨大无比的凝聚力，曾改变了中国的现状，影响了中国的进程和世界的格局。他们代表了中国历史的方向。我们今天和以后的事业，发展的情况如何，是快是慢，是好是坏，是成功是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从他们那里吸取多少有益的东西。这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恶果，已经为我们作了一个最好的注脚，作了一个最好的说明。不认识这一点，说不定还是要吃大亏的。

现在，当我们谈到毛泽东和他的领袖群的时候，我以为不能不谈到最值得尊敬的两个人，这就是朱德和周恩来两位老前辈。

在井冈山时候，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的名字就紧紧地联在一起，俗话说“朱离不开毛，毛离不开朱”。朱德虽然比毛泽东年长 7 岁，但从会师的那天起，他对毛泽东就一直是非常尊重。他曾说：“毛泽东有办法，红军离不开毛泽东”。因为朱德德高望重，毛泽东对他也一直十分敬重。在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朱德同志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毅然抛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投向共产党。于 1927 年 8 月，他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后同陈毅同志率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一起指挥一方面军先后挫败了敌人三次围剿。1935 年 1 月，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尔后，他同周恩来等同志又协助毛泽东卓有成效地指挥了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虽然 1959 年庐

山会议后受到错误地批评，但“朱毛”从没有个人意气的斗争。他不愧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是毛泽东和他的领袖群的优秀一员。

周恩来同志是我党、我军和我们国家的重要创建人，他同毛泽东一样，是党和国家领袖集团中，最受人们爱戴和尊敬的一位。大革命失败后，他受中共中央委托，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在1935年1月举行的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对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他同毛泽东、王稼祥等同志，共同指挥红军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他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同毛泽东同志指挥1、3军团北上，终于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陕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推举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代表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武汉、重庆做统战工作，1947年我军撤出延安后，他同毛泽东转战陕北，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同时领导彭德怀直接指挥的西北战场的作战。后来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了名震中外的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推举他为国家总理，他在组织领导国家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绩。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但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了减少损失，尽了最大的努力。毛泽东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捣乱，周恩来的长沙之行，毛泽东果断地支持了他的工作，维护了他的领袖地位。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非常机智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的武装政变。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这话未必百分之百的准确科学，但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如果说，毛泽东和他的领袖群，曾影响了中国的进程和世界的格局，那么毛周二人的合作与友谊，我看算是这种影响中的重要因素。在漫长的战斗生活中，周恩来“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尼克松语），这正是他品格高尚、忠于党的事业的结果。实践证明，他真正称得上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是毛泽东几十年斗争生活的最得力的助手。

应该提到的还有：关向应、陈毅、刘伯承、李维汉、贺龙、李富春、乌兰夫、王若飞、张云逸、谭震林、罗瑞卿、徐特立、张闻天、蔡畅、张鼎丞等为数众多的领袖们。列宁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正是因为按照他德才兼备的标准推举出了一大批深受群众拥爱的领袖和代表，所以才使他的事业走向成功。

我以为在此值得一提的另外一点是，毛泽东用人讲德才兼备，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讲五湖四海。特别是不计个人恩怨，而讲以革命大局为重，毛泽东对博古同志的重用就是很典型的一例。博是反对他的，而他还是重用他。多年来，在党内已传为佳话。

毛泽东同志同他的领袖集团，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政权以后，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前进，不改变颜色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根据60年代国际环境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提出“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他认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

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提到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摆到了“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的重要地位。他热烈地并且信心百倍地告诫全党：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或认识到，毛泽东

同志当时的见解忠告是有足够的根据的，是完全必要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产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一个有四亿五千万人

口的大国取得胜利止，世界一切反动势力，没有一天放弃过用武力消灭“共产主义”的梦想。经过反复较量，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尔后才逐渐改变他们的对策，那就是搞“和平演变”，企图用“没存硝烟的战争”来战胜共产主义。早在50年代，美国的那位杜勒斯先生就提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要用“和平的方法”达到目的；要“用和平的方法使中国得到自由”；要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西方“要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等等。他们不仅是说说而已，事实是在那么干着，在采取一切措施，加速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实现，而且越来越呈现出强化的趋势。一切的事实证明，采取有效措施，有力地回击世界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积极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保证党的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确是个至关重要的带战略意义的大问题。毛泽东同志考虑领袖集团主要领导的接班人问题，早在40年代初就开始了的。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接班人问题正式从组织上确定。并为正确解决接班人问题作了不断地努力和大胆的尝试。诸如对党的最高领导划分为“两线”，他本人退居第二线。提出和制定了接班人的具体条件。不但有狭义的——党和国家的最高继承人，还包括有广义的——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青年。这些从理论上讲，是比较完善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不幸的是，他没有能够从制度上解决好这个重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实践上发生了失误。把原来就认定是接班人的刘少奇同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当作头号“走资派”批倒，却把林彪错定为“接班人”，并写进党章，还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江青集团重要成员也加以重用。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在组织领袖集团方面的失误。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失误和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的捣乱破坏，使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未能实现。然而，我却觉得，无论是毛泽东成功的经验也好，或失误的教训也罢，都应该成为党的宝贵的财富，都值得加以借鉴。后来，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这副重任，历史地落到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和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的身上。这不能说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应该说，这也正是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初衷。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具备的几个条件，我以为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这些概括起来是：必须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和世界人民服务，必须是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

最近，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确保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江泽民同志的这个论断，正是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最好继承和发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惟有培养和造就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的领袖群，才能有效的抵制来自西方“和平演变”的侵袭、才能经得起任何惊涛骇浪的考验，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始终不渝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最后我想告诉尊敬的读者的，是我内心的几句话，那就是多年来使我养成了这样一种信念：我热爱我们的军队，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我也热爱毛泽东和他培植的领袖群。因为，毛泽东和他的领袖群，为我们这个军队、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注入了生命的新的基因。在有些人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狂潮的催动下，千方百计地挖掘革命祖坟的情况下，还有，在有些人对维护革命祖坟不大热心的情况下，我尤其感到，应该加倍地热爱她。我想，这是一个关系重大、影响大局的问题。这与怀旧完全是两码事。因此继承她的传统，热爱她、维护她应有的历史地位，无疑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乃至每一个革命者，应尽的神圣责任。

关于“毛泽东热”的思考

如果有人要问，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是火山迸发，是 8 级地震，还是 12 级台风？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有种种问答。但我却说，在一定意义上讲，还是人的精神力量，是人的精神的凝聚力。

今天正在神州大地上进一步升温的“毛泽东热”，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凝聚力的体现。

请想一想看，这种精神的凝聚力有多么大吧。在抗日战争中，它把亿万人民的意志统一到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一致抗日救国的阵线上，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在解放战争中，它鼓舞人们奋起自卫，歼灭国民党 800 万军队，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它又指引人们向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迈进。那时候，只要一提毛泽东的名字，人们立刻就会产生一种精神的凝聚力。有的年轻人也许不会相信。然而这的确是历史的事实。

现在如何？我看它依然是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支柱。

对于 90 年代初，在大学校园兴起的这股“毛泽东热”，曾引起过很多人的关注，并已有过诸多的论述。然而，现在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毛泽东热”，已不仅仅是局限在大学校园、或青年学生中的那种“毛泽东热”了，它已冲出校园、扩展到社会，成为一种更为宽泛的社会现象。并且，“开始进入宏观的历史层次，上升到，了较深层的理性思考。”

神州处处

当前，“毛泽东热”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出售和佩带毛泽东像章的现象，90 年代初只不过出现在广州和湖南长沙、临湘、岳阳等地街头。出售者也只不过是个别摊贩，佩带的也只是个别少男少女或新婚恋人，现在，这种“像章现象”已扩展到全国更多的城镇、更多的地区，更多的人群。许多大中学生、工人、农民及其他阶层的人已开始佩带、出售和收藏毛泽东像章，并且涌现出不少收藏家。据报道：

四川成都王安廷在仅 20 平方米的小小展馆中，珍藏着 15004 枚毛泽东像章及各种毛泽东的图片。他立志在他有生之年要收集到 25001 枚毛泽东像章，他说等他死后把它献给国家博物馆；

北京有位 60 岁的刘师傅，在“智化寺”厅堂内布置了毛泽东像章展览。这些像章大多是铝制的，也有用玻璃、木头、竹子、陶瓷或塑料制做的，还有银质或金质的，

北京 27 岁的阎新龙，经过 10 年的努力，现在已是 4 万枚毛泽东像章的收藏者。最大的，直径 150 毫米，最小的 4 毫米，最早的制于 1951 年，最近的是韶山人为纪念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1993）制作的，最贵的一枚买进价是 300 元。他把业余时间和积蓄都用在了收藏毛泽东像章上。人们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崇敬毛泽东主席！”

更为令人惊异的是，许多家庭将多年珍藏在箱柜中的毛泽东像章，也翻腾了出来。据一位从南京回来的同志说，他到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家访问，看到这位党支部书记家屋内的墙上布满了毛主席像和毛主席像章。这位支书说，他们是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的，是搞集体致富的。

在中国广大农村，悬挂或供奉毛主席像的现象，从战争年代起，直至现

在，始终没有中断过。就是在城市，许多家庭中，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照片（有的是合影）或毛泽东的尊像，也时有所见。然而，自1989年春夏之交的“六四”事件之后，情况突然起了新的变化，据有关文字介绍：“1989年春夏之后，新华书店的各地分店纷纷向总店致信，要求增加订购领袖像”截至1990年10月，“该店在全国各地发行各种领袖像73万多张，其中毛泽东像约占3/5，为43万张。”据报道，截至1992年春节，3年中毛主席像累计总印数达1100万张。而山东沂蒙老区截至1992年1月20日，全区共发行毛主席画像183万张，居全国首位。其中临沂和沂水两县市发行数均超过30万张。

在广州、深圳等南方许多城镇早已出现个体摊贩出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已故领袖像的现象，可观的利润，促使这一现象顿时“盛行成市”。据有关部门调查，仅广州市区内的北京路和中山路的十字路口一带，每天总有30多个摊点出售领袖像，均为彩色，印制精美，尺寸5R（五寸乘七寸）或2R（二寸半乘三寸半）不等。有人卖，有人买。人们将印制精美的毛主席像买来，有的挂在胸前，有的挂在汽车前的挡风玻璃上。这种现象继而普及到全国各地，直至北京。就连一些国际友人乘坐的汽车上，这种现象不时在人们眼前出现。

与此同时，在沿海及内地的一些城市中，其中包括北京在内，在“芸芸众生”的挂历群芳中，还出现了以毛泽东像为内容的挂历。这种挂历。在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还有上升的势头。

重新拾起歌唱毛泽东的历史歌曲，大概也是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以后的事。具体到从何时何地率先兴起，谁也说不大清楚。但据有关文字记述，首开老歌新唱先河的是崔健在北京大学演唱《南泥湾》。此后，《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配以摇滚乐，响彻在各火城市的歌舞厅、音乐茶座和音乐晚会上，进而风靡中华大地，俗受听众特别是青年听众的欢迎。

据说，进入90年代十分畅销的一套两盒录音带《怀念你毛泽东》，其中共收入24首旧歌，不仅那些耳熟的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等使人听得进去，加之配以由外国引进的“的士高”，就更得青年人的欢心了。中国唱片总公司制作发行的《毛泽东诗词歌曲欣赏》盒带，投放市场，“销路颇佳”；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屡屡播出的《毛泽东诗词歌曲演唱会》节目，也颇受观众的青睐。

由著名歌星李玲玉、孙国庆、屠宏刚等演唱的通俗歌曲大联唱——《红太阳》录音带，成为卡拉OK的重要内容，到1991年底1992年初，已发行100万盒或上千万盒还供不应求。后来北京又录制了一盒《太阳颂》，同样受到人们青睐。它的声音不仅仅萦绕在歌舞厅，回荡在汽车上，而且响彻在城市和农村的千家万户。从祖国的南方到北方，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从住户的窗口内飞出的大多是《红太阳》的歌声。

据说，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版有关毛泽东的书籍热流，已经出现过两次令人瞩目的潮头。第一次浪潮是关于毛泽东传记作品的出现，其代表作品，一是斯图尔特·施拉姆著的《毛泽东》。三次印刷总数字高达55万册；二是特里尔创作的《毛泽东传》，总印数为27万册；三是权延赤与李银桥合著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红墙内外》、《卫士长谈毛泽东》以

及《生活中的毛泽东》等，销量均在几万至十几万册，甚至更多一些。

第二次浪潮是《毛泽东选集》1—4卷第2版发行，销量在1000万套以上，可称最近几年各种图书销量之“最”了。

即将到来的第三次浪潮，那就是为纪念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而发行的有关图书。几年来，以毛泽东为内容的书刊的出版，形势一直看好，据有的人粗略地计算，截至第二个浪潮算起，有关图书的出版发行量已上300种之多。预计第三个浪潮到来，这方面图书的出版发行量，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字。许多出版社早就下手进行选题、组稿等出版的准备工作。约略以50个出版社，每个出版社5个选题计，总共即250个选题。实际上有的出版社不只是5个选题，多者有的10个或20个不等。其中不少选题，不仅角度新颖，而且内容也多是鲜为人知的。

当前不断升温的毛泽东书籍出版“热”，无形中带来了学习毛泽东和研讨毛泽东思想“热”。如果你是一个留心观察现实的人，那么你就会发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这就是：喜欢阅读有关记述毛泽东生平业绩的人，已经不是少数青年学生，而已扩大到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更多的人民群众中，这些书籍已不仅仅是个别或少数家庭中有，而是进入了更多的家庭，在城市中由于文化设施比较集中的原因，所占的比例则更大。它已成为80—90%的人乐于阅读的读物。

再者，自从《毛泽东选集》4卷2版发行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风气，已经不是原来人们看到的只限于大学校园内，而是变成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其特点：不是像“文革”中那种往往流于形式的学习法，而是从实际出发，注重学习与研究其思想体系，以及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一些中老年人，如今重新捧起毛主席著作，还是那么百读不厌，越读越有味，有的说，学习“毛著”，既可以重新温习老人家的理论，又可以得到一种如何运用文字艺术的享受。一些青年人读了毛主席著作高兴地说，对毛泽东增加了一层理性的认识，更清楚地看到他丰富的内涵，更加感受到他魅力无穷。同时，在中青年理论队伍中，涌现了不少专门研究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的专家、学者，以及撰写毛泽东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回忆文章的作家。他们都卓有成效，有的还颇享盛名。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在这场学习和研讨“热”中，还产生了一些毛泽东图书收藏家。他们见到有关毛泽东的书，不管价格高低，不分版本或薄厚，统统都在其购买收藏之列。更有甚者，但凡有记载毛泽东事迹的报纸、刊物，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在其收藏之内。那可真称得上是如饥似渴，若痴若醉，不惜工本，不辞劳苦，以此为荣，以此为乐。能够引起如此众多的专家、学者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从内心里崇敬他，学习他，从诸多的方方面面研究他的生平和理论，并甘愿按照他的思想去奋斗，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还是罕见的。

据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学者最近推断：近年来，专职研究毛泽东的队伍正在由散兵游勇聚合为集团力量，有关毛泽东的专题思想和综合思想的研究会、室、所在全国已达数十个。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在不断扩大，许多刊物辟有专栏发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论著，专司此职的研究期刊先后在祖国的东南西北创立。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大面积丰收，一批有影响的专著和论集受到国内学者的注目。同前几年相比，这种研究已有了长足的进展。从研究思路上看，既有政治视角的研究，又引入了文化视角的研究；从研究

方法上看，在分析性的研究之外，加强了综合性的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在对毛泽东正确思想研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其错误思想的研究。总之，这一研究已趋于多样化与不断的深化。当然，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毛泽东观。但“毛学”作为一种学问，同其他学问一样，是不会被穷尽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献的挖掘，它的某个侧面或某个思想理论会不断地被突出出来加以研究，常研常新。

笔者是完全同意这些推断的。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不少历史人物似乎都有一个“谁人曾与评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不例外。在他逝世后，一时间一股全面否定毛泽东的风四起，幸亏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他的伟大历史功绩，同时也指出他晚年的失误。从此，广大人民群众有了一个开口评说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依据。1989年春夏之交“六四”事件的出现，又进一步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人们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深深感受到大有公正评说毛泽东历史功过的必要。后来，随着一批关于毛泽东的纪实作品的出现，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从神的位置回到了人的位置，于是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骤然掀起一股对毛泽东的评说“热”。

这股评说概括起来是：毛泽东不是“神”而是人，是有妻子儿女同志和朋友之情的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毫无私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对生活的最高要求是吃顿扣肉，补补脑子，毛泽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杰出代表，“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相联，否定毛泽东也就否定了这一切；毛泽东晚年也有过失误，但那是一个伟人的失误，是第二位的。苏联解体后，面对共产主义运动受到的巨大挫折，人们对毛泽东的评说，似乎又升到一个新的热度，集中到一点这就是：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没有过时，事实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的一些重要理论不能全盘否定。否则中国“六四”事件、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等现象就无法解释。

“毛泽东热”这种社会现象，不仅在中国的城镇或农村悄然兴起，就是在世界上这股热浪也在滚动，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自1952年韶山正式对外开放以来，约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几万国际友人来韶山参观。其中，有10多位国家元首、10多个国家的兄弟党领袖和近30位副总理级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后，来韶山参观的国际友人的人数仍然有增无减，截至1989共接待5000多批，达6万余人次。最近几年来，来韶山参观的国际友人还是络绎不绝。1992年3月，美国好莱坞一家电影制片公司副总裁来到北京，同中国有关方面商谈了投资拍摄电影《毛泽东传——1926至1949》一事时，他对《中国日报》的记者说，20世纪的伟人有列宁、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甘地和毛泽东等。最近邓小平呼吁更加开放，中国将成为世界舞台上更加活跃的一员。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使人们关注中国。而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毛泽东时代。世界许多国家的文人、学者、专家正在研究毛泽东。中国的“毛泽东热”正在波及世界。

香港昆仑出版人刘济昆先生认为，近年海内外出现的“毛泽东热”是正常的，因为中国的今天和毛泽东分不开。刘是印尼华侨，“文革”中曾因炮打江青入狱两年，但这并没有减低他研究毛泽东的兴趣。他说，他从小就崇

拜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使华侨和祖国一道站起来扬眉吐气，毛泽东的确是一位有过人之处的民族伟人。

毛泽东是一位时代的巨人，毛泽东思想是一种科学。中共中央研究室研究人员陈晋在他最近所著《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书的后记中，对“毛泽东热”作了这样的概括：归纳起来，大体有这样几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一般文化消费心态的毛泽东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表达出某种复杂的精神信念的毛泽东热；回首往事的一种心理体验和历史再现的毛泽东热；作为价值寻求象征的毛泽东热，以及学术研究多样化和深化的毛泽东热。当然，简单地用“冷”和“热”来作为划定毛泽东“离开”或“回归”的标志未必十分科学。有的“冷”或“热”也有其特定的含义，或程度的不同，说来也未必那么确切。但总的来讲，它是群众对一种社会现象的概括，或者叫一种比喻。我看这种现象还是值得研究、值得重视、值得深思的。何况“毛泽东”就总体来讲，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呢。

动因所在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有过几次所谓“毛泽东热”，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热”，解放战争时期的“毛泽东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毛泽东热”和“文革”期间的“毛泽东热”等。然而，眼下出现的这场“毛泽东热”，绝不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毛泽东热”的简单重复，也不是一种单一的、孤立的社会现象，就总体上讲，更说不上是对毛泽东什么盲目的迷信和单纯的崇拜。如有的人所分析的，其中“包容与蕴含着更为宽泛的社会内涵”，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同时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而主要是对毛泽东同志理性认识和温馨情愫的自然迸发。历史——让人们不能忘记毛泽东，

现实——让人们想起毛泽东，

未来——让人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

总之，时下的“毛泽东热”，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必然现象。已经引起更多人的关注。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社会现象，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一个值得作出实事求是地回答的问题。

有人说，目前的“毛泽东热”，与东欧剧变、特别是与不久前苏联的解体有关。

这话不假。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邻邦一下子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怎能不使人们心中产生震颤呢——“别人家的事情我们管不着，可我们自己的事情该怎么办？”

目前，在世界上出现空前的变动，我们的前景如何？该怎样办好自己的事情呢？

这种担心与疑虑是可以理解的。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毛泽东。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一想到对毛泽东的这些评价，于是，一个防止和平演变的伟大预言家、伟大战略家的崇高形象，就顿时矗立在面前。人们说：

是毛泽东经过多年冷静地观察和分析，最早科学地得出西方帝国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论。是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深谋远虑，最早向全党发出警惕西方敌对分子要搞和平演变的警告，同时提出反和平演变的伟大战略任务。

是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和平演变的尝试。尽管有的尝试造成了严重失误，但出发点总还是好心。

是毛泽东为我们党奠定了防止和平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面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重大挫折，使人们看到的是，在恶势力面前，如梅花一样，不怕严寒，不畏强暴，傲视百丈冰雪，巍然屹立，毫不动摇的威武雄姿。她就是毛泽东的形象，她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她就是中国人民的形象。

毛泽东用自己的心血铸造了一座反和平演变的丰碑。谁能说这不是当前兴起“毛泽东热”的一个重要的动因？

“还是毛主席好啊！”

这话，似乎成为当前“毛泽东热”中一句有代表性的语言。它是针对当前社会上飘起的不正之风和领导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而言的。

寓意深刻，有感而发，令人深思。

其中，既蕴涵着对毛泽东、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又包容着对现实某些不良现象的不满和透骨的批评之意。可以说，这也是当前“毛泽东热”的一个动因。

比较分优劣，比较出高低，比较显美丑。

人民群众最善于用比较的方法看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家的经济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经济上得到了从来没有的实惠，政治上得到了从来没有的欢心。但是人们有时还在骂娘。

为什么？因为同50年代相比，在某些方面，社会风气和官僚主义作风，坏到了一定程度。党中央虽三令五申，也无济于事。有些事还是以假佛之名，行盗窃之实，照样我行我素。穿着共产党人的衣服，吃着人民的俸禄，而偷偷于着有害于人民、有害于国家的种种罪恶勾当。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以权谋私，敲诈勒索，执法犯法，执纪违纪，渎职失职，官僚主义，一切向“钱”看。共和国建立之初，仅仅几年就根除的吸毒、嫖娼、卖淫、赌博、拐卖妇女等社会公害，现在在一些地区泛滥成灾。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或个别人身上，有些问题也不是不可解决的，更不会影响改革开放的步伐，但影响极坏。

面对如此严重的某些缺陷，人们在长吁短叹之时，自然会想到一个人——毛泽东。

他带领人民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战略决战取得胜利后，紧接着就进京“赶考”，又取了头名“状元”的好成绩。

他功德无量，但不居功自傲，带头发扬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同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数十年如一日。

他和亿万人民心连心，平民百姓的饥渴冷暖时刻系在心头，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为未来共产党人远大目标的实现，常

年累月，夜以继日，永不停息地思考着、工作着、拼搏着，直至停止呼吸。

他十分担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此，曾费尽心血，绞尽脑汁，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历史证明，他的许多见解、理论和实践，都是对的。尽管也有些失误，但他的愿望还是好的。他的大方向始终未错。

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是坚强的，似钢铁，如果不是自己打倒自己，那是谁也打不倒的，共产党人的形象是高尚的，似美玉，如果不是自己毁掉自己，那是谁也毁不掉的。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坚强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维护共产党人光辉形象的典范。今日兴起的“毛泽东热”，也正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队伍中那种活生生的伟人形象与伟人灵魂的呼唤、怀念和追求。

有人说，这次“毛泽东热”的源头，实际上是从邓小平同志那里开始的，是从邓小平同志以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充分确立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开始的。这个源头的标志，就是由此而促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通过。

这种说法是合乎实际的。

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全面否定和丑化毛泽东同志的风四起，刮得天昏地暗。针对这股不善的风，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指出：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

——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期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

——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大重了，应该改正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

当时，如果不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出来讲话，毛泽东——这样一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伟人，就会有苏联斯大林那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从而也会影响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显而易见，如果是那样的话，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和所谓“毛泽东热”。中国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很难说。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

史条件下，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又将毛泽东思想列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百年不变。所以，今天当人们提到这段历史事实的时候，无不称道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明智、坚定和富有远见卓识，从内心中发出敬佩之语。

当然，除了上述的种种原因之外，今天“毛泽东热”的根本原动因，还在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思想、理论、实践及人格，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的无穷魅力，以及他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心相印。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犹如一盏永不熄的明灯，永远照亮人们前进的行程；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犹如一根最敏感的神经，一触动它，就会使全身抖动。

总之，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毛泽东热”，最根木的热源来自毛泽东。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最突出的民族品格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种崇高的民族品格，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而引起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由衷敬佩，并由此而一生了深厚的情感。”

引向何方

“毛泽东热”是直接产生于中国历史和生活现实的一种社会现象，是毛泽东同志伟人形象与伟人声望回归的表现。它的热源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根植在人民的心中，是从总体上、本质上认识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客观必然反映。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反映出人们的一种意识流向，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一种弥足珍贵的奇特现象。

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国家的历史。历史与现实是不能分割开来的。人们对这种历史的热情，渗透着对社会主义现实的热切关注。

“毛泽东热”，正在从低层次向着高层次发展。人们把热爱毛泽东、怀念毛泽东、崇敬毛泽东和学习毛泽东、同防止和平演变、改变不正之风、搞好改革开放，寻求党和国家的根本出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联系在一起。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位划时代的伟人，这些年来，曾有过“过冷”或“过热”的教训。“过热”，如十年“文革”期间，“万寿无疆”，推到神的位置；“过冷”，如资产阶级自由化大肆泛滥的时候，全面否定，打进地狱。“过冷”或“过热”，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都会损害毛泽东和党的光辉形象，都会给人民的事业带来不利的影晌。最为正确的作法是：实事求是，保持毛泽东伟人的本来面貌。时下兴起的“毛泽东热”，能否接受以往曾经有过的“过冷”或“过热”的教训，对毛泽东同志始终保持在实事求是的基点上，使“毛泽东热”保持在适当温度、健康发展的水准上，并形成一种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凝聚力，我看关键在于引导。

那么，如何引导，向哪里引导？

——要引导一些人走出迷信的怪圈，把对毛泽东神化的看法，转移和升华到对毛泽东伟人、领袖、导师深刻内涵的认识上，进而学习毛泽东，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人们说。

毛泽东是新时代的巨人，新时代的楷模，新时代的坐标，新时代的救星。似乎冠以什么样的头衔都不为过。

有人又说，

“毛泽东在今天的存在，已经不是一个物质的人了，他早已转化为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理想的寄托。”

去了的就去了，留下的则更显得珍贵。

于是，人们采取种种方式来纪念毛泽东，怀念毛泽东，以此寄托自己的心愿和哀思，包括以毛泽东同志的言行为标准矫正自己的行动。

这，都无可非议。

然而，有的人并不理解毛泽东，既没有学习过多少毛泽东著作，又不了解毛泽东的实践，对毛泽东的生活也知之甚少，单凭某种意念想当然地评价或崇拜毛泽东，把毛泽东神灵化，把毛泽东作为神来供奉，或者把毛泽东当作驱邪退鬼的钟馗，说，

“毛主席保平安，赵公元帅保发财”。

这是虔诚，是敬意，还是无知？

总之，类似这样一些做法是不可取的。当然，就总体来说，

“毛泽东热”的主流还是好的。并非如有的人所说：将毛泽东请下了神坛，如今又送上了神坛。应当相信，有过深刻教训的中国人民，绝不会打破一个偶像，重新再塑造一个偶像，去重蹈历史的覆辙。在这场“毛泽东热”中，人们会用理智战胜盲从，用真理战胜谬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认识毛泽东，评价毛泽东，对待毛泽东。

但关键还在于积极正确地引导，将消极的、不大健康的因素，转化为积极的、健康的因素，即引导一些人从迷信和盲目崇拜的怪圈中解脱出来，向对毛泽东认识的更高层次深化与发展，还毛泽东伟人的本来面貌，将“毛泽东热”真正变成一种动力。

——引导人们掌握实事求是这把金钥匙，去开启走向毛泽东尚未打开的许多历史之谜，使人们更好地走向毛泽东，学习毛泽东，从毛泽东那里找到解决人生和其他许多问题的正确答案。

有人作过这样的分析：

过去，人们对毛泽东政治、生活、工作方面的情况，一直是个谜。最近几年，随着关于毛泽东一大批书籍的出版发行，不少谜底已经解开，过去的不少谜不再是什么谜了。尽管如此，仍然还有不少的谜底没有解开，其中不仅包括生活、工作之谜，也还包括一些政治之谜。

我赞同这样的分析，因为它合乎实际。

以庐山会议为例：1959年举行的庐山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或公开，或内部，已有不少文字流传。有的在读者中已产生不小的影响。似乎庐山会议的谜底已经解开，似乎填补了中共党史学术研究上的一个“空白”。

庐山会议之谜是不是解开？其实到不尽然。有的知情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庐山会议许多情况，却不是如有的书刊文字所记述的，更谈不到是什么“实录”。

这样说来，庐山会议的谜底究竟是什么？

看来，大有必要运用实事求是这把金钥匙进行深入地探索、开启的必要。庐山会议如此，其他一些问题，难道不是如此吗？诸如：毛泽东的成功，毛泽东的失误，毛泽东的魅力，毛泽东的处事交友，毛泽东的婚恋，毛泽东的生活，以及所谓毛泽东“整人”，等等，都需要用实事求是这把金钥匙，去开启那些历史的“阍

门”。

请问，打开这些历史的“闸门”（有些是沉重的“闸门”）有什么意义呢？

我的回答是：意义非常之大。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不是一般的人。

恩格斯说：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从恩格斯的话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毛泽东正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正是新时代思想的代表。

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思想，影响了时代的转换与进程。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实事求是的探寻与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准确、完整的了解毛泽东。从毛泽东的成功中得到启发，从毛泽东的失误中得到教训。对毛泽东身上宝藏的开掘，远远没有穷尽。毛泽东那里许多宝藏的谜底，仍等待着我们去开启。悄然兴起的“毛泽东热”，正是解开那些重要谜底的好时机。

——把“毛泽东热”引导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为人民服务。

历史的经验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

中华民族之所以有今天，正是得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紧密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之所以产生一些严重曲折，归根到底，也正是因为丢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基本的法宝所造成。

历史的经验是宝贵的；

历史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中华民族满怀信心地跨入 21 世纪，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然而，同以前相比，现在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人，不是很多，而是很少，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空气，不是很浓，而是很淡。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迷雾还在蔓延。

这种可怕的现象，值得深思。

我们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么，不学习，不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实质，何以谈得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呢？

毛泽东同志曾一再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那么，不学习、不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何物，又怎么谈得上去联系、去结合呢？

有的人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发生了一点曲折，又在那里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论调了，在这种空气的影响下，有的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似乎用不着读什么马列、毛泽东著作了。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略为懂得一点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人都知道：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看，真正过时的东西，恰恰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那些腐朽的东西，其中，当然也包括“过时”论本身。

人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世界上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是大有人在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她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即

使是当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倒退现象，也绝不会证明这个根本规律就不管用了。从全局、长远、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过时，更不会消失。马克思主义最富生命力和战斗力。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

“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然而，学习马克思主义，却不在形式，作表面文章，而贵在抓住实质，贵在实事求是，贵在学习与应用，即贵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既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要把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同学习、阅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学习、阅读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结合起来，从中看出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龙去脉，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今天，继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其中包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资本论》。1992年12月18日《书刊导报》发表尔重的文章就指出：现在更应该读《资本论》。文中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基础的理论。《资本论》到底讲了些什么？概括说来：第一，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发展，对历史进步的巨大贡献；第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过程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各方面的巨变；第三，只有批判继承资本主义的有益遗产，驱除三大矛盾，建设共产主义（经过若干阶段）才能解放被资本主义束缚了的生产力，致人类于无剥削的和平幸福生活，它肯定：陷在资本主义的三大矛盾中是行不通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也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可以从《资本论》中系统地了解资本主义经营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不能不读此书。因此，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都把《资本论》列为必修科。我们中国长期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有少数弱小民族资本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全武行（包括重工与轻工、军工与民工、市场与金融、交通与能源、生产与研究等）的垄断财团，四大家族发了大财，是充当买办与封建掠夺得来的金钱。所以，可以说，中国是缺乏全面实践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从这点上说，我们现在更应该认真地读《资本论》。在人民群众中，本来就深藏着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良好愿望。目前，悄然兴起的“毛泽东热”，正是引导人们很好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掌握思想武器的最好契机。——把“毛泽东热”引导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上来。

“毛泽东热”是振奋民族精神，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积极性，投身于改革开放发展的大潮，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良好机遇。

“毛泽东热”的出现，并非一种单纯的怀旧情绪，也不只是对某种社会现象不满心理情感的发泄，而从总体和本质上讲，它是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政策落实的反映。

“毛泽东热”所表现的现象，虽然是五颜六色，不大健康的因素或多或少也夹杂其间，但主流是积极向上的，这就是想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一心一意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加快步伐，跃入世界先进行列之林。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建设社会主义的

极大积极性。

“毛泽东热”中，人们呼唤毛泽东、了解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同党中央提出的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抓住时机，加快步伐，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毛泽东热”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股巨大的凝聚力。正确引导的结果是：会改善和刷新人们的道德风尚，会使人们产生新的人生观、价值观，会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会有利于防止和平演变内在力量的增长，会促使国民经济飞快地发展。“毛泽东热”并不是目的本身。“毛泽东热”将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她将开启新的世界，创造新的未来。一句话，她将超越现实，超越毛泽东，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这是历史的要求，历史的必然，引导得好，将名垂千古，功昭百世。有利于子孙后人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1992年夏于北京西山

来自出版家的敦促

“毛泽东的一生，是说不尽、写不完的史诗。”

随着“毛泽东热”的不断升温，出版界同广大作家、作者的一致努力，出版了不少有关毛泽东的书籍，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在毛泽东回归人间的进程中，可以概括为出版家的敦促，或者说出版家的贡献。当然，也有的把出版毛泽东的书当成“摇钱树”，有利可图就干，只顾经济效益不看社会效益。那种投机书商的卑劣做法，自然另当别论了。

毛泽东回归人间这个概念，不是出自哪一个人的主观想象，更不是由哪一个人随心所欲地杜撰，而是客观实实在在的反映。这种历史的必然，是谁也阻挡不了、谁也否定抹煞不了的。如果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他就是一个历史的盲人，说不定就要碰壁。

前几年，虽然“高天滚滚寒流急”，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大肆泛滥的日子里，歪曲、咒骂、丑化和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妖风四起，气势之猖狂前所未见，但是，一切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切正义善良、真心实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人们，也都没有沉默。他们面对那种不正常的局面，时时在做着适当地反应，在千方百计地进行抗争。这就是说，他们对无产阶级那些最本质、最宝贵的东西，在千方百计地坚持、继承和捍卫。于无声处春雷动，“大地微微暖气吹”，一股潜在的洪流，在逐渐形成一种摧人心腑的热浪，在茫茫中华大地上滚动。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毛泽东热”。我在这里讲的出版家们所做的贡献，自然和我的“读一点‘毛泽东’”系列文章的继续撰写和编辑出版不无关系。

这几年，我比较集中精力注意选购和阅读了一些有关毛泽东同志的书籍和刊物，也比较注意看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经历为背景的电视和电影。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些年来，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围绕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出现了一种读书热、影视热和崇敬热。那些有损于毛泽东等老一辈光辉形象、党的光辉形象的话，听得差不多了，或者说听不到了。处处出现毛泽东回归人间的迹象。这能说没有出版家和影视家们付出的辛劳吗？

我手头积累的有关毛泽东等老一辈的书籍不算全，但我自认为，就凭这些和我个人的亲身感受也能说明一点问题。如果说，我的判断不错的话，出版家的努力——这种出版热，是在毛主席逝世后，经过将近10年的沉默，到1986年开始复苏的。

那是为了纪念毛主席逝世10周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文笔朴素而简洁，故事真实而感人。使人读后，顿时勾起一阵对毛主席的深深怀念。与此同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由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由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等同志撰写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从读书的这个侧面，披露了毛泽东一生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内容生动诱人，读后更加激起人们对这位伟人的敬仰之情。印数在7万以上，人们争相订购，认真拜读，其影响之大，传播之广，是“文革”10年后，读书记录上少有的。这年10月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玉卿、张万录撰写的《毛泽东成长的道路》一书，记述了毛泽东自1893年诞生到1920年前后这个时期，怎样由一个农家的孩子，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并且着重记述了毛泽东

成长的道路和经验，向广大青少年提供了一本向毛泽东学习的普及读物，受到热烈欢迎。

在一段时间内，尽管有些人对毛泽东进行种种诽谤和毁伤，制造了许多污浊的空气，但在广大人民的心目中，对毛泽东那种素有的感情还是十分浓厚的。那种感情就如同在一堆堆干柴上，又浇上了层层汽油，一遇到火星就立刻燃烧起来。出版家们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的许多读物，就起到了点燃人们内心感情的作用。经一二年的一段沉寂之后，到 1989 年那种极不寻常的岁月，出版界迎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狂风恶浪，仍然出版了大批关于记述毛泽东斗争生活经历的书籍。可以这样说，在这一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达到了高潮，宣传出版毛泽东传记、回忆录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术书籍，也针锋相对地出现了近几年少有的新气象。

这一年，继红旗出版社出版美国作家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昆仑出版社出版陈敦德著纪实文学《毛泽东·尼克松在 1972》等专著之后，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玉凤等著《毛泽东轶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李银桥著《走向神坛的毛泽东》和权延赤著《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昆仑出版社出版了董志英编《毛泽东轶事》和权延赤著《红墙内外》和肖瑜著《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求实出版社出版了权延赤撰写的《卫士长谈毛泽东》，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陈登才主编的《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了李湘文编著《毛泽东世家》，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还有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闽力、刘宁荣等著的《毛泽东斯大林莫斯科会晤前后》，等等 10 几部专著。仅笔者看到的这一年出版的毛泽东传记、回忆录方面的作品，足有 200 余万字之多。其中，李银桥、权延赤、逢先知等撰写的几部传记文学和回忆文章影响尤大，特别是权延赤的几部，虽然内容情节略有重复，个别细节略有出入，但仍不失为深受读者欢迎、影响至深的比较不错的作品，原因是作品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注入了作者深沉的情感，并楔合了读者的心。

与此同时，在这一年中江出版了一些外国作家撰写的有关毛泽东的传记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国作家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的后半生》，华岳出版社出版的《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国政治新闻作家克莱尔·霍林沃思著《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以及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作家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等。这几部外国人写的毛泽东的作品，在读者中影响较大的是《毛泽东》和《毛泽东传》。至少我以为是这样。但“旁观者清”，甘肃平凉师范张怀宁同志却认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毛泽东的中国》（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为上。甚至使他对外国这位作者研究毛泽东所取得的可喜成果产生了“嫉妒”的心理。他说：

在学习过程中，我读了一部分外国学者研究毛泽东的书籍，如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斯图尔特·施拉姆著的政治传记《毛泽东》，罗斯·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特别是面前这部《毛泽东的中国》，与国内学者研究毛泽东的“概述”、“讲话”、“史稿”相比较，联系国人津津乐道毛泽东轶闻趣事的热潮，这一横向比较，让人感慨万千，也引发了我的嫉妒。我不崇洋媚外，但我嫉妒“洋人”研究毛泽东的水平与成果！正如培根说的：“嫉妒总是来自以我与别人的比较，如果没有比较就没有嫉妒”

（见《傅览群书》1990年第3期，第5页）。当然，张君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并非完全同意书中的观点。他说，“又如下棋，如果全盘接受旁观者指挥，我们就成了仆人或低能的机器人。”（同上）这些话都是有它一定道理的。

进入1990年以来，在原来基础上，不少出版社在和作家们的同心协力下，又陆续出版了不少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回忆录，如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蒋建农、曹志为合著《走近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高菊林、陈峰、唐振南、田余粮合著《青年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彬子编《毛泽东的感情世界》，华龄出版社出版的华林编《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等著述。在这些作品中，我更喜欢《我眼中的毛泽东》这部书，尽管毛泽东离开人们已有10余年之久，但一曲嘹亮的《东方红》乐曲、一个个他生前留下的镜头，都能唤起人们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回忆，毛泽东——人民的伟大领袖、人民的大救星！可是，以往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毛泽东——虽然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却知道的甚微，特别是青年人知道的更少。《我眼中的毛泽东》一书，通过10多个片段，以第一人称纪实性的手法披露了毛泽东自建国以后到逝世前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活动。这些撰稿者，都是以自己的亲历、亲闻、亲见为基础，栩栩如生如实地再卯了毛泽东思想、生活、工作和学习读书的各个侧面。人们通过每个作者的眼睛这个窗口，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举止、个性和好恶，同时也可以了解到他的工作作风、生活习惯、兴趣爱好、交际风度、骨肉亲情等特点。请看张玉凤同志写的《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中的一段文字吧：

“1月10日午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但这一天他却睡不着。我劝他休息一会，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后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想到……”

“八宝山公墓礼堂根本没有想到主席会来。尽管总理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有关领导同志，毛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工作人员仍然来不及准备。当主席的汽车到了八宝山时，连个出来接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更来不及提前赶到了。就连张茜及其子女也没料到主席会来的这么快。”

“主席下汽车后没看到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他边走边对我说：‘去问问张茜同志和她的孩子来了没有，来了就请他们来。’”

“当我把张茜同志引到大厅时，主席这里已经围坐了许多的领导同志了。有周总理、邓大姐、朱老总、康大姐、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等。主席见张茜同志进来，欠身并站起来迎接，却放快步走过来的张茜同志阻止了。张茜同志满脸泪痕哽咽着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主席看到张茜同志悲咽，也凄然泪下。他握着张茜同志的手，请她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同志看到毛主席能来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心情特别激动。她对主席有多少话要说呀，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

过去反对过主席。’主席打断张茜同志的话，不让她讲下去，主席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说完之后毛主席又一一问及四个孩子的名字及近况。总理在旁边逐一作了介绍。主席听后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陈毅时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不知道别人怎样，反正我最初看了这段文字的时候，同看到毛主席别的方面的记述一样，心里涌起一阵阵的热浪，眼泪止不住地夺眶而出。我被主席的举止、心情、友谊、风尚感动着。通过《我眼中的毛泽东》，不仅看到毛泽东的平凡，更看到毛泽东的伟大。谁能说这中间没有注入着出版家的心血？

1991年4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外名人的评说》一书，也是值得一读的一本好书。全书共选编了国内外名家的86篇文章，“既有从大处着眼纵论毛泽东一生功过，也有从小处入手叙述一时一事；既有记述青年毛泽东的个性魅力，也有描画领袖毛泽东的运筹帷幄，既有反映政治风云中、外交舞台上毛泽东的文韬武略，也有披露日常生活中毛泽东的喜怒哀乐”。总之，你读罢全书，会看到一个真正的毛泽东，一个了不起的伟人的形象，一个少有的民族英雄。同时更会使你相信，他的英名为什么会流芳百世。此书，在毛泽东回归人间中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

这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又出版了师哲同志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这同样是一本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好书。如王震同志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这本回忆录重点刻画了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引人入胜，并系统地介绍了师哲所经历的中苏往来关系的发展变化，其内容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所以生动、具体、可信，加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帮助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使内容更加翔实、准确、可靠。

进入1992年以来，各出版社的出版家们，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又相继推出了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好作品，现在摆在我面前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阎长林同志所著的《警卫毛泽东纪事》一书，就是其中比较好的一本。作者作为一名警卫排长，于1946年7月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解放战争的大反攻、决战和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亲眼目睹了这期间毛泽东同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气魄，运筹帷幄、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以及在艰苦转战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和伟大品格。今天，他运用比较生动的文字尽可能详尽地反映给读者了。又如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赵志超同志所著《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也是一本好书。全书45万字，通过大量的事实，特别是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使人们感受到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鱼水之情，并看出这位人民领袖形象的崇高与伟大。通过通俗而流畅的文字使人们真正了解了毛泽东生平中的一个侧面和他的内心世界。

另外，近几年来还出版了不少关于研究毛泽东的学术方面的专著和毛泽东的文集。如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思想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思想辞典》，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版〈毛泽东选集〉大辞典》，以及《毛泽东农村调查》、《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上下）、《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

泽东早期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毛泽东与文艺传统》、《毛泽东军事思想史》等。每年推出关于毛泽东的新书上百种，印数均在几万至几十万册，有的书一版再版，有多少，销售多少，是任何图书不可比拟的。还有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有关部门计划出版 1—10 卷《毛泽东选集》，毛岸青、邵华主编的纪实文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系列丛书，还有许多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有关书籍，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毛泽东思想宝库》，以及由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反映毛泽东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的大型画册《怀念》，等等。巨型文献群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收录 1921—1949 年中共中央文献 900 余万字，也是学习与研究毛泽东的重要史料。特别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支持与倡导下，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中，出现了一个宣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崇敬毛泽东的好势头。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是当前国内形势稳定的表现，同时这种势头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内形势的更加稳定以及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毛泽东选集》1—4 卷的再版，征订数上千万套，更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另外，不少出版家还出版了大量邓小平同志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论著。特别是出版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及南巡的重要讲话等。这些，都是学习与研究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

“作为一位历史伟人，毛泽东一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和教训，是一个由多侧面、多阶段构成的复杂而又有统一性的辩证整体。对于这个整体，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人们既可以且必要做全过程、全方位的研究和总结，也可以且必要作阶段性和特定角度的研究和总结。如果为毛泽东作政治传记，那么，就可以且必要有‘全传’和‘侧传’之分：前者对毛泽东一生政治活动做全过程加全方位的考察、记述，它的长处在于全面，后者则只着重于考察记述毛泽东政治生活某个侧面的全貌，它的长处在于专门、详细。早在毛泽东同志生前，国内外就有了不少毛泽东政治传记类的著作，且不乏力作。但是，由于这些著作是在毛泽东生前成书的，因而客观上就不可能是对毛泽东一生政治理论和实践全过程的考察和记述。毛泽东逝世后陆续出的一些同类传记，基本上弥补了这个“过程不全”的缺陷。不过，总起来看，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同类传记著作，大都属于前述的‘全传’类。专门比较详细地研究或记述毛泽东政治理论和实践某一侧面的‘侧传’，十分鲜见。”

这段话可以给人启迪，思索一些问题。从而使我们在撰写毛泽东的“全传”和“侧传”上作出应有的努力，并有可喜的成效。

在毛泽东生前的岁月中，一些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作家，对这位伟人的一生，即所谓“全传”——伟大思想和光辉实践，的确进行了诸多的研究和关于这些研究成果的撰写出版。那时，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还是取得了

一些成绩的。毛泽东过世之后，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研究，在一段时间内，虽然受到客观形势的影响，曾表现过消沉或出现过一些偏差，特别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盛行的时期，这种研究曾走向过低谷，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由于大家的共同努

力，在某种程度上说来，还是前进了一步的。其表现就是，冲破“左”的干扰，对毛泽东的认识更多的是注重于从实际出发了。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作出公正的评价以后，可以说对毛泽东的认识与研究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当前，在党中央重新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在“寻找毛泽东”和在“毛泽东热”的浪潮催动下，对毛泽东的学习、认识和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并取得了新的、更大的成就。它不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成为一门“显学”，就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中也成为一种抢手的“课题”。

同以前相比，现在既有了更客观一些的关于毛泽东的“全传”，也有了那种更客观一些的“侧传”。在对毛泽东思想学术研究方面，既有了比较好的“通史”即整个体系的研究，又有了不少

比较好的“断代史”，即某一侧面内容的研究，并且“研究热”带来了“出版热”、“学习热”。使广大读者通过这些学术作品和传记文学、纪实文学作品，了解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涵，了解了毛泽东的生活、工作、学习、思想和斗争的实践，以至他的心态、举止、个性和习惯、兴趣与爱好，及骨肉之情、友谊之情。总之，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全面的毛泽东。更确切一点说，使人们不仅看到毛泽东晚年的过失，而是看到毛泽东一生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大贡献，不仅看到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上闪烁的光辉，而且看到毛泽东在个人生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德，不仅看到毛泽东个人的经历，而更多的是看到他一生同中国革命的成功与新中国的建设那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对毛泽东的认识与评价，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并通过对毛泽东的了解，也就加深了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了解。这种“毛泽东回归人间”的可喜现象，实在是时时地激荡着我们的心，为之感叹，为之兴奋。人们对毛泽东的认识，正在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尊敬的读者，您的心情是不是和我一样，也激动不已，为之感叹，为之兴奋呢？《毛泽东选集》1—4卷的再版所带来的景象，不是更为令人感叹么！

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促使“毛泽东回归人间”的过程中，我们的作家、翻译家、学者和专家们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同志感性和理性的正确认识 and 评价，往往是首先来自他们对中央精神的正确领会，首先来自他们对毛泽东实事求是地研究，首先来自他们对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在这中间，他们其中包括出版家们所起的催化剂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通过采访、研究和亲自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比较他说来，更接近实际，更接近本质，更全面些，更客观些。这是一般人、或仅凭朴素的阶级感情观察问题的人所难以做到的。

有些作家是读者所熟悉的，他们的作品大家也都愿意读，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就和一般人不大一样，就高于有些人，他们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例如权延赤，他说：

“这些年社会上有关老人家的谣言太多，有的胡说乱传，简直不着边儿。”“有些人拿否定毛泽东当时髦，我不同意这种作法。毛主席毕竟是我们这块土地上养育出来的一位出类拔萃的历史巨人，一位民族英雄。否定他，就等于否定我们民族、否定我们自己，就不配当中国人！我写毛泽东的时候，我的眼前仿佛有这样一个画面：一片长满嫩草、开遍鲜花的原野上，一个巨人迈着坚定的步伐，迎着太阳走去，什么荆棘和泥泞都不能阻挡他。他，就是毛泽东。他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在前人没有走过的地方走出路来。我们不能只盯住他的一个脚印找他的毛病，不能因为他在前进中踩坏了一些鲜花嫩

草而批判他、否定他。他是时代的英雄。他曾给我们革命者整整一代人以精神力量。他创建了伟大的共和国。他在现在、在未来仍然给中华民族以精神力量。”

正因为他们有这样好的认识，
所以才写出那样感人的作品。

中国作家如此，
外国作家也不乏其人。

我看，英国作家克莱尔·霍林沃恩就是其中一个。他在谈到对毛泽东总体认识的时候这样说：

“作为一个伟大的叛逆者，毛泽东继承了中国古老的游击战思想，用之于 20 世纪的中国，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使之适合于他那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的政治纲领。因此，他的名字无疑将永垂不朽。他推翻了腐朽的蒋介石政权，使四分五裂的中国重归统一，因此，毛泽东还将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永远活在世人心中。基于这种认识，他才得以写出许多观点可以为我们接受的专著——《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因为“作者用以观察、分析、记述问题的基本方法是比较科学的，态度也是比较客观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毫无保留地赞同书中的所有观点。

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也是其中之一，他说：

“毛泽东现已安息在水晶枢中，但官方仍喊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口号。

“明天毛泽东的继承人仍将需要这面旗帜。对许多普通的中国人，特别是在农村，‘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象征。不管是谁，想要在今后年代里控制中国这片辽阔的国土，他就需要运用这一象征。”他还说：“真正的毛泽东，已经与中国融为一体了。”

也正由于他对毛泽东有个基本的看法，所以才得以在他的著作中肯定毛泽东对创建新中国、对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地位的历史功绩，赞扬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他对毛泽东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也作了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今后需要毛泽东这面旗帜；这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心意的，也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中国人民盼望毛泽东回归人间，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当前，出版家们出版的毛泽东的传记、口忆录和一些学术研究作品，也存在一些问题，或者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以为这主要的

是：

其一，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毛泽东权威的、或比较权威一点的“全传”，就是完全可信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真称得上是精品韵“侧传”也并不多见。外国作家撰写的几部，虽然也是毛泽东砌“全传”，但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立场、观点和记述问题的方法，固然有不少可取之处，并不理想。国内作家写的“全传”就更为鲜见。无论是毛泽东的“全传”或“侧传”，比较理想的“精品”，人们在翘首以待。

其二，作者的写作态度不严肃，对毛泽东的经历、特别是经历的重大事件，欠实事求是，缺乏深入地调查研究，在没有搞清史实的基础上，就信口开河，大书特书，所以写出的作品中，不少地方都有失历史的真实。这个问题在国内或国外作家的作品中，都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有的作品，不但缺乏历史的真实，而且缺乏艺术的真实，那就是离开本人的性格特点，离开

当时历史事件的主要背景，只顾作者个人的主观需要，任意编选离奇古怪的故事情节。从而，在读者（或观众）中造成不好影响，使作品失去可信性。

其三、有些作者写作目的不良。他们违背中央《决议》的基本精神，为了追求“票房”价值，多拿稿费，图名图利，一味迎合一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对毛泽东只写失误，不写成功，只写晚年，不写当年，取其一点，不顾其余。特别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下，百般丑化毛泽东，以否定毛泽东为能事，对抗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问题，在传记作品中有，在回忆录中有，在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中有，在学术作品中也有。缺乏应有的历史唯物主义起码科学态度。不但损伤了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同时也歪曲了党和国家的历史，损伤了党和国家的形象。有的出版商，为了捞到高额利润，竟不顾国家和民族尊严，大肆销售有损于毛泽东形象的作品。这样做的结果，也否定了作者、出版者自己，引起广大读者的反感，这些做法都是对毛泽东有失公允的，错误的。另外，从出版家们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看来，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写作的局限性。他们优于国内作家的一条是，一般说来，他们采访的路子比较广，他们可以找更多的高级领导人、或当事人交谈问题；但他们缺少更多的对历史事实的核对机会。在作品中，所运用的史料，如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多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有的作者，还热中于运用一些“传闻”、推测、推论，主观想象地联结、构想一些事件。有的对毛泽东的评价，也不够公正，有的观点同我们则完全相反。这无形之中也就迎合了国内一些落后层读者的胃口，造成不良影响。

但是，应该看到，这些问题的出现，只不过是前进中的支流，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但不会影响我们学习与宣传毛泽东的大局。在出版家、作家、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目前这方面的出版主流是好的，它为“毛泽东回归人间”这个春天的到来，送来了春风，增添了春意，温暖了人们的心。这是有目共睹，都深有体会的。

我深信，这方面的情况会越来越好。

这些日子以来，出版家们出版的关于毛泽东同志的一些好作品，在广大读者中引起的强烈反响，是你坐在书斋里难以想致的。

一位身患癌症到了晚期的青年朋友，看了权延赤写的《红墙内外》等作品，写信给权延赤，说：“我一口气读完你的大作，告别人世前能看到这样的好书，我死也甘心了。”这位青年人被毛泽东的事迹感动了。

有位工人看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纪实文学作品，对毛泽东的看法同原来大不一样。他不再认为毛泽东是满身伤疤的人，而是神州大地上出现的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这些书在青年人中影响也是大的，例如有的说，毛主席太棒了，馋了只想吃一碗红烧肉，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谁能比得了。有的把着眼点放在“主席装”上，说一位党和国家的主席，穿衣服也是缝缝补补，和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他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真是没有说的，就是现在也仍然是我们的榜样。有的说，毛主席“离”我们更近了，因为他有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的性格，他看戏也掉泪，平时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也发脾气、也骂人，甚至急了的时候还说“老子”呢。有的说，毛主席有魄力，最大的魄力就是敢和旧势力挑战。“下凡”、“回归”的毛泽东，也为从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人们，无限深情地回味着，思索着。

这些日子以来，毛泽东在学生中引起的反响更是近年来少年的。这里记述一件我亲眼所见的事情：

1990年6月11日上午9时半。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光朋日报社、中宣部新闻局联合邀请首都各界人士，就电视政论片《世纪行》举行观摩研讨会。我荣幸地被邀参加。

影视观摩开始，先听到的是刘欢的歌声：

你是一个火种
点燃这块沉睡的土地
你是一个预言
画出了人类理想的轨迹
你是一面旗帜
飘飘扬扬迎着风风雨雨
几度沉浮几度崛起
你诉说一个真谛
你是一面旗帜
几度沉浮几度崛起
你奉献了一个真理

伴随着主题歌的歌声，莹光屏上出现了字幕：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紧接着就是马克思的肖像：眼睛的特写。马克思逝世后，实际上已成为统领世界无产阶级的大将军——恩格斯的名字和事迹也展现在人们面前。许多历史镜头是鲜为人知的，极为珍贵。人们的情绪镇定了，沉默了。列宁的名字、列宁的事迹映视之后，就是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走过的路程。进入人们视野的，是关于毛泽东的一个个画面，震动人们耳鼓的是关于毛泽东的一句句旁白：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即使是住进中南海，也仍不忘是人民的儿子。田家英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耳濡目染，曾写下名句：‘一饭高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有一年黄河发大水，受灾的百姓爬到树上，衣食无着，以至于失足落水而亡，遭毒蛇争咬而毙命。毛泽东在电报上用红笔勾出这些不忍卒读的文字，丢开笔，潸然泪下。”

影幕上相映出现的是采访田家英夫人董边的镜头，董边的声音：“主席批电报的时候很难过，流了眼泪，心情很郁闷：解放了，老百姓受这么大的罪……。”

接下来，又是旁白：

“毛泽东召来田家英，用颤抖的声音念给他听，一个主席，一个秘书，相对落泪。毛泽东顿足道：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从此，淮河流域就响彻了毛泽东的誓言：‘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毛泽东日夜操劳，淡泊一生，只为人民谋幸福。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当他听到农民进了食堂，便以为是创举；当他听说人民公社，便连连称好。但当他满面春风，轻快地走过田野，真理却与他擦肩而过……”

在场的人们看到这一切，听到这一切，好像是顿时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理解了毛泽东。影视厅内只听到机器的嚓嚓声，别的却鸦雀无声。影片四集全长放映150分钟，人们聚精会神，坚持始终。影后研讨会上，领先发言的是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他们的名字是汤易、林涛、王正良、郭洪林、黄楚平。他们说，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没有经历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

座大山的欺压，缺乏深厚的历史感，因此在种种现实问题面前往往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也难免产生情绪型的盲动作法，看了这部片子，使我们认识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我听着他们的发言，似乎感受到“毛泽东回归人间”的春有，照样从这一代大学生身上萌生，荡动。

在我们面前明显地摆着这样一种生活的现实，那就是自8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生探讨和研究的多是西方的学说，他们脑袋里装着的或者说他们经历的，也多是萨特呀，尼采呀，弗洛伊德呀，韦伯呀，等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几次同学潮，打的旗帜、喊的口号也基本上是西式的。后来碰了钉子，读了一点“毛泽东”之后，经过一阵痛苦地反思，才感到了震惊，才知道了一些中国的国情。据报道，有位大学生，叫史震平，是大学生中的代表人物。他坦率地承认，在动乱的日子里，他上过街，游过行，也喊过那类口号。他曾经对有些事情不理解。在他终于冷静下来以后，买来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书籍，在床边上码放了一溜儿，一本接一本认真地看下去。结果明白了许多自己原来不懂的道理，心里像开了一扇天窗。最后，他在自己的书签上公公正正地写下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人，你应该知道中国！”

如今，《毛泽东选集》1—4卷再版了，发行了，在他们中凤兴起的读一点“毛泽东”、“寻找毛泽东热”，已不再是困惑、迷茫，或单纯的怀旧情绪的渲泄，而是寻找真实的毛泽东，探求伟大的真理，拾回自己丢失的最宝贵的精神支柱！

对于目前出现的“毛泽东回归人间”这种喜人景象，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来概括，才叫好呢？我看还是用毛泽东自己写的《卜算子·咏梅》来形容、来概括，还是较为合适一些：“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郭沫若同志读了毛主席这首词甚为感慨，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他把毛主席的词译成新体诗：“风风雨雨已把春送回去了，满天的飞雪正把春迎接回来。尽管冻结下了百丈长的冰柱，悬崖上仍然有香艳的花开。花虽香艳，不同谁争夺春天，只是说春天快到了，莫再冬眠。等到满山遍野都开满了鲜花，梅子在绿阴深处露：着笑脸。”郭老还说，你看，这是多么优美的积极进取的情调呵，悲观消极的影子连一丝一毫也寻不出来。不要以为接连的风雨，满天的飞雪，把花木都摧残了，因而失望。不，永远不要失望，坏事往往会转变为它的反面但需要有主观的努力来促进这种转变。

请看，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话语呵！

于是，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能不能为“毛泽东回归人间”的这种喜人的局面，再贡献一点什么呀？我想，这对我们的事业是万分需要的，也是每一个作家、学者，乃至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应尽的义务。这时，正好有几位同志建议我把几谈读一点“毛泽东”汇编成册，供出版家们发行，供更多的读者参阅。我认定，这是个可取的好主意。

于是，我就以“毛泽东回归人间”为题，重新拟定了撰写计划。除了对原来《光明日报》和《中流》杂志发表的“五谈读一点‘毛泽东’”作了加工修改，又加了“四谈”的题目，继续撰写出新的内容。这样，已五谈”加“四谈、成了“九谈读一点‘毛泽东，”。取了个“九九归一”的意思。其中的涵义是，任凭资产阶级自由化怎样大肆泛滥，广大人民群众，还是要在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朝着社会主义的锦绣前程继续前进！

韩愈《同冠峡》一诗中称：“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晋书·刘毅传》中称：“丈夫儿踪迹不可寻常，使棍群小中，盖棺事方完矣。”后来变成两句成语：“盖棺论定”或“盖棺事定”。就是说，人死后盖上棺盖，一个人的一生功过是非才能作出结论。

毛泽东等几位世界公认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足可以说是“盖棺论定”或“盖棺事定”了。固然在他们身上有许多教训可以总结，可以论证，可以评说，这或许是自然的，有益的；但是，我却认为，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他们领导革命走向成功的历史经验，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大胆维护他们的领袖地位，在当前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受到百般攻击和严峻考验的情况下，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引用列宁的三句话：

——对于历史人物，判断他“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先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26页）

——“如果评价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牺牲在表面上是无益的，往往是无结果的，而不顾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如果这样来评价他的活动的意义，那末，这不是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就是有意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为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做辩护。”（《列宁选集》第3卷，第823页）

我在撰写《毛泽东回归人间》这部书稿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所持的态度应该是严肃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我所把握的基本点是：对毛泽东的一生，既要从宏观上去研究探讨，又要从微观上研究探讨，通过微观去说明宏观，又从宏观上去看他的微观，而着重点是宏观，即把握他的全局和整体，既要研究探讨他成功的经验，又要研究探讨他失误的教训，把他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都看成是党的宝贵财富，而着重点则是研究探讨他的成功有益的经验，既要从政治角度上去研究探讨，又要从学术角度上去研究探讨，有时侧重在前者，有时侧重在后者，有时兼而有之，当前重点应该从政治的视角去研究探讨；既要从他的理论著述中研究探讨他，又要从他的丰富的实践活动中研究探讨他；既要研究探讨他的政治思想方面的经历，又要研究探讨他个人生活方面的经历；既要有关于他的“通史”、“全传”的研究探讨，又应该有关于他的“断代史”、“侧传”方面的研究探讨。从面，力求全面、历史、连贯、辩证地看待毛泽东，特别是注意紧密结合党史、军史和国家发展史，去研究探讨毛泽东，最终在人们面前再现一位真实的、立体的毛泽东。我的九谈读一点“毛泽东”等篇章，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原则指导下，进行撰写的。它们也正是《毛泽东回归人间》这部书稿的主体部分。我十分感谢出版家的真诚合作，也十分敬佩他们的远见卓识。宋代诗人朱淑贞有诗言：“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我想，当我这部书稿如期出版的时候，广大读者

也一定从心眼里感谢出版家们为“毛泽东回归人间”所做的努力。为此首先我要感谢来自他们的敦促。

从毛泽东故乡发出的信息

湖南——湘潭——韶山——毛泽东主席的故乡，他的诞生地，他生长、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如今也是人们向往的圣地。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是毛主席于1959年6月25日，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写下的一首诗。诗中以56个字高度概括与歌颂了中国人民32年的斗争史和敢于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同时也抒发了他回乡时的大喜大悲的心情。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对他的故土——韶山的赞美颂扬之意。

韶山。

从湘潭市出发，向西北沿湘黔铁路行驰45公里，即到达这条支线的终点韶山。

韶山，楚南之名山也！韶山，又名仙女山。“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在近代的湖南历史上，“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毛泽东就出生在这里，并由此走向世界，成为一代骄子，一代伟人。

1969年，随着人们对毛泽东“偶像”的顶礼膜拜，韶山成为地师级特区，“韶1”、“韶2”次特快专列，每天两趟从省城开往韶山，接送源源不断的朝圣者”。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声，伴着列车的汽笛声，响彻整个韶山冲，响彻湘江两岸。

1976年9月9日，巨星毛泽东与世长辞，韶山的天空逐渐笼罩起一股阴云。1981年初，韶山由地师级特区一下降格为湘潭县辖的一个区公所。“韶1”次列车停止了向韶山疾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做出科学评价，韶峰依旧郁郁葱葱，巍峨挺拔。毛泽东的伟大形象从此回归人间。

1983年12月17日，邓小平为整修一新的毛泽东旧居和韶山陈列馆分别题写了“毛泽东同志故居”横匾和“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馆牌。

1984年12月26日，湖南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韶山升格为县级区，隶属湘潭市管辖。

1990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韶山区改为韶山市。

曾经停驶过一段时间的“韶1”次列车，又沿着湘黔铁路支线，又满载着海内外的参观者或瞻仰者，源源不断地驶向韶山冲，人数逐年增加。一度门前车马冷落的韶山，又热闹了起来。1979年至1986年10月，到韶山参观的国内外游客达600多万人，1990年达96万余人，1991年高达120万人，1992年又有增加。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来到韶山，一下车就对纪念馆的同志说，来这里参观是他几十年的夙愿，今天终于如愿以偿。在毛主席故居，他看了陈列在这里的文物非常激动，严肃地对纪念馆的负责同志说：一定要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要来看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来到韶山，激动而又惋惜地说，毛主席逝世时他被下放在河南，他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很想

连夜赶回北京参加悼念活动，可是不能。于是他跑到住地附近的山头上，采了一些野花扎成一个小花圈，用白纸写上“您培养的共产党员习仲勋”几个字，然后面向北方，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以表示自己的心意。

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来到韶山，反反复复深情地说“毛泽东思想不仅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人，而且教育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仍然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国家主席杨尚昆来到韶山，参观后高兴地说，他对韶山有深、厚的感情，他这是第三次来韶山。还说：毛泽东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毛主席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还对他的女儿说，毛泽东同志一家为革命作出了这么大的牺牲，你们青年人要永远记住，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来到韶山，在松山一号楼举行的座谈会上讲到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时说：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和实践，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很大贡献。如果中国革命不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艰难把国民党政府推翻。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

我的湘潭好友赵志超，不久前来北京，跟我讲到“毛家饭店女老板”汤瑞仁的故事，十分耐人回味。

汤瑞仁是毛泽东家乡故居的邻居。30年前，她和刘秀华等人办起湘潭县第一个妇女互助组，为此从县里发奖大会上牵回一头大黄牛。一下子她成为这个地区的新闻人物。1959年6月，毛主席回韶山，她抱着3岁的孩子和毛主席合影留念。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她作为韶山的3名妇女代表之一进京参加了追悼会。回家后，她心情悲痛，十分怀念毛主席，1979年11月，饰演毛泽东的特型电影演员古月到她家体验生活，一进门，她就抱住古月痛哭流涕地述说：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可回来了！

村里实行责任田时，汤瑞仁站在毛主席像前哭了一夜。实行责任田后，她全家人均粮食150斤，年收入5000元。这一下，她脑筋开窍了，煮上一锅稀饭，送到毛主席旧居前，很快就卖完了。1987年3月，她开起了“毛家饭店”，买卖照样很好。每天收入二三百元。她说：现在搭帮邓小平，做生意好。毛家饭店开办5年来，已接待了10几万国内外游客。她把和毛主席的合影大照片挂在“毛家饭店”餐厅最醒目的地方，还热心的向来人介绍毛主席的故事。饭菜不但可口，价钱也公平合理。她自豪他说：我是在接待毛主席的客人……。

改革大潮在韶山，在伟人诞生的这块土地上滚动，毛家饭店不仅在韶山，在湘潭，在湖南，而且在全国、在国外，也都广为人知。于是，汤瑞仁便成为韶山冲里改革开放年代的“名家”。

——韶山乡妇联授予她“女能人”称号。

——韶山市妇联和湘潭市妇联分别授予她“三八红旗手”。

——韶山市税务局授予她“纳税先进个人”。

——她被韶山市政协邀请为第一、二届政协委员。

——她的事迹不仅被国内电台、报纸广为宣传报道，就连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也争相报道。国内外数百名游客给她寄来信件和照片。

人们崇敬毛泽东主席，汤瑞仁为毛主席的故乡争了光，同30年前相比，

她这位新闻人物又大大升了一级。

1990年。韶山。

《毛泽东和他的乡亲》电视剧在这里开始拍摄。它不仅再现了当年领袖和乡亲们的亲切之情，领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而且那些点点滴滴的小镜头，也充分反映了今天韶山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深深怀念。对这一点，作为这部电视剧导演的阿因同志最清楚。这位导演告诉人们——

开拍的第一天，反映的是1958年大跃进挑灯夜战、车水抗旱的大场面。天不作美，突然寒流降临，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8度。当地700多个群众演员早早穿上当年的旧衣服，围观的乡亲们至少也有二三千人，冒着严寒，站在四周等候。导演阿因一声令下，四处篝火点燃，趁着这种火热的气氛，几百个群众演员举着火把，喊着“吆喝”号子，挑着水桶“出画”、“入画”在拍演场跑来跑去。当要拍“打赤膊”车水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一点多钟了。朔风凛冽，寒气逼人。但为了再现当年的“跃进”气氛，乡亲们都脱下棉袄，光着膀子，拼命地车水。仿佛真是1958年那个样子。“我看到了毛主席家乡人们一颗颗滚烫火热的心。”——阿因导演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阿因导演，这天拍摄“乡亲”从北京回来向全体社员汇报见到毛主席的戏。没想到，毛主席家乡的人们是那样的积极热情，他们说：“这是拍毛主席的电视啊！”他们拿着小凳子早就在现场等候了。戏开拍了，当“乡亲”拿出毛主席送的“大中华”香烟，分送给大家的时候，人们和真的一样，人们真的激动起来，他们接着香烟，亲切地看着，闻着，议论着。烟，谁也舍不得抽，有的老农眼睛里还闪动着泪花，简直不是在演戏，“就像真实的情景发生在他们身边”。当扮演毛泽东的表侄贺凤生的演员

“乡亲”说到毛主席要我转告大家“食堂一定解散，一定要让农民兄弟吃饱饭”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望着那种激动的情绪、真实的氛围，不是亲临其境的人是难以感受得到的。”

这就是电视观众看到的今天韶山人对毛主席的真实情愫。

1990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说来，是不寻常的，是令人难忘的。从总体上讲：

- 是恢复毛泽东伟大形象的一年，
- 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研究重新走向繁荣的一年，
- 是思想战线正本清源、出现转机的一年；
- 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一步取得胜利的一年。

当然，也是当前出现的那种“毛泽东热”、“寻找毛泽东”、“读一点‘毛泽东’”——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精神的深切怀念和向往之心，得到一些满足的一年。

这些，从毛泽东故乡发出的种种信息中，足可以得到明证。

“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办的理论学术季刊《毛泽东思想论坛》，可说是传播这方面信息的一个得力的工具。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会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安徽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中共马鞍山市委、安徽大学等单位，于1990年10月16日至19日，联合发起、主办召开了第五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代表近120人，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党政部门、企业和新闻出版单位，共提交论文58篇，还有专著。

中共中央党校讲师古月同志，在《毛泽东思想论坛》（1991年第1期）发表综述文章，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与会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看法。

——有位代表认为，鉴于前一段时间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否定较多，因此，有必要弄清和区别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晚期思想。

毛泽东晚期也有正确的思想。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许多代表认为，我国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剧变等事实教育了我们，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分析和评价。这不仅关系到如何评价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问题，而且涉及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有位代表说，毛泽东关于矛盾、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中，下列几点仍是应当肯定和坚持的：

一、对立统一是宇宙根本法则的观点；

二、关于三大改造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仍有一定的阶级斗争的观点，

三、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的观点，

四、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还没有最后解决、巩固政权是长期的过程的观点等。

这些观点可以说是毛泽东的突出贡献，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就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毛泽东热”也作了讨论，大家主张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界，对当前确实存在的被称作“毛泽东热”的现象，应该给予关注和引导，而不应该采取冷淡或回避态度。

因为，它是时代的要求与呼唤。

——代表们认为，要着重批判借口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澄清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一概说成是错误思想的糊涂观念；当然，也要防止

肯定那些不该肯定的、与现实不适应的观点和理论。

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育声同志，在《毛泽东思想论坛》（1991年第1期）发表述评文章，题目为《1990年国

内毛泽东思想研究述略》。对这一年国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情况作了介绍。言文开宗明义地说：

1990年我国毛泽东思想研究，是在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大力倡导的政治前提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情况下，以10多年来未有的势头和深度蓬勃展开的，总体上有焕然一新的风气，翻检国内许多报刊的毛泽东研究的论文和文章，笔者深感实难全面反映，遂选择几个印象更深的角度略而述之。”

在此，不妨要中择要荐举如下：

——逢先知一篇《重温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教导》尤具代表性。

作者凭借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对毛泽东晚年关于防止和平演变、关于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关于意识形态斗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关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等重要思想作了具体而深刻的分析。

对这些论述“应当很好地加以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当年提出防止和平演变，被3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是极其重要的，是很有远见的。

逢文的这个观点，对多年来流行的毛泽东反和平演变是夸大敌情、草木

皆兵的认识是一种驳斥和反正，令人耳目一新。

逢文还指出，如果把修正主义理解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末，毛泽东提出警惕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出修正主义的战略思想是很有预见的。

——李希凡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在中国提到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近年来，毛泽东同志，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被所谓“精英思想界”围攻、诬蔑，根本原因是毛泽东思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死敌，是反自由化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要正本清源，还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澄清理论是非。这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张定鑫在《求是》发表文章指出：毛泽东晚期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总是着眼于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和宏观上来思考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启迪性的闪光的哲学思想。除了人们熟知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等观点之外，还有若干值得重视的命题，即：

“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反对教条主义的辩证法，“主观能动性有两种”——对“自觉能动性”理论的补充；“量变中有部分质变”——对“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思想的深化；“使哲学群众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原理的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对认识过程论的丰富。

这些哲学命题是我们应该珍视的精神财富。

——文化视野中的毛泽东——用这个标题力图概括反映 1990 年呈发展势头的研究毛泽东文化思想，或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毛泽东的一种“现象”或“热”。青年理论工作者陈晋的见地尤为令人注目。

他在《党的文献》、《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论坛》、

《北方论丛》等发表文章，详尽地论断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联系。毛泽东独特的思维、心理和性格在文化上的折光，揭示了一个活生生的伟人形象。他写道，毛泽东与文艺传统有三方面的联系：审美欣赏习惯，学者性的专注和兴趣，古为今用的思想表达工具。他说，毛泽东总是根据自己的历史见识、性格意志、社会实践需要和审美情趣，来与古典作家作品对话，挑战性地提出问题或重新评说，由此展露出三个方面的文化性格：

历史主义的文化观和反映论的批评方法，
平等的社会理想和冲决罗网的造反意志，
张气势、重幻想的诗意情怀。

他还从青年、盛年、晚年毛泽东的文化心理性格中，发掘出他一生理论创造与实践的不可忽视的潜质和因素，可以帮助人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毛泽东。

我还十分欣赏言声同志最后的一段评论，他说：

这不仅表现在专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和开辟了专栏的刊物越来越多，论文的数量到质量都跃上了新的台阶，更表现在这种方兴未艾的研究更具科学性，更有深度和力度，更切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实际。它继续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完成思想领域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同时坚持原则，正本清源，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因此，我们相信，在国际国内变化的形势下，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研究必将幸逢盛世、进一步取得无愧于时代的丰硕成果。

言君的这番话讲得极对。我深信，随着《毛泽东选集》1—4 卷的再版，

特别是毛泽东 100 周年诞辰的到来，那种学习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盛世”，一定会呈现在我们面前。当人们全面、深刻地了解了毛泽东的时候——从理论到实践，从读书到生活的各个侧面，那时候，人们对毛泽东诸多的“疑虑”，对毛泽东著作和对毛泽东思想，那种诸多的非难和误解，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消失。人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对继续坚持毛泽东旗帜的认识，会跃上一个新台阶。

尊敬的读者，现在让我们回到毛泽东的故乡——湖南去吧。

湖南，毛泽东的故乡，昔日为中国革命，曾做出过别的地区所不能代替的贡献；今日，在汇集、传播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成果上，同样走在了前头，同样在起着别的地区所起不到的作用；就是在研究学习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方面，也没有落在其他地区的后面。

1990 年——毛泽东诞辰 97 周年的日子里，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市的党政干敞专家学者，会聚一起，成立了“湘潭毛泽东思想研究会”。

这是继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专业委员会、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会之后，在湖南省内成立的第四家毛泽东思想研究团体。它说明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在毛泽东故乡的繁荣和发展。

湘潭，作为毛泽东故乡的故乡，学习、宣传、研究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负有特殊的使命，肩负重要的责任，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

它将发挥自己在政治地位、历史资料、研究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重新树立毛泽东的伟人形象，为继续高举毛泽东这面旗帜建立功勋；

它将告诫大家，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危机的形势下，坚持和捍卫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保证革命事业千秋万代继续下去，将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

如今，毛泽东的诞生地——韶山，尤其成为进行毛泽东思想教育和进行传统教育的重要课堂。

就在这一年的 12 月 25 日，即在毛泽东诞辰 97 周年的前夕，虽然寒气袭人，但在韶山宾馆会议室里，却是温暖如春。由韶山管理局、韶山区委联合召开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弘扬革命精神”座谈会正在这里进行。

省顾委副主任王治国从省城赶来参加座谈会，积极发言。他在缅怀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之后，继续深情他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维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统一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善于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搞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以推动经济发展和两个精神文明建设。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沈瑞庭也从省城赶来主持这个座谈会，并讲了话。前来参加这个座谈会的还有省政协副主席刘国安、省军区政委金锋，以及省办公厅、省宣传部、湘潭市委的负责同志，还有韶山区的干部、群众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属代表。

从始至终，会议洋溢着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片片深情。

为充分利用韶山的文物资源，迎接毛泽东诞辰 97 周年的到来。韶山管理局从前一年的下半年开始，便组织干部职工，认真撰写宣传毛泽东生平业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到毛泽东 97 诞辰纪念日之时，已有 100 多篇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为丰富这一宣传的内容，近两年来，他们还先后从全国各地征

集有关毛主席的革命文物和有关历史资料数千件，图片 700 多张。

近年来，到韶山参观的国内外观众，日益增多。毛泽东诞辰 97 周年这一年已突破 90 万人，出现 10 年来参观人数的最高峰。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韶山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热情为参观群众讲解的事。就在这一年，他们仅为参观团讲解，比头一年就多 1197 次。另外，在毛泽东诞辰 97 周年这天，前来纪念馆参观的人，还可以看到新增加的历史文物 247 件，毛主席的历史照片 122 幅，手稿 103 件，文章、书信、著作等 95 件，历史文献 108 件。

不仅如此，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还不辞辛苦，深入机关、工厂、乡镇、农村，作专题报告，专题讲解。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板仓，绿水环绕，青山掩映。

1990 年 11 月 4 日，上午。阳光普照。

杨开慧烈士汉白玉塑像落成典礼开始，美丽火红。

杨开慧烈士的巨尊汉白玉塑像落成，为毛泽东诞辰 97 周年纪念，增添了光辉，增添了气氛。再过两天，就是开慧烈士的生日（1901 年 11 月 6 日）。这也是毛泽东的故乡发生的一件振奋人心的喜事。

当宋时轮、耿飏两位老将军，将帷幕缓缓拉下时，一位年迈的老奶奶，从参加典礼的人群中走来，深情地将一只山鸡塞到毛释东、杨开慧的孙子毛新宇手里：

“孩子，煮煮吃了！”

毛新宇，这位大学 3 年级、谙知历史的学生，深深懂得——不，深深理解老人的心意。——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热爱领导他们创造历史的伟大领袖。

是的，此时此刻，湖南省长沙县的板仓父老乡邻们，心中有多少话要讲，胸中有多少情要诉啊！

杨开慧出生 3 年后，父亲杨昌济出走东洋，求取功名，她随母亲向振熙在板仓度过了童年时代。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后，把队伍拉到井冈山，杨开慧带领孩子回到板仓老家，坚持地下工作，她与毛泽东音讯不通，心情惆怅，遂于 1928 年 10 月写下了《偶感》词一首：“天阴起朔（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1930 年 10 月中旬，她被捕入狱。1930 年 11 月 4 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

如今，人们望着这尊高大的汉白玉像，仿佛看到了当年烈士同毛泽东并肩战斗的情景，仿佛听到了烈士“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和毛泽东“我失骄杨君失柳”的壮丽诗句，又仿佛闻到了 60 年前烈士残遭杀害时的血雨腥风气味。

然而人们得知雕琢烈士壁像——这块白壁无暇，冰清玉洁，百年难寻的稀世之宝，来之不易，并包藏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时，又无不感到莫大的欣慰。

用汉白玉为开慧烈士塑像，是烈士家乡人们的共同心愿，也是毛泽东家人的共同心愿。为此，毛、杨的儿媳邵华专程找到总参防化兵部华钟亮副部长，请求其代为寻找适合的石料。华副部长当即委托某地驻军杨政委想尽一切办法寻求这种宝石。杨政委来到驻地大石窝，老石匠告诉他，这里已有几

十年没有采到上等的石料了，用来塑像的汉白玉，更是难求。杨政委怀着一线希望来到产石料的高庄。采石场高场长告诉他，在建造毛主席纪念堂时挖掘开采的石坑内，不久采到一块重 28 吨的一块第一流的汉白玉。光译洁净，质地均匀，百年难遇。不过，这块玉石早已安排了用项。

“这块汉白玉，给开慧烈士。就这么定了”。高场长十分爽快，并继续说，“给开慧烈士塑像，是这块玉石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福分。杨开慧同毛泽东是一对志同道合的、相亲相爱的夫妻。在他们过世若干年的今天，能在一个石坑内采到两块血肉相联的玉石，为他（她）们先后塑像，这真是宝玉通灵啊！”这会，用这两块宝玉塑成的形象，一尊在北京毛主席纪念堂，一尊在湖南的板仓。灵通宝玉，相映成辉。人们怎能不为之高兴呢！

当然，人们也不会忘记，为这座雕像的建造，神州大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许许多多的老人和儿童，许许多多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做出的奉献。人们更不会忘记中央领导李瑞环同志在百忙中，5 次打电话，过问雕塑工程的进展情况，并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问题。

1991 年 11 月 7 日，是杨开慧同志 90 诞辰，人们在她的故乡，同她的亲人们一起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湖南省委、省政府成立了由省委副书记杨正午牵头的“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并决定了许多新的建设项目。到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时，韶山在我们眼前出现的将是这样一幅庄严肃穆而美丽的情景。

——街道两旁矗立起一栋栋具有韶山特色的园林式建筑；

——火车站西北处，将建一座革命烈士陵园，供人们缅怀毛泽东一家和韶山 148 位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

——在韶山冲大坪，可以目睹一尊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全身铜像，

——在韶山纪念馆的东面，将是一座具有国家先进水平的毛泽东图书馆；

——在攀登韶峰的沿途，可以观赏和阅读一百块用四种文体刻写的毛主席的诗词碑林。有毛主席的手体，还有著名书法家的墨迹。其中有一首诗还是 1915 年毛主席青年时代写的，从未发表过。诗的题目是《挽易昌陶》。到此将看到它的全文：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灭友，悲叹有余哀。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蹭躅难城限。城限草萋萋，洋泪侵双涕；彩彩余孤景，日落衡云西；方期沆漾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鸣鸡一声唱，汗侵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观山蹇骥足，飞颺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倩且静，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此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尽早亡、雅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未有千日，谁与共平生？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愈泓。”

为纪念毛泽东 100 周年诞辰，中共湖南省委将于 1993 年上半年在韶山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会还开展对学术研究成果的评奖活动。

现在我们可以说，从上述毛泽东故乡发出的种种信息中，不是可以看出“毛泽东”回归的情景吗？不是可以看出一点“毛泽东热”——当代人民群众心理的一些熠熠折光吗？

不知别人作何等想，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

怀胎十年

这里讲的，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1989年12月1日，是一个隆冬时节的天气。李白的《大猎赋》描写这个时节的情景时这样说：

“严冬惨切，寒气凛冽，不周来凤，玄冥掌雪，木脱叶，草解节。土囊烟阴，火井冰闭。”

那就是说，在这个时节里，无不给人一种凄凉、寒冷之感。然而，这一天给我的感觉却不大一样。天气一直晴好、温暖。营区一带的山峦、楼舍、园林，虽然也都浸沉在隆冬的氛围中，但天空淡蓝，万里无云，穹庐似地笼罩大地，一切都显得那么恬静、明朗，令人心旷神怡。

时近中午，在路上遇到一位多年同窗好友，他十分高兴地对我说：“你的文章今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很好！我读了很受启发。希望你再多写些这样的文章！”

看来，他的态度是那样的真诚，话全是出自内心，无半句虚言。

但是，我一时没有反映过来。定了定神，冷静一想，这才醒悟过来。我说：“啊，是《读一点“毛泽东”》吧！”“是的，是《读一点“毛泽东”》。”他回答我。

这篇文章的发表，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不免想起这篇文章从最初撰写、修改，到最后发表，所走过的艰难、曲折而漫长的路程。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是人们生儿育女一条不变的规律。孕育之后，只要时间一到，你就会看到自己活泼可爱的小宝宝降生人间。我常把自己撰写的文章比喻为心爱的小宝宝，孕育虽然是痛苦的，但每当如期分娩——发表出来时，便使人无比高兴。多年来，这种幸福的时刻不断充实到我的生活中来，可以说这种生活，大半生以来，与我的生命相伴而行。而唯独《读一点“毛泽东”》这篇文章，却打破常规，使我感到写作的艰辛，尝够了写作的甜、酸、苦、辣。这篇文章，不是“怀胎十月，一朝分娩”，而是“怀胎十年”，才得“一朝分娩”。

我记得，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人们对于他的离去，都十分悲痛。我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成长起来的一名共产党员，作为跟随他老人家战斗多年的一名士兵，心情自然也很难过。于是，我不由得时常想到马克思死后，恩格斯评价他的一段话。那是1883年3月14日，即马克思停止思想的这一天，恩格斯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在信中。他简要叙述了马克思病逝的经过以后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我觉得，今天用这话来评价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那也是恰当不过的。于是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以浓厚的怀念心情，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关于纪念和评价他的文章。全文大约4000字，标题是：《爱敬溶于评价中》。发到一家报社，没想到只采用了百十个字。它自然不足表明我的全部思想和内心的情感。

我为之懊丧。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批判“左”的错误、反对个人崇拜的同时，有

些人由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地批判或其他种种不公正的对待，而跳不出个人的得失与恩怨的小圈子，有意无意地贬低毛泽东。有的感情用事，传播一些不着边际的谣言，往毛泽东脸上抹黑。甚至有的人以丑化、否定毛泽东为乐趣，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

面对这种情况，我心情沉重。我想，在毛主席活着的时候，把一百个“好”都归于老人家一个人身上，无边无沿、无止境地吹捧、崇拜，一个万岁接着一个万岁还嫌不够，又加上一个“万寿无疆”，把好话说尽，甚至送到天上；而这会儿，毛主席不在人世了，就把一百个“坏”都归罪在他一个人身上，并无边无际地贬低、毁伤，把坏话说尽，甚至把老人家送到地狱。这一好一坏、一左一右，不少是从一个人嘴里说出。我想，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与中华民族和党的传统相违背的，对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都不利，也是个道德品质问题。

然而，应该怎样正确地回答现实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又怎样恰如其分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呢？由于受主观和客观种种因素的限制，我自己一时也搞不大清楚。这时，我除了请教马恩列斯，研读他们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有关论述外，还拜读了鲁迅先生的一些著作。鲁迅先生的《忆刘半农君》为我提供了一些思想的武器。他在这篇文章中说的这些富有感情的话使我很受启迪：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他的感情，和他生前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

尔后又拜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先生在文中讲到一个比喻，也算是一个故事罢，对我的思想颇有启发。他说：

“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鲁迅先生接着解释说：因为“两国的照像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伺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我想，今天我们对待毛泽东，应该学习鲁迅先生对待刘半农，溶敬爱于评价中，“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特别是“对他的感情，和他生前也并无变化”。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精神和思想将永远在我们的生活中起作用。我们绝不能采取中日两国照相师的作法，搞实用主义，搞各取所需，更不能专“照”他的缺点。

于是，我对我的文章再次进行修改，寄给一家青年刊物，期望引起共鸣，得到支持，加以重视。我当时的想法是，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的一篇文章虽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如能借到“一席”之他说说我心里的话也感觉慰。可文章寄出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社会上流传的那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没有解决，我心里不安。

后来，在批判两个“凡是”和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中，有些人违背中央的基本精神，借题发挥，走得更远。有的人假借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是批判毛泽东，诽谤毛泽东，不是在探寻真理，而是歪曲真理。有的人简直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好像毛泽东是当今世界上“第一号”的罪人。难道说，毛泽东真的是如有的人说的那么一种罪人吗？面对这种情

况，我的心情愈加沉重了，我私下里想，经过 10 年“文化大革命”，使一些人的思想达到僵化的程度，黑白不辨，是非不分。现在思想应该解冻了，但不能离开马列主义原则，不能是脱离实际无止境地乱来。越过真理一步，就会走向反面。

其实问题并不复杂，中心的问题，还是一个如何抛开个人的恩怨、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和感情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看待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十年的斗争历史的问题。对这个关系的重大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我，绝不能置若罔闻，等闲视之。

但究竟怎样认识这些问题，我自己一时也难理出个头绪。这时是邓小平同志的有关重要论述和中央《决议》为我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我拜读了邓小平同志在 1978 年 12 月 13 日于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他说：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

1981 年 6 月，我又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功过问题，《决议》中作了组织的历史的公断。其中给我印象极深的是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依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和《决议》的精神，我对我的文章再次加工修改，完成后又一次送往一家报社。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得到的回答是：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已经解决；中央也作出过决议。意思是我的文章没有发表的必要了，言外之意还有多此一举的意思。但是，我却仍不甘心，因为实际上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有些人的思想并没有统一到《决议》和邓小平同志的观点上来，有些人还在一意孤行，向着相反、向着更坏的方面发展，所以，我又把文章送给另一家刊物，心想也许会碰到一个真“包公”。但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使我大失所望：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不适当，会引起一些人的迷惑不解，有人会说：现在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呀。”实际上他的意思是为什么要同否定毛泽东的人对着干，唱对台戏。他们唯恐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怕失去一些读者，或者说他们自己就是同那些读者持同样观点

的人。

我的文章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打了回来。我把一次次的退稿和一封封的退稿附信，摆在面前，看着它们进行反思：我为了什么在苦苦追求一篇文章的发表？是为了名吗？不是，我发表的作品、文章不算少，我的名字在一些读者心目中，并不陌生，为了名我完全可以写些适合某些“读者”需要的东西：是为了利吗？也不是。为了利，我可以写出许多适应“形势”的东西。当我想到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股又一股否定毛泽东、否定党的历史乌云时，心里又感到一阵阵不安。

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大肆泛滥，否定、歪曲毛泽东之风越来越严重。他们不仅否定毛泽东，而且以否定毛泽东为突破口，进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建国后40年的伟大成就，否定党的全部历史，直至否定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后来发展致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严重的政治风波，以及在这场政治风波中还发生了涂毁毛主席画像的严重政治事件。在光天化日下，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不叫人深思呢？

于是，我又想到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

针对当前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我对我的文章再次进行了修改。但是，基调并没有多大变动，只是在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又上升了一步：应该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败上去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将原来的题目《敬爱溶于评价中》改为《读一点“毛泽东”》，从读毛泽东的有关传记、回忆文章提出问题，展开论述，目的是让读者通过毛泽东一生的生活斗争经历去看他的伟大和正确认识与评价他的功绩。文章投向一家大报，数月过去没有回音，石沉大海。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指名道姓又投给《光明日报》的总编张常海同志。我想，我们之间素昧平生，从未有过什么交往，这八成又是枉费心机了，但没料到，我的这篇东西在10年后的今天竟很快得到全文发表。

“怀胎十年，一朝分娩”，怎能不叫人激动呢！

这天，夜已很深，我躺在床上却没有一点睡意。不知是月光，还是外面路灯的光亮，透过窗帘，映照进来，整个卧室显得明晃晃、亮堂堂。家里人一个个都已进入梦境，只有这朦胧、静寂的冬夜在伴随着我沉思默想。10年间，我撰写的《读一点“毛泽东”》（原名“敬爱溶于评价中”）所经历的沟沟坎坎，这时一幕幕映照在脑海。想着想着，不知不觉眼睛里慢慢地泌出一眶泪水。这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一滴滴淌在枕巾上。这是因为一时的高兴，还是因为10年积聚的隐痛所致，我自己也说不清。

然而，我想得更多的还是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我为他全心全意为人民立下的汗马功劳感到高兴，又为他晚年的失误感到惋惜，同时也为有些人对他有失公正感到气愤。

我赞成这样的说法：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富强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他所下的功夫，不亚于当初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寻找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所下的功夫，不亚于战争年代他研究军事，指挥千军万马夺取政权所下的功夫。

这话是有道理的。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但凡熟悉新中国40年来这段历史的人都会清楚地记得，建国初期，国内外反动派相互勾结，蠢蠢欲动，新政权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可能。美帝国主义

霸占我国领土台湾，不久又发动侵朝战争，除经济封锁之外，还威胁我国的安全。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肩上担子的分量是何等的沉重！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派，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捣乱，并使国内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了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在短期内赶上或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他又下苦功夫读书，下大力气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进行一切可能的调查、研究、实验。后来，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连续3年又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在这种严重的困难面前，毛泽东带头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度过了难关。可是，有些人对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全然不顾，都一概否定，一概抹煞，只攻一点，不计其余。竟然达到冷而不能再冷、凉而不能再凉的地步。这无形中也就损伤了党的形象，破坏了民族的尊严。让人难以容忍。如此对待一位伟人，一位中华民族大救星，怎么会不让人难过呢！于是，我骤然忆起三位名家的话：

鲁迅先生说：“尚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灭，尚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既然太阳上也有黑点，‘人世间的事情’就不可能没有缺陷。”

高尔基说：“评判人们的时候，不要根据人们的短处，而要根据他们的长处。”

这些话，都适用于毛泽东。

不过，我感到安慰和欣喜的是，我的文章虽然经过10年寒窗之苦，但毕竟在今天得到社会的承认。这倒不是说我的文章写得多么好，而是反映出人民对毛泽东这位英灵的呼唤，是当前“毛泽东热”中的一股热浪，也是人们在“寻找毛泽东”的过程中迸发出来的一种很自然的现象。有些言谈话语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现将我亲身感受到的几个片段，记录如下：

——一位老同志见面第一句话就悦：你的《读一点“毛泽东”》。我一连看了好几遍，写得在理；有很多话，我早就想讲，今天你在文章中替我讲了。

——曾在一起工作过多年的一位老战友，打电话来说：“为你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感到高兴；我周围的同志们都看了，都很感动，有位同志问我写这庸文章的是什么人，我给他作了介绍，他对你表示佩服。”

——有位读者，曾被错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20年，身心都受到一定伤害。他来信这样说：“看了你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读一点“毛泽东”》很是感动。因为它在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的问题上，有一定的说服力，我完全赞成你的观点。不论是谁，都应该首先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都应该充分肯定毛泽东应有的历史地位。为你高兴，并希望你能继续写些这方面的文章。”

——有位作青年工作的同志来信说：你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读一点“毛泽东”》，我看了好几遍，我的几个同事也看了，他们和我都有同感。我们青年人对毛泽东主席的感情，不但是深厚的，而且也是永远不变的。因为他同党和国家的历史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他不仅代表了过去，在一定意义上讲，他的模范行动和他的思想，也代表着党和国家的未来。他老人家是我们青年人学习的楷模。虽然他在晚年犯了错误，但是属于好心办了错事，是可以让人理解的。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就是放到别人身上，也会是难

以避免的。何况责任并不在他一个人身上，是党在工作中的失误。作为我们每一个青年人来说，就是要更多地学习他，了解他，特别是要全面地、历史地认识他的一生。

——一位地区物资管理部门的党委书记写信说：你的《读一点“毛泽东”》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表现，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有力回击。因为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对抗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千方百计地否定毛泽东，否定党的历史，从而达到他们否定和改变社会主义现实的目的。所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按照中央《决议》的基本精神，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永远高举毛泽东这面旗帜，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方向和前途的大事，绝不能等闲视之。

——北京琉璃厂古书店一位退休老工人说：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我们深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几十年的伟大成就，就没有中国人在十一届亚运会上的壮举。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吃水不忘掘井人”，谁要是否定毛主席，谁就是忘本，那就叫没有良心。现在有些人搞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说到底还不是想让中国广大的劳苦群众，回到旧社会的老路上去？跟着资本主义国家跑，到了还不是成为人家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多的人理直气壮地宣传毛泽东，来高举毛泽东的旗帜。这就是我老汉阅读了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感想。

另外，使我感动的是，有的刊物、报纸的编辑上门来约稿，让我为他们写出同类性质的文章；有的读者，看了我的文章，除了表示赞同外，还寄来有关毛泽东的资料，让我在学习研究毛泽东、写作有关毛泽东的文章时参考。

好了，我不再一一例举了。我只是想说，尊敬的读者，当你看了我的这些记述之后，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难道你不会感觉到，“毛泽东”真的又回到人间、回到你的身边吗？在此我想到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的话，他说：

“感情有着极大的鼓舞力量，因此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重要前提。谁要是没有强烈的感情，就不会具有强烈的志向，也就不能够热烈地把这个志向体现干事业上。”

饱经忧患、历经风霜的中国人民，对毛泽东同志是有着深厚感情的。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有个共同的心声：毛主席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刘少奇同志曾说：“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还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正是毛泽东同志这种平凡而伟大，把中国各族人民的道德、感情、目标和社会主义事业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串通在一起。这是任何人都拆散不了、离间不了的。这正是我们的事业大有希望之所在。同时，这也正是我们各项工作、特别是思想工作以及：防止和平演变、搞好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历史将证明

毛泽东回归人间的生活现实说明什么？人们不再把他当成“神”，而是食人间烟火、具有七情六欲的人了。这在马克思主义认识上来讲，可以说是一大进步、一大胜利吧。从那种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当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在中国人民思想史的史册上。不妨写上一笔也无不可。有人说，“神秘的色彩一旦消失，我更觉出毛泽东的伟大，也更觉得他可亲可敬。”有道理，我赞赏这样的话。

不过，我还常常这样想，原来人们把毛泽东主席尊奉为神，以致出现一些现在看来让人好笑的事，搞一些唯心主义的东西，能把责任推到老人家自己身上吗？现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有一种深刻的社会根源和久远的历史根源的。如果有谁硬是不承认这一点，我看他不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中国人（世界其他国家也如此）对神的信赖与敬奉，可不是现在的事。神——“神仙”、“神灵”、“神道”——这种观念，据史学家考证，产生于原始社会，是在人们不能理解和驾驭自然力量以及社会力量时，神的力量便以人格化的方式在人们的头脑中，造出一种虚幻的反映。这种神的力量，便是人们幻想的主宰物质世界的、超自然的、具有人格和意识的存在的东西了。于是，人们崇拜它，信仰它，供奉它，竟至超过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这种种的现象，历来较多的存在于宗教与神话中，特别是成为一切宗教的核心。

神，究竟是什么？神，是从何处来的？神，是怎样一个长像？这一连串的问题，谁能说得个一清二楚？从有了神的传说、神话以来，没有见有那个专家、学者，以至包括艺术家，对神做出过真实地考证、形象地描绘或文字的结论。以笔者之浅见，神——往往就是指的人，把人神化为超凡的东西罢了。

不妨，以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为例。

据传，佛教创建于公元前五、六世纪。它的创始人，即被尊为“教祖”、“神宗”的释迦牟尼，原本就是一位普通的“凡人”，是迦毗罗卫国（当时的东印度，在今尼泊尔国内）的太子，本名为乔达摩·悉达多。因为他是释迦族人，所以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传说，释迦牟尼作太子时，因看到人世间生、老、病、死种种苦难，再加不满于当时的种族制度和婆罗门神权统治，为寻求解脱人们苦难的真理，在他 29 岁时，便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并建立了佛教。他的教徒们就把他尊称为佛。佛者，即“觉者”、“智者”，实际上就是“神”的意思。他的教义根深奥。他的教徒，除了精通教义，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就是进行自身的修养，用教语说就是修行。根据修行的程度，证得果位（取得正果）。佛教的果位有佛、菩萨、罗汉等。不论是佛，还是菩萨，或是罗汉，实际上都是凡人所为，这谁能说不是后人将他们神化了？

再以传入中国的佛教为例。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东汉明帝时期，同中国的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很快发展成为我国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一大宗教。

以罗汉而论。在我国佛教寺院中，常见的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之分。但无论其数量多少，造型多大、多高，都有其真人实姓的来历。

菩萨也不例外。据说，疯僧济公菩萨就是宋代天台人，姓李，名道济。出家后在杭州灵隐寺以佛教为事。有名的永明禅师，也是我国宋代的高僧，姓王，名延寿，字冲元。

总之，把人尊奉为神，在中外历史上有传统的就是了。不过也有人是不信那一套的。例如后人把孔老夫子当神灵供奉，修庙宇，进香火，弄得神乎其神，可是他自己就不信那一套。《论语·述而》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意思是孔子不谈论关于怪异、勇力、叛乱和鬼神的事情。那是因为孔子不大愿意谈什么力和乱，不大相信有什么鬼和神的存在。南朝齐梁对的那位思想家范缜，也是不相信有什么神的一个。他于天监六年（507年），发表著名的学术著作《神灭论》，以刃利为喻，就严密论证了精神依赖于形体的道理。他相信有精神，但不相信有什么神。他认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人的精神只是形体所发生的作用，而形体则是精神所从属的实体，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他以无神论的思想否定了“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迷信的说教。在南北朝佛教“国教化”时期，范缜的《神灭论》，对当时的反佛斗争是起了积极的影响作用的。

尽管无神论与有神论斗争了许多年，但对神灵的迷信与崇拜，还是一代传一代的传了下来。它不但是宗教的核心，也是许多普通百姓迷信与崇拜的偶像。在建国初期，以至此后的许多年，曾灭绝了一阵子，现在有些地区又兴盛了起来。可见它的影响之深呵。不过信神或信鬼，都有一条规律可寻，不论宗教还是平民，一般都是把好人、为民除害造福、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崇敬为神灵；把坏人、欺诈残害人的人，给人们带来灾难的人，都斥之为鬼。以佛教尊奉的释迦牟尼和疯僧、高僧来说，他们都是佛教徒心目中的好人，是肯定无疑的，还有三国时的英雄关云长即关公，被人们尊奉为关老爷，人们还把宋代的民族英雄岳飞，尊奉为神灵，加以供奉，即是明显的例证。

从这条规律中，无形之中悟出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从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中被解救出来的中国人民，把拯救他们的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尊称为“人民救星”、崇拜为神灵般的人，就不足为怪了。特别是这股热浪，最初在我国的大西北兴起，就更让人可以理解了。西北五省人民，历代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欺压与盘剥，所受水深火热之苦可称全国的典型地区，也可以说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一个全国之最。特别是在地区封建官僚马步芳、马鸿逵“二马”家族的欺压下，更是苦上加苦，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不但常年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就连生命也没有一点保证。“二马”对西北人民的统治与压榨到了极点，人民生机无路可走，要求起来革命的情绪也到了极点。平日无法生活，遇到灾年其状更是惨不忍睹。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就留下这样的一些令人发指、使人惊异的记载：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恶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

你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子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旱丸软软地挂在那里像干瘪的橄榄核儿——

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嶙，乳房干瘪下垂，像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家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

这是一位外国人——斯诺先生在 1929 年 6 月，访问蒙古边缘省地时，亲眼看到的情景。没有半点的虚假和夸张。这也是解放前旧中国整个生活情形的一个写照。

“长夜难明赤县天”。解放前的旧中国一直在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劳动人民终日不见天日。“一唱雄鸡天下白”，红日从东方升起，灿烂的光辉照亮了祖国的大地。1949 年 10 月 1 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结束了近百年来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不但从政治上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了主人，而且经济上也一天一天好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仅仅一年的时间，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年轻的新中国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出现空前未有的大好局面。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

在这种从未有过的喜人的形势面前。善良的劳苦大众，经过新旧两个世界的对比，沿用数千年的乡俗习惯，甚至迷信或迷惘的做法，把对党的全部感激心情，集中倾注在毛泽东身上，把毛泽东喻为太阳，尊为“神灵”，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有些唯心主义的作法，不但没有得到控制与纠正，反而越发严重起来，以至使这种唯心主义气氛笼罩了全党。特别是在 10 年“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使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达到了极端的程度，将毛泽东送上更高的神坛的地位，因此而给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造成损失，带来危害。这个历史的教训，的确是值得记取的。

其实，毛泽东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什么“神仙”、“圣人”。他小时候也挨过父亲的打骂，上学时国画考试也有过不及格，出门在外鞋子也被人偷去过。参加共产党、成为革命者之前，还当过兵，失过学，并作过成为什么“家”的美梦。成为革命家以后，甚至当了党和国家的主席，他也没有忘

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就是对他的个人迷信、崇拜到了最严重的时候，他还能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他不同意为他塑造那么多像，他不同意以他的像造那么多纪念章，他更不同意为他祝寿。人们称他“万岁”，他就反感。实在过不去了，人民喊他万岁，他也喊人民万岁。这方面的教训是有的，不能否认。

然而，提到“神”，也并非专指“神仙”、“神灵”、“神道”什么的。去掉迷信的成分，还有奇异莫测，异乎寻常，神乎其神，等等的意思。还有，神工鬼斧，形容技艺精巧，似非一般人所能为之，神出鬼没，比喻用兵如神，出奇制胜，神奇迅速，不可捉摸，《淮南子·兵略训》中即有“善者之动也，神兵而神行”之悟；神机妙算，形容智谋无穷，不可测度，《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就有这样的崇拜之词：“瑜大惊，慨然叹曰：‘孔明神机妙算，吾不如也。’”；又如：“神通广大”，原指古印度各宗教相信修行有成就的人，具备各种神妙莫测的能力，今指具有“特别高明本领的人，形容他本领极大，《西游记》中也有这种用语：“弼马温（即孙悟空）果是神通广大！”

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的毛泽东，不是神而是人，但是在他身上似乎也存在如神一般的威力。如在对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上，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在战略策略上总是比别人略高一筹，不但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等所不及，就连蒋介石老先生也败在了他的手下。你看，这不是“神乎其神”吗！

国外学者琼·何尔说：“毛的思想代表着一种创造性的全新思想，很明显，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土壤上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传统的中国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新框架中的修正，另一方面，它根植于上述两种意识形态中，事实上它是中国传统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创造性结合的独特产物。”

毛泽东之所以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还不是因为他具有如神一般的本领（当然不是说，他这种本领是神赋予的，或是天生的，而是自己读书与实践的结果），创造了这种“独特产物”的结果吗？谁不承认这一点，谁也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者。

今天，人们欢迎毛泽东回归人间，或者说，人们敦促毛泽东回归人间的早日到来，人们所认定看重的，所要继承、发扬、光大、发展的，还不是这种独特的产物，还不是出于这种积极的考虑，还不是从这一点出发吗？

尊敬的读者呵，请您沉静下来，细心地想一想，看我说的这些有没有一点道理，有没有一点可信之处，有没有一点可取之意。

一天，我问女儿：“现在人们最喜欢看的是什么书？”

她很干脆地回答：“对毛泽东传记和关于他的回忆录之类的书，人们还是挺爱看的。”

我说：“人们不是挺喜欢看武打的、爱情的，如港台过来的，琼瑶的书吗？”

她说：“这也不尽然，30岁以上的人，对毛泽东的书，还是满感兴趣的。”

我知道她不像中老年人，对这类问题的回答，绝不带什么倾向性，因此，我相信她说的话是真的。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个问题的覆盖面和它的准确度，我又到附近的几家新华书店门市部打问，究竟什么书卖的最快？他们一致地回答：毛泽东传记、

纪实文学，几次进书都销售得很快，几乎供不应求

我有一个最不爱读书的孩子，回到家来，看到我买回的有关毛泽东的纪实文学、传记、回忆录，都拿起来看，而且看样子读得还是那样津津有味，爱不释手。

最近听广播、看报道得知，社会上又掀起一阵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又被提到日程上来。抗洪英雄周丽平烈士，生前为买一套《毛泽东选集》跑遍石家庄市，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例。

因此，我确信这两个概念是对的。

——读一点“毛泽东”，已成为人们生活学习的一部分，

——毛泽东回归人间，已是客观存在。

最有趣的是，我小小外孙。

在他3岁的时候，我同老伴曾带他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过一次毛泽东主席的遗容。我记得，在还没有进入纪念堂的大厅以前，他是没有像大人那么耐心地在外面排队等候，一会跑出队伍的左边，一会又跑出队伍的右边。当瞻仰的队伍缓缓步入大厅时，他也没有那么耐心地一步一个台阶地慢慢往上攀登，要不一步跨上两级，要不就跑出队伍一下子跨过三级、四级。然而，当队伍行至北大厅，看到毛主席的坐像时，他的情绪立刻镇定下来，和大人一样，将注意力都集中在毛主席坐像上；当他跟随队伍行至毛主席的棺柩跟前，看到毛主席慈祥的遗容、躺在那里似乎在安眠时，他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久久舍不得离去。走出纪念堂，来到天安门前，面对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大人又为他讲了几段“毛爷爷”的故事。这对我们大人们来说，都是无意识的，并非想在一个3岁的娃娃头脑中灌输一点什么。但在他的小小的心灵上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此后，每当从电影、电视或书本、画本上看到毛主席的形象时，总要情不自禁地喊：“毛爷爷！毛爷爷！”最让我感到惊异的是，如今他已长到6岁时，一天晚上我们俩一同看电视，他望着荧光屏上的画面，突然深情他说道：“我们不能忘记毛爷爷！”为什么从他小小的心灵中一下子冒出这么一句使人动情的话，我没有立刻反应过来，只是蓦然地回答他：“是的孩子，我们不能忘记毛爷爷！永远不能忘记！”

“不能忘记毛爷爷！”这话竟出自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之口，有的人也许觉得它是那么幼稚可笑。然而，我却从中得到一点启示。那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传统的教育，应该从幼儿园的孩子做起，应把热爱毛泽东，学习毛泽东，捍卫与继承毛泽东这面旗帜，从孩子们做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在此，我又想到1980年美国纽约市市长爱德华·科奇，访问中国时对李先念同志说的话，他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孩子们，看上去是不但受到很好的照顾，而且受到良好的教育，那末，这个国家就用不着对它的未来感到担心。

这话讲得极是。一个国家要对孩子们进行良好的教育，我以为，对我们国家说来，其中无疑就应该包括对孩子们进行毛泽东：这面旗帜的教育。

为什么？现实的回答是：

因为，毛泽东的名字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个人的范围，

因为，毛泽东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

因为，毛泽东的旗帜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未来，

因为，毛泽东的思想中也极丰富的蕴涵着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希望与理想；

而且，也更因为，现实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毛泽东。

共产主义“幽灵”自从在欧洲地平线上出现那天起，就遭到反动势力的咒骂和围剿。他们使用极其残暴的手段，一次又一次地想把它扼杀掉。但是，却一直没有奏效。今天，人们透过种种的云雾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改变战略，采取了新的部署。这就是，他们以其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又掀起了一股新的反共浪潮。一方面，在生活方式上对我们进行腐蚀、渗透；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从理论上向我们发动进攻。他们企图通过“没有硝烟”的战争，来实现过去他们利用军事手段未能达到的目的。

其中，从诋毁共产主义学说和其创始人、领袖人物入手，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一概加以歪曲和否定，可以说是目前西方国家反动势力向社会主义国家进攻的一个新的、更为突出的特点。他们攻击共产主义学说是，“一个犹太血统的德国移民知识分子在大英博物馆公共阅览室中苦思冥想出来的”产物，是一种把彻头彻尾的理性强加于社会生活的“大简化理论”。说这种学说，是纯理性的，过时的。据报道，列宁和列宁主义理论，在苏联——列宁主义的故乡，也遭到了一些人的低毁和反对。在国际上种种大气候条件下，我国国内的小气候不是也开始兴风作浪起来吗？这就是国内反动派的嚣张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趁机泛滥。他们百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诋毁和否定毛泽东。

由此可见，在当前国内外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回归人间有着多么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周恩来总理曾下过这样的断语：“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终将在继续地证明这一点。

看来，毛泽东思想还是个根本——这就是结论。

不仅仅是怀念

这里，我想引用一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先生的话，因为他的话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历史，述说了一个历史的真理。他说：

“这时，毛泽东开始向我谈到他的一些个人历史，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边写着他的个人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是他的个人历史，也是共产主义——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而不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外国领来的孤儿——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纪录。”

这是一个外国人一把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同中国革命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从整体上、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地位，进而又将这一观点宣传公布于世界。这还是第一次。

中国几十年革命斗争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由于毛泽东的伟大思想和光辉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早已证明斯诺先生的观点和推断是多么的英明与正确。

事实的确如此。毛泽东的伟大思想和光辉实践，不仅集中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去，而且也集中展示了中国四化建设的未来，同时具有世界意义。这个道理，如今也越来越多的被青年人接受。说到这儿，使我想起，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杜寒风同学，在《大学生》杂志编辑部召开的大学生“寻找毛泽东热”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所讲的一段话。他说：

“我们不应仅仅以毛泽东的‘个人历史’为参照，而应当把它放入一个大文化范畴，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看待，它的涵盖面也应当更广阔。用现代意识评价毛泽东，评价它的历史地位，乃至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人物，仍将是一个充满魅力的题目。”

“中国现代化的构建，与从毛泽东等领袖那里吸取教益无疑是相联系的。”

“忽视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忽视对毛泽东的研究，我们就有可能重蹈历史的覆辙，重演历史的悲剧，重犯毛泽东式的错误。”

现在，毛泽东回归人间，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这却是人们经过一段艰辛的路程，通过一番正反两个方面的对比，尝到一些苦味，并且经过痛苦的反思之后，出现的一种喜人的现象。这是必然的历史趋向。

不过，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造成的恶果千万不可忘记，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害不能忽视。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虽然跑到国外，走马台湾，但他们在国内、在大陆的影响还是有的。对抗四项基本原则，抵制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搞垮社会主义，否定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基本纲领，他们是不会放弃的。

在有一种人身上，你可以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他们在外人面前就怕提起毛泽东，似乎一提毛泽东就跌了自己的分量，低人一头，似乎一提毛泽东就是保守、就是落后，就大杀民族的什么风景。他们最大的兴趣就是往西方、往外国人的行列里“挤”，好像外国的什么东西都比中国的好。他们迷恋的是西方的模式，西方的文化，西方的传统。对这种人来说，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是看不上眼的。为此，我们应该向这种人大喊几声：

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不要灭掉自己的威风。

你在外国人面前应该有勇气这样说：

你信你的“上帝”，我信我的“毛泽东”！

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列宁在批判机会主义不能了解“昨天”和“明天”的联系的时候说：“马克思主义要求明确地认识到这个联系，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马克思这里讲的“条件”‘即承继下来的那个“条件”，就是国情，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列宁讲的“昨天”和“明天”，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革命的“昨天”和革命的“明天”，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是贯通我们的“昨天”和“明天”的一座桥梁、一条红线。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曾经是搏击苍穹的雄鹰，他们的名字离开自己的故乡，飞向了世界，他们都成为世界的“公民”。毛泽东——回归大地的毛泽东，不仅影响着神州大地上发生的一切，同时也飞向了世界，影响了世界。但愿他的思想的根基深深扎在他们故乡的土地上。他的精神将永远是人们奋进的动力，他的伟大形象将永远铭刻在他的故乡人们心中。真正做到如邓小平同志所说：

“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毛泽东回归人间，并不是一个迷信的推断，更不会给人们的思想染上什么神秘的色彩。它是“对当前一种社会现象的概括”，是一句形象化的语言，当然不能用哲学的逻辑思维去要求它。我想，这也不会读者中引起什么不必要的误解。难道，什么人还能把“毛泽东回归人间”理解为毛泽东的灵魂回归人间吗？我想，提到“毛泽东回归人间”，人们会很自然的理解为毛泽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伟大形象、崇高威望和高尚的精神风貌等又“回归人间”。它是针对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大肆泛滥，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形象、威望及历史地位，遭到无端地低毁、丑化和否定而言的。我深信，这种概括，既是形象的，也是科学的，是符合现在社会生活实际的，也是易于人们理解接受的。

同时，还应该看到这样一种社会现实，那就是说，随着“毛泽东热”的不断升温，随着《毛泽东选集》1—4卷的再版，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深入发展，人们对毛泽东的怀念与向往之情，逐渐转向了对毛泽东的学习与学术上的研究，即不仅是怀念与崇敬，而是从本质上，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上，去认识与探讨毛泽东一生中那些宝贵的、规律性的东西。

目前，全国范围出现的学习与研究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是近年来空前的，健康的。有的人将这种状况概括为“毛泽东学”正在中国兴起，说中国主要的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等分别设立了毛泽东传记、毛泽东思想、“毛选”4卷注释、国外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专题研究部门；全国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会等全国性的学术团体纷纷成

立。地方性为研究机构、团体大量涌现，其中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东北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等——构成了覆盖全国的毛泽东研究群落，并进入了一个富有成果的新阶段。

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学习、研究和运用为例：前不久，在合肥市召开全军学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提交学术论文 400 余篇。这些论文的作者，不仅来自军事理论研究战线，而且还有许多是高层领导岗位上的带兵人，其中将军就有 90 余名。许多事实告诉我们，毛泽东军事思想以极其完整严密的体系和博大精深的内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不仅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人民军队建设和作战的指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事理论战线在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顶住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将学习、研究和应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同志在“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同志对我们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越功勋，要求全党一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在最近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号召我们向列宁、毛泽东同志学习，也要向邓小平同志学习。

“邓小平同志是以毛泽东为核心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我军的主要领导和创始人之一。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和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了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活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沿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轨道稳步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同时，从新时期我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实现国防现代化，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提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理论。”

“他最早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纠正“左”和右的错误观点，给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以公正的评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邓小平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同志的军事理论，结合起来学习与研究，当然是目前全军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习研究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现在，在学术上展示出来的这种火热现象，不是也足以证明毛泽东回归人间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选集》1—4 卷再版发行以后，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掀起了学习的热潮，在西安政治学院笔者得知，这个学院的领导同志，根据院党委关于在全院教职职工中深入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决定，于 1991 年 4 月和 9 月，曾两次对全院人员进行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思想动员。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以及教员，都带头学习，在全院逐渐形成了热潮。科社教研室讲师李保忠，12 年如一日，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

时，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目前，他基本上通读了《马恩全集》1—50卷，《列宁全集》1—12卷，《斯大林选集》上下册，《毛泽东选集》1—5卷，还学习了《邓小平文选》，作了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几年来，他参加了12部教材专著的编写、著述工作，发表了50余篇文章。其中有不少作品获奖。当前，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他更加刻苦地学习，并常常利用业余时间对学员进行学习辅导。结合当前的国内外形势，解答阐述学习中，大家存在的种种疑难问题。在学员中展现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那是多年来少见的，学员九队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做新生入学的第一课。一队经常利用晚上时间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交流活动，推动学习。六队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采取带着问题学，学出了成效，推动了全队的学习。七队把学习毛主席著作与当前国际形势紧密结合起来，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提高了认识问题的水平。学院领导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当成学员学习的重要内容，有计划，有安排，对毛主席著作的重点文章，逐篇讲解，逐篇学习，逐篇辅导。学员们的学习情绪迅速提高。他们认真听讲、虚心请教，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交流学习心得，耐心听从辅导。一级战斗英雄马玉章，文化基础差，领会慢，他就挤时间学习，从而使自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共和国卫士”王强（学员），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做吸取精神食粮、武装头脑的重要途径。他刻苦学习，写了不少学习笔记和体会文章。学员王德坤自入学以来，坚持自学，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4卷，写了16万字的读书笔记。许多人原来对一些问题认识不清，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心里一下子亮堂了，说：“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对！还是要用毛泽东这把钥匙开现实问题这把锁，看来别的办法是不灵的。”这就是现实做出的回答。

原来，人们有个误解，或者说有过迷惑：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人们为了永远追念他，在他死后，破格保留下他的遗体，并为他修造了纪念堂，供人们瞻仰，让人们永远记住他的业绩，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却不见人们去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消息报道。于是，我暗自揣想，难道人们将这位伟人遗忘？为什么来华访问的国际友人，只到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而不到近在咫尺的毛主席纪念堂看上一眼？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力可真够厉害的，不但冲击了中国人的感情，还影响了国际友人的心绪。

事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曾任《毛主席纪念堂》宣传接待处处长黄大香同志为我解开了这个迷。他告诉我，中国人民和国际友人，对毛泽东主席的深厚感情，始终未变，许多事实证明，这种感情是长久的，永恒的，并随着当前国际形势风云的变幻，这种感情愈来愈牢固，因为人们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他的英明和伟大。黄大香同志向我介绍的，是这样一些感人的事实。

《毛主席纪念堂》，自1977年建成以后，每天成千上万的人来这里瞻仰毛主席遗容。但由于是凭票入堂，远远不能满足外地人们的要求。有些从祖国的山南海北很远的地方来到北京，唯一的一大心愿就是能够看上一眼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遗容。可是，就因为弄不到一张入场票，而不能如愿以偿。他们有的说，毛主席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亲眼看到，毛主席过世了，他的遗体安放在纪念堂，我们专程来瞻仰，还是看不到……。

有关部门根据广大群众的热切要求，改进瞻仰办法，由凭票入堂，改为凭工作证、身份证入堂。这样做的结果，就大大扩大了前来瞻仰的人数。从

1977年开放以来至1991年9月9日 瞻仰的总人数累计达7千万人,仅1988年即达到近900万人,而在毛主席95诞辰这一天,半天时间,就有15000人来瞻仰毛主席遗容,到1990年和1991年的两年中,每当高峰期,每天瞻仰的人数竟达3万至4万人之多。

在这一队接一队的人流中,有的是曾经跟随毛主席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有的是国家干部,有的是青年学生,有的是解放军战士,也有新婚夫妇,还有几岁的娃娃。他们来自祖国东北部的长白山,来自西北部的黄土地,来自西南部的青藏高原,来自南海之滨,有的来自海峡彼岸的台湾岛——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代表着祖国56个民族,他们带来的是一件共同的礼物和一个共同的心愿——对毛泽东主席的敬仰与怀念。

毛主席逝世15周年纪念日这天人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动人的场景——晨曦初露,毛主席纪念堂正门前的广场上,就已经聚集起数百人的队伍。其中许多人是平生第一次来北京,进京的第一件事就是了却“看看毛主席的多年心愿”。

8时整,瞻仰活动开始时,群众已经排成了一眼望不尽头尾的长龙。

瞻仰的人流,迈着轻轻的步履,缓缓地踏上早已磨得溜光、且明显凹陷的34级花岗石台阶,徐徐进入纪念堂大厅。大厅中央安放着毛主席的遗体。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水晶棺周围摆放着18盆鲜花盛开的君子兰,还有两名戎装威严的哨兵守护。人们从毛主席遗体旁通过,不时地转向毛主席的遗体,默默地鞠躬。

从安徽灾区来的一位姓汪的老汉,见到安睡的毛主席,情不自禁地哭泣起来。老人一边向毛主席鞠躬,一边用手擦着眼泪。他从心底告诉毛主席,在大灾之年,咱百姓能过安稳日子,度过灾荒,全托共产党的福。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一队藏族少年。这支队伍一共有91名藏族孩子,是从西藏日喀则地区赶往山东济南西藏中学上学的。这帮孩子大都是翻身农奴的后代,心里都明白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他们一到北京,就嚷嚷要看毛主席。这则“来到毛主席遗体旁,孩子们都一个个深深地鞠躬,“一双双充满稚气的眼睛流露着”十分专注的神情。

9时刚过,当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李银桥、韩桂馨、徐涛、李连成、张木奇等同志及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先后来到纪念堂。他们在北大厅毛主席塑像前献上花圈、鲜花、静默、鞠躬、留影。

许多人怀着诚挚的心情,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自己对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怀念,表达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决心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12月26日——毛主席98岁诞辰这一天,9时许,毛岸青、邵华、毛新宇一家,随着瞻仰的人流来到《毛主席纪念堂》。他们一家人在毛主席坐像前献上花圈、行过三鞠躬礼之后,缓步来到毛主席遗体前,向毛主席遗体默哀良久,以寄托自己的哀思。然后,他们一家被邀请到休息室,许多人围上来向他们问寒问暖,请他们签名留念,或一起照像留作纪念。如此等等,证明一个问题——对毛泽东主席的敬仰与怀念。

从湖南来的一位青年作家,这天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过毛主席遗容,心中久久不得平静。当即写了一首诗,题为《四弦琴——写于毛主席纪念堂前》:凝聚着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

从祖国的心脏流过
从亿万人民的神往中流过
从时代的中流砥柱流过
冠之以“英雄”称号的
从“英雄”宝座上剥落
一位伟人此同停止了伟大思想
但他仍在他们的身后活着
他的思想被江河延伸着
他的思想被历史延伸着
丰碑一座灼热起四路纵队
仍在绵延着他的无尽思索
四根琴弦在四根擎天柱上接合
历史的主旋律在琴弦上红火
我们的精神长城凭此烽火台筑成
四弦琴演奏着中国，中国
这位青年作家的名字叫章庭杰。

1992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离开我们16周年的这一天，一大早我们毛泽东丛书办的几位同志，还有毛主席的机要秘书高智，就陪同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来到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毛新宇和我们几个是代表他在外地的爸爸毛岸青、妈妈邵华来为毛主席敬献花篮的。不一会，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女婿王景清和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李银桥、韩桂馨夫妇，吴旭君、徐涛夫妇，卫士李连城、尹全山、田云玉、张木奇、曾文，还有侯波、曹全夫、李越然、李宝贵，楚辞专家文怀沙尧先生也来了。在李讷、王景清手持花圈的后面，是一排长路一眼望不到头的人群纵队，我看他们大多数是中青年人，有的还抱着或领着几岁的孩子，手持花束，都是来为毛主席献花，都是瞻仰毛主席遗容的。

当李讷、王景清、毛新宇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向毛主席的坐像敬献过花篮、瞻仰过毛主席遗容后，认识的，不认识的，都高兴的争着同毛主席的亲人们合影留念，表现出对毛主席无限怀念和敬仰之情。

多年来，毛主席纪念堂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党的历史和进行传统教育的课堂，学习老一辈革命家伟大思想和高尚品德的庄严场所。党中央、国务院对毛主席纪念堂非常关怀，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到毛主席纪念堂参加纪念活动，检查指导工作。他们嘱咐这里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把毛主席的遗体保护好。

中国人民深深怀念毛主席，世界人民同样怀念毛主席。

巴基斯坦军事代表团每次到中国访问，都要瞻仰毛主席遗容。他们说，1960年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支持了我们，毛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的朋友，也是世界人民最真挚的朋友，我们要永远地记住他、怀念他。不论天下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每次来中国访问，都要到《毛主席纪念堂》来瞻仰他老人家的遗容。这是一项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活动议程，如果缺少了这一项，那就说明我们的访问是不圆满的。

最为令人感动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卢森堡人民的优秀代表、卢中友协主席阿道夫·弗朗克先生的事迹。

他已是97岁高龄的老人，先后57次来中国访问，曾三次受到毛泽东主

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逝世后，他每次来中国访问时，都不忘到《毛主席纪念馆》瞻仰毛主席遗容。

1989年，他来中国访问时，正遇上动乱和暴乱，一些人占据了天安门广场，堵塞了他到《毛主席纪念馆》的去路，他就把一朵小白花轻轻地放在纪念馆前的台阶上，无奈只好深情地望着纪念馆……以表达他对毛主席的敬意。

1990年，弗朗克老人又来中国访问。4月20日——花红柳绿，春日融融。他赶到《毛主席纪念馆》，向毛主席鞠躬施礼，为自己头年来中国，没有能够实现瞻仰毛主席遗容的心愿而痛哭流涕，泣不成声，昏厥过去。经过抢救，当这位老人苏醒过来时，他说：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世界人民的朋友，假如我能活到100岁，就是坐着轮椅来中国，也要看看毛主席！”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毛主席纪念馆》工作人员的辛苦，和专家学者们为保护毛主席遗体所作的努力，黄大香处长告诉我，为了维持好参观瞻仰队伍，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夏天冒酷暑，冬天迎寒风，在广场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没有人说过一句怨言。毛主席遗体保护非常好，非常科学。除吸取了以往医学研究中有关遗体保存的经验外，还吸收和借鉴了西汉古尸的保存方法和研究成果。因此，毛主席逝世10多年来，他的遗体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作这种努力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毛主席的遗体保存好，世世代代供人民瞻仰参观，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毛泽东这位“终生搏击苍穹的雄鹰”，在人们心中留下的，不仅仅是怀念，更重要的是还有一条防止和平演变的万里长城，一座任何反动势力都冲不垮的丰碑！

对于毛泽东同志无限的怀念与崇敬是必要的、可贵的。但更重要的是承继他未竟的事业，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进。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情况下，以他的思想、理论为锐利武器，防止与战胜国际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施行的和平演变战略。

历史是一面明镜。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强大。然而，国际反动势力先后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企图使用武力来消灭它，征服它。都未能得逞。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失败之后，使他们更加感到。使用武力的办法来阻滞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于是，便改变为使用和平演变的战略。企图在“没有硝烟”、“不流血”的战争中，将社会主义国家演变过去，纳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进入80年代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战略、策略及其作法，似乎更明确，更集中，也更加具体。他们强调，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和平竞赛，是为了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这是“不战而胜”。有人说得好，他们在和平演变问题上，不仅有总的企图、总的规划，而且早已采取了具体行动，对社会主义国家构成了严重威胁。

毛泽东无愧为伟大的战略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民族英雄。正如有的同志研究证明的，当杜勒斯刚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他就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抓住这个问题，首先是向党内的高级干部，而后又向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们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

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警惕性。”

作为党和国家第一代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对防止和平演变问题，可不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他发觉得最早，他想得最远，他看得最深，他讲得最多，他抓得也最狠。他把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正式提到日程上，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阐述的许多重要观点，现在看来，有些观点不但证明是对的，而且富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他为我们党、我们国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根基，他在这方面的功绩和贡献，同样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前几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有些人只看到他的失误，面对他在防止和平演变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却只字不提，甚至予以极端地诽谤与攻击。虽然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由于未能很好地坚持实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对自由化思潮制止、斗争不力，表现软弱退让，结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最后终于导致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这个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指出：“一时的后退现象，不能代替总的历史规律。”1942年1月6日，他在《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一文中又说：“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这些富有哲理的话，今天读起来倍感亲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正是高举着十月革命的旗帜，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今天，我们正在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走自己的路子，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障碍是很重的。弄不好，我们几十年流血奋斗换来的光辉成果就会废于一旦。“对此，我们一是不怕，二是要有准备”。在这些准备之中，一是思想准备，二是理论准备，然而最重要的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增强我们的国力。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为此，我们对毛泽东同志不仅是怀念与崇敬，而且更应该以他的思想理论为武器，去奋争，去战斗。在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高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旗帜，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沿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继续前进！

敢于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

人民日报社的刘甲同志，是我的一位老相识，又是我步入杂文界的一位领路人。这些年来，他在倡导和促进现代杂文的繁荣上做过不少工作。一次我打电话给他，别的事情讲完了，最后他说：“现在很需要宣扬一下杂文的战斗性，你能不能把今年创刊的《中流》杂志的杂文评述一下？”

这算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我原来也有这个打算。因为我想，在当前的杂文领域中，《中流》月刊的杂文专栏，的确是最近开辟的一块战斗的阵地，它的杂文也的确称得上是一支战斗的轻骑兵。很值得向读者介绍一番。于是，我以应雅命，便把这个任务愉快地接受了下来。

《中流》月刊的创办，原在1988年，也就是在我们的思想阵地，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大批大批侵入的情况下，开始酝酿的，其目的，正如《中流》发刊词中所讲：“当时，并未奢望仅仅通过一分小小刊物，就能从根本上打破、扭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恶性泛滥和垄断文艺、思想主要阵地的极不正常局面。而只是想通过它，为那些坚持马列主义信念的同志，提供一块能够自由发出声音的阵地。”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善良而又正确可行的愿望，却一时未能如愿以偿。直到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被平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从根本上打破那种不正常的局面以后，《中流》的开办，才有条件又一次提到日程上来。1990年1月，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

据《中流》编辑部的同志讲，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经过仅仅3年来的实践，这个刊物，竟能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和积极热情地支持。

我想，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它一开始，就高高地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真正体现文艺的“二为”和

“二百”方针，活跃思想，促进创作，提供了优异的条件。作为《中流》重点栏目之一的杂文专栏，作为文艺政论——投枪、匕首、手术刀的杂文，自然更加明显地体现出这个鲜明的个性。它既继承了鲁迅杂文的传统，又充分体现了现代杂文的风格。如果要为它画像的话，那末，就会看出，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毫不吞吞吐吐，具有深邃的思想性和顽强的战斗精神，特别是在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上，做出了大胆的尝试。

第一、敢于提出和回答现实思想和文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矛盾和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然而，他们不是回避矛盾，不是绕着问题走，而迎着潮头上，敢于硬碰硬。当你打开《中流》第1期时，在《坛外杂话》的标题下，你会读到迟挥写的两篇短文：第一篇是《自杀的颂歌为何而唱》。文中说，在一分“权威性，的文学理论刊物上，拜读了一篇题为《诗人之死》的奇文。这篇奇文中列举了“年仅二十五岁的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了。”于是奇文的作者们就借题发挥，说我们这个社会是“腐朽而黑暗的存在”，这种现实叫人“无法忍受”，更叫海子无法忍受，所队海子就以此作为“绝望的抗争”。奇文的目的，显然是借此攻击社会主义的现实。《自杀的颂歌为何而唱》的作者迟樨，对奇文作过分析概括之后说：“这就是奇文的主题。我们已经弄清楚自杀的颂歌。为什么而唱起来的了，善良的人们怎么会想到，这种‘奇文’竟会堂而皇之出现在社会主义的“权威”刊物上呢？”读罢全篇，你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货真价实的存

在的，而有那么一些相当数量的刊物，的的确确是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们，提供了向党进攻的阵地。迟文写得有理、有据、更有力，读后令人心服口服，耳目一新，迟文后一篮题目是《达赖与“诺贝尔情结”》。文中以生动的文字和有利的叙述，着重评出了近年来文学创作领域中出现的一种不健康的现象，那就是有些人总是和“龙的传人无缘”，两眼总是盯着诺贝尔奖金的那个“金”字，“心想一旦呼卢得中，就可以抱‘x万富翁’回来了。”文中说，能从正道获得诺贝尔奖，应该说是一种值得庆幸的好事。但如果仅仅为了金钱，这种人的“层次”未免太低了。进而说明，一个作家最高的奖赏应该是他的作品能得到人民的赞誉。迟文的目的还是为使我们的文艺能够保持“二为”的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从而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个愿望是多么的可敬！这个问题提得又是多么的尖锐。而适时啊！

迟文的发表，仅仅表明了《中流》杂文战斗性的开始。继而，

沿着“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这个“主旋律”，围绕抵制“精神污染”、反对“和平演变”、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党对文艺的领导等问题，进行了论争。连续发表了《刺耳未必是噪音》、《且慢走向世界》、《僵化和反僵化》、《论石头与箭》、《雷锋精神与现代意识》、《列宁的耳朵》、《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魔影”揭秘》、《“首先应文化出击”琐议》、《关于苍蝇》等等颇有战斗性的文章，对于种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从多侧面、多层次、多视角，进行了实事求是地分析批驳，作出了相应的、科学的反应。例如：韦骇《僵化和反僵化》一文中，谈到“精神污染”时说：“‘精神污染’的权威解释，见于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庄严郑重的大会，庄严郑重的决议，不过28天，便转向到清除清除者，罪名即‘僵化’。理由也让人纳闷，说是‘清除’用语不当，因为精神如何清除得了。于是污染者雀跃，反‘僵化’的斗士纷纷登上报刊，连本该堂皇的官家大报，也场鞭飞马，排了阵去清除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精神。这结果之一，是诸出成堆敲骨吸髓的好手和杀人越货、吸毒贩毒、嫖妓宿娼的豪杰……”（《中流》1990年第3

期）可以说，在过去思想阵地被非无产阶级的种种思潮侵入的情况下，这些好文章是根本无法同读者见面的。就是现在能这样做也

是相当可贵的。

第二、敢于抓住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指名道姓地进行批判。

《中流》杂文的战斗性，不仅表现在善于抓住目前文化艺术、思想领域中，人们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大作文章，而且还抓住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严家其、吾尔开希、苏晓康、陈一谔、万润南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头面人物，进行分析批判，彻底揭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及丑恶的嘴脸。他们认为批判这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是当前杂文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关键一环。如巍巍所写《大老爷与“小学生”》，批判刘宾雁就是其中较好的一篇。文中说：

刘宾雁跑到台湾去了，“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许多共产党的叛徒早就是刘宾雁的先驱……至于最后的下场如何，那就很难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都是承认的，

就是敌人也无法否认。而刘宾雁对于党和人民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却没有任何热情，换不来他一声赞美。在他眼睛里，总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人民的事业简直是一片黑暗，一团漆黑。而对真正的黑暗势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却没有看见他有过什么指责。这是很叫人纳闷儿的。……可是他巧辩说，这是‘第二种忠诚’。他特意写过一篇作品，题目就叫《第二种忠诚》，意思是像雷锋那样的人，可谓第一种忠诚，而这种忠诚不过是愚忠愚孝，一种工具罢了。而像他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诚——‘第二种忠诚’。”刘宾雁“在主子面前表示要反共到底。‘他决定写成各种小册子，用各种伪装，寄给大陆民众。’可是我到觉得他应该更多地想一想叛徒的下场，实在说还没有见过哪个叛徒有好的结局。”（《中流》1990年第3期）

诚然，“《中流》是为对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提议创办的‘它本身就是同这股思潮斗争的产儿’，但它战斗的根本目的，也还不仅仅在抨击一下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因为那些所谓“精英”们，毕竟是不屑一顾的了。《中流》杂文战斗的根本目的，还在于使人们进一步地充分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大意义，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保证社会主义的社稷江山永不变色。同时，还在于为人们提供一个自由发表意见的阵地。它所以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就是因为它有这种鲜明的个性。这种状况在以前的几年间是不可能有的。就是现在，也不是所有杂文阵地都有这种无私无畏勇于讲话的局面。

第三、敢于向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歪风邪气进行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批判“左”的错误、反对个人崇拜的同时，特别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大肆泛滥的日子里，有些人对毛泽东持了一种全面否定的态度，一时似乎形成了一股潮流。经过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对否定毛泽东的那股逆流虽然有所抑制，但那种不正常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流》杂文义无反顾，毅然举起捍卫“毛泽东”这面神圣旗帜的大旗，发表了不少颇受读者欢迎的好文章（有些文章没有放在杂文栏目下，实际上也是很有分量的杂文）。刘绍棠的《刺耳未必是噪音》就是强有力的一篇。例如文中说：“把思想解放片面理解为‘突破禁区’，比大胆儿，导致了胆大妄为，否定一切。在文学领域，否定毛泽东，否定鲁迅，否定民族文化，否定革命传统，……竟成为获取名利的捷径。其实，欺师灭祖的人，同时又另择庙门，另立租坟。否定中国一切的同时，便是盲目肯定现代西方的一切。否定鲁迅的同时，便是为周作人涂脂抹粉，对周作人顶礼膜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为了什么，难道不该深长思之吗？”（《中流》1990年第3期）

从1985年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领域便泛滥成灾，或者叫作文艺领域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重灾区。它的突出表现是否定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重点是否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观点，关键是文学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邓小平语）而有些人则认为《讲话》过时了，《讲话》是把“刀子”，是“紧箍咒”。其实质是否定毛泽东、是按照什么样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的问题。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中流》杂文的旗帜那是相当鲜明的。我看他们的态度就是十个字：维护“毛泽东”，反对“自由化”。他们除了通过发表杂文的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外，还集中在两期突出地发表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8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其中有

李琦的《不要忘记》，杨柄的《〈讲话〉首先是整风文献》，沈大力的《向世界奉上我一瓣心香》，李雾野的《学习〈讲话〉的粗浅体会》，公木的《坚持运用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王汶石的《重新学习的紧迫性》，周良沛的《一个“非知识分子”的感受》，韩映山的《重提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等等。这些作家、艺术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或具体感受，分析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和坚持毛泽东为什么人的文艺思想的极端重要性。他们的呼声是：事实在教育我们，要想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绝不能甩开《讲话》，绝不能否定毛泽东，这些广义上的杂文，在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上，都为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然，《中流》杂文在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上，也还不仅限于在文艺领域方面，而是有着更广阔一些的思想范围。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为了对现实生活中那种全面否定毛泽东的不正常状况表示一点意见，为了对攻击、甚至是辱骂毛泽东的那种歪风邪气表示一点愤慨，我以“读一点‘毛泽东’”为题写了一篇思想随笔（实际上就是杂文），讲了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问题。1989年12月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一些读者共鸣，说文中讲出了他们也想讲的话。不少同志敦促我再写些这样的东西，我自己也觉得有些话还需要讲，于是我又接着写了二谈、三谈、四谈、五谈“读一点‘毛泽东’”。文章针对当前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学习马列原著、毛泽东著作的必要等不良倾向，着重阐述了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同时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不正确的做法和看法。《中流》杂志打破常规，连续刊登，得到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广大读者的好评。对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认识和评价，对于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肯定，以及对毛泽东著作的态度等问题，在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之后，虽然有了好转，但是在这些十分严肃的问题上，在有些人的思想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就是在根本立场上和态度上还没有彻底改变。他们的状态还是，一讲起“毛泽东”就嘴软，一举“毛泽东”这面旗帜就腿软，好似得了一种什么“软骨病”。而《中流》却不然。他们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讲心里话。他们在涉及党、国家和人民事业的原则问题上，从不手软。没有一点魄力和胆识，这是万万做不到的。真可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啊！当前，面临国内外十分复杂的斗争形势，我看是非常需要这种精神，也是非常需要运用杂文这种斗争武器进行战斗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流》1991年第3期刊发的应从瑛的杂文《“伤疤”未好莫“忘痛”——读〈论毛泽东现象〉有感》。这是一篇敢于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的好文章。文中这样说：

“去年5月，我到首都开会，呼吸到一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强劲而清新的空气，心情十分鼓舞。兴奋之际，一位友人送来一本安徽省文联主办的《百家》杂志，……原来是1989年第3期的续刊，……略加翻读，便感怵目惊心；细细再看，简直令我目瞪口呆；其反动谬论之多、之烈、之刻薄，可叹为‘观止’！”在这本杂志上，有一个号称‘全国知名的青年评论家’，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3万来字的文章：〈论毛泽东现象〉。这是一篇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毛泽东同志一生业绩还兼及人身攻击的‘恶文’。这个‘全国知名的青年评论家’一忽儿把毛泽东同志比作秦始皇，发表了一通胡言乱语，说：‘如果秦始皇可以说是这种封建文化的历史开端的话，那么毛泽东则是它的历史终结。这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圆圈，毛泽东的极

端的方式完成了历史的极端。’一忽儿又把毛泽东同志比做全世界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胡说“毛泽东现象之于中国历史的意义就好比希特勒现象之于世界历史的意义一样。”这个‘评论家’经过了一番荒唐的演绎推理之后，便断言：毛泽东害了‘精神上的分裂症’。到了晚年，‘实际上已经精神失常了’。作为这断言的一个论据是：毛泽东曾用‘诱敌深入’的手段‘全歼中国的知识分子。’……文章还由攻击毛泽东转向攻击党、攻击人民和社会主义，诅咒‘毛泽东现象并没有结束，它正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身上悄悄地延续；’并诽谤全中国人民都患了‘群体痴呆症’。读了上述极端恶毒污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和中国人民的言论，每一个有正常判断力的中国公民能无动于衷吗？！

“但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些穷凶极恶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污蔑中国人民的谰言，到今年第1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上，才理直气壮地发表了一组针锋相对的批评文章……这组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把《论毛泽东现象》一文中的荒谬诬蔑的论调，作了相当深刻的批驳。我一口气读下来，感到极大的痛快。”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杂文姓“杂”，也姓“政”，杂文是文艺政论，一半属于文艺，一半属于政论。政治是杂文的灵魂，战斗是杂文的生命。杂文历来是为政治服务的。杂文如果放弃战斗、离开了为政治服务，就失去了杂文的价值，也就没有了杂文的地位，当然也就没有杂文存在的必要性。鲁迅的杂文就“政治讲得最多”。在杂文与政治的关系上，可以说鲁迅早已为我们做出了好样子，也可以说是鲁迅杂文的传统。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的杂文怎么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还曾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鲁迅的杂文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战斗性说的。我看，就当前国内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现状和一切反动势力的猖狂劲头来说，鲁迅杂文的这种传统，还是需要加以发扬的。这倒不是哪个人对此有什么偏好，而是客观现实提出的要求。现在，有人谈论什么“淡化政治”的高调，大肆攻击革命文艺与革命政治的关系，特别是百般否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似乎是在探寻超然物外的什么东西。其实，这些人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便是如李希凡同志所说“挂羊头卖狗肉”，有意在搅乱视听，混水摸鱼。自从人类进入有阶级、阶级斗争的社会以来，何时何地曾有过政治“淡化”的情形出现？没有，从来没有。别的不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杂文这块小小的阵地向党进攻、丑化社会主义制度，难道是什么政治“淡化”吗？而恰恰是在“强化”。我看《中流》在这一点上是坚定的、清醒的。它就不信邪，不怕鬼，不管那一套。在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前提下。该斗还是斗，该讲还是讲。在新起的、尚存的阶级斗争面前，没有僵旗息鼓，走向另一个极端，硬是为敢于讲话的人们开辟了一块战斗的阵地。难怪唯恐大陆不乱的香港《九十年代》称《中流》是大陆最凶恶的一家杂志。这说明《中流》是做对了。

谈到《中流》杂文的战斗性，不能不谈到直接为它的战斗性服务的艺术性。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仍然没有忘记毛泽东同志的另一句话：“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

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这就是说，《中流》的杂文，不仅能透过现象揭示问题的本质，言之有物，论之有理有据，具有无可争辩的逻辑力和政治的说服力，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注意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艺术魅力。它不仅能以理服人而且还能以情感人，以形动人，无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以为，它的艺术特点主要是：

——通过现实生活、文学作品、历史典故或联想、类比的典型形象说明问题，寓理于形象之中。杂文作家李庚辰同志曾说：“形象性是杂文的本质性的特征之一。所以，优秀的杂文作者总是着意于形象的描绘：努力使用种种形象化的手段，刻画出鲜明生动的杂文形象来。”《中流》的杂文，所以生动感人、有充分的说服力，就在于能够比较好的使用了这种艺术手法。如：《关于苍蝇》（1990年第8期）、《大老爷与“小学生”》（1990年第3期）、《且慢走向世界，1990年第2期）、《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1990年第6期）等均采用了这种手法。其中，特别是抓住刘宾雁、方励之、严家其等活生生的典型形象，说明问题，淋漓尽致，更增加了文章的力度。

——使用比喻、比拟、讽喻等各种修辞手法，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如《神学、鬼学、人学和狗学》（《中流》1990年第7期）就是比较好的一篇。文中在谈及当前文学创作中的问题时说：“某些文学作品的的确确变成了狗学了。”“文学不能连狗学都不如！”又如《杂文家的“自由”与不“自由”》中说：“用‘自由’的手巾遮着别人的眼睛变戏法，当然不仅仅办杂志，写杂文。而让这种戏法毫无束缚地变下去，变戏法的人是自由了，但大多数人怕是要圆到余新江说的那个时代去的。不要说是没有发表文章的自由，连晒太阳的自由也没有。”（《中流》1990年第7期）比喻、比拟、讽喻，本是修辞学上的一种词格，是一种普通常见的修辞方法。但一经《中流》杂文的作者们在这里采用，就大大增加了其杂文的艺术特色，其妙无穷。

——夹叙夹议，借题发挥、“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如《行贿法搜奇》中说：“行贿手法千变万变，无非是把赤裸裸的全钱交易变化一个新包装而已。而这一换，力量却不能低估。”（《中流》1990年第7期）又如《大老爷与“小学生”》中写到刘宾雁：“刘宾雁像其他叛徒一样，在主子面前表示要反共到底，‘他决定写成小册子，用各种伪装，寄给大陆民众。’可是我倒觉得他应该更多地想一想叛徒的下场，实在说还没有见过哪个叛徒有好的结局。”（《中流》1990年第3期）再如《速朽二题》中的《速朽也罢》篇说：“文坛的老帅哟，挥动如椽的大笔吧；文坛的新兵哟，紧握三寸的笔管吧；除了写正宗的文学作品外，也来写点宣传品嘛！”（《中流》1990年第8期）杂文是一种文艺政论，以论为主，但也离不开叙述。它往往是通过夹议夹叙的方法来表现主题，直面人生。今天，《中流》的杂文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百且是“任意而论，无所顾忌”，在无形之中就形成了它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人读后赏心悦目，回味无穷，赞叹不已。

《中流》杂文的艺术风格，除了上面谈到的几种以外，当然还有其他，如形式多样，新鲜活泼，有长有短，长短适度，等等，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

然而，当我们谈到《中流》杂文的战斗性和艺术风味，又不能不谈到它的严肃性。这可以说是《中流》杂文的又一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它除了注

意突出杂文的战斗性和必要的艺术性以外，还注意把握杂文思想和文化的高品位。具体表现：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办刊的宗旨，那就是为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一个发言的阵地，以活跃思想，促进创作，真正体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他们时时、事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而得到读者的高度信赖。正确区分与对待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国内外反动派、对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抗四项基本原则的头面人物，不留情面，进行坚决地批判和斗争；而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党内的不正之风，对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人和事，则采取了与人为善，祛邪扶正，治病救人的方式。不论对待何种性质的问题，行文立论，都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理服人，从不哗众取宠，或以势压人。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同样坚持的是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理服人，从不断章取义，不歪曲原意，更不乱扣帽子。言厉而不损人，语重而不伤人。对于任何低级、下流的，不尊重对方人格的作法，他们是坚决反对的，其目的可以看得出，这不仅是为了维护杂文事业的纯洁、也是为了整个文艺事业的繁荣。语言朴实，文字生动，从不单为在形式上追求那种所谓的杂文“味”，更不照搬鲁迅时代的曲笔、隐喻。而是在发扬鲁迅战斗传统、革命精神的大前提下，注重文章的说理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使人感到亲切可信，阅而不烦，没有矫揉造作之感。总之，它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风格上，都表现出了自己的鲜明的个性魅力，为步出当代杂文的象牙之塔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历史进入则年代以来，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阳光的照耀下，在各个报刊上出现了不少好的杂文阵地，涌现出不少好的杂文劲旅。《中流》杂文专栏的开辟问世，就是倍受读者欢迎的最强劲的一支。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有一支思想、作风都过得硬的杂文队伍，而且有一个思想、作风都过得硬的编辑部。列宁曾说过这样的话：“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毛泽东则说：“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这就是说，他们也还不仅有一个忠于党的事业、联系群众的“司令部”，而且更重要的是在

这个“司令部”中，有忠于党的事业、密切联系群众的“司令官”。

据说，他们的主编林默涵、魏巍，不仅经常亲自过问关注杂文专栏的事，亲自审稿，还亲自写杂文，主持编辑部业务工作的三位

副主编徐非光、麦辛、朱洪及三位特邀编委江波、陈志昂、潘仁山等，都对杂文付出了相当的精力。因此可想而知，《中流》的杂文

所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一方面有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形势，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的主观努力，这也是不可缺少的，值得学习的。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无产阶级文艺繁花似锦，但任重而道远。当前，在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共产主义运动中右倾势力紧密配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情况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创作的任务也还十分繁重。人们期望《中流》能更好地发挥中流击水的作用，有更多更好的文章、作品，包括更多更好的杂文作品，出现于读者面前。我深信，

这个愿望是不会落空的。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折腾来，折腾去，还不是那么几个人，几条枪。其实不然。他们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他们得到的是中国大多数人的支持。

1993年2月24日，笔者参加了《中流》杂志创刊3周年座谈会。在会上，笔者亲眼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感人情景：参加座谈会的200多人，争相发言，一个接着一个。他们中间有全国知名的学者、专家、诗人、作家，也有大学年轻的研究生，有86岁高龄的老人，也有20几岁的青年人。他们围绕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上，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坚持！

江泽民心目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是一把锋利的刀子，这把刀子我们决不能丢！

——江泽民

我记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的日子里，在赈灾义演的活动中，首都和各地的文艺舞台上，一次又一次唱起“毛主席最亲”、“毛主席恩情比海深”、“想念毛主席”等怀念与歌颂毛泽东主席的歌曲。每当至此，台上唱，台下合，台上台下，情感交融，汇成一片，将群众的情绪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映照现实；生活中。毛泽东回归人间”的那么一种多年少有的动人景象。

这一切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毛泽东热”在继续升温。它的基本特点是：从人们四处寻找、呼唤毛泽东，到越来越多的；人更加热切地怀念、宣传、歌唱、学习毛泽东。

目前，“人心顺，精神振”的那么一种政治气氛，如热浪，似惊雷，正在中华大地上升腾、滚动。

我私下这样想，这无疑与江泽民总书记走上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榜样，矢志不渝地带头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心中时刻装着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形象，继续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拓的路线前进，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

1989 年 9 月 29 日，江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先指出：

我们“深切怀念为缔造和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立下伟大功勋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已故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这年 12 月 29 日，江总书记在党建理论研究班上的讲话中，当谈到我们应当怎样把握住加强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明确什么样的要求的时候说：

“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坚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更加坚强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1990 年 5 月 3 日，江总书记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说：

“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展示出我国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当代知识分子要履行自己的历史职责，就必须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先进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把它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

1991 年 2 月 8 日，江总书记来到洛阳白马寺参观，见到一位才 24 岁、因不满腐败现象而出家的印中和尚说：

“有这么一句古诗：‘欲问天下兴废事，请君指看洛阳城’。洛阳是九朝古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缩影。纵观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存在着腐败和反腐败的斗争，并关系到其兴衰、存亡。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就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谆谆教导我们要警惕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总结历史经验，反腐败斗争搞不好，中国的社会就好不了。”

这年 3 月 11 日，江总书记在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省长陈邦柱的陪同下，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和毛主席纪念馆。

看到毛岸英写给表舅的倚，江总书记语重心长他说：

“毛主席对子女要求很严，对全党的干部子弟也是个很大教育。要宣传毛主席是怎么教育子女的。在这方面，我们后代人都要像毛主席那样，对于女严格要求。”

“我看了这封信后，感慨系之。我听洪学智同志讲过毛主席是怎么把毛岸英送到朝鲜前线，毛岸英是怎么牺牲的以后，十分感动。假如我们所有的干部对子弟都能像毛主席对待毛岸英一样，我们的党一定兴旺，我们的党一定为群众所拥护。”

他告诫人们，要把这些对青少年和全党进行教育，特别是干部子女，更要严格要求。

在参观中，对陈列的原物和有毛主席形象的照片，如毛主席用过的砚台、读过的《诗经》、《论语》，以及毛主席和一师同班同学、全校毕业同学的合影、新民学会 1919 年在长沙的合影等等，都不放过。

江总书记对毛主席写的诗词和书法兴致更浓，称道毛主席的书法很奔放。说他过去对毛主席的诗基本上都能背，并当即为大家背诵了《七律·到韶山》。当他背诵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时，嗓门特别高起来。熊清泉说：“这就是韶山人民的革命精神。一是奉献精神，二是奋斗精神。”江总书记十分赞同熊清泉的话，说：“是啊，我们就是要有这种精神。”并挥毫题写了“发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赠送给韶山管理局。

参观中，当江总书记看到杨开慧烈士写的文稿和遗像时，停留下来，端详着，沉思着。随后，吟诵了毛主席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来到纪念馆休息室，江总书记问身边的同志：“还记得毛主席写的《沁园春·雪》吗？”有的说记不全。江总书记高亢激昂地将这首词朗诵了一遍。

参观后，江总书记深情地说：

“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我们要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思想”。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党，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

同时他又强调，要讲邓小平同志对充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所做出的贡献，说：“小平同志对毛主席有一个非常好的评价，小平同志真了不起。”

第二天，江总书记在韶山亲自主持召开了农村社教和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座谈中，他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又集中谈了坚持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说：

“毛主席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很大贡献。如果中国革命不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就很难把国民党政府推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方针。”

“毛主席是我们的光辉典范。”

“《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都是了不起的光辉著作，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我始终认为是不朽的著作。”

“毛泽东思想是一把锋利的刀子，这把刀子我们决不能丢！”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丢！”他说：

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年9月16日至22日，江总书记到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等地参观时又反复指出：

毛主席、党中央当年在西柏坡描绘的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蓝图，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我们要永远铭记者一辈革命家创下的丰功伟绩，继续艰苦奋斗，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得更加强大、更加美好。

江总书记对毛泽东主席一生爱好读书十分赞赏。在一次讲话中，他举起右手，从右上方划向左下方，打着手势说：

毛主席一生读了很多书，我同他老人家相比，却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我们应该很好的向他老人家学习。读好书，用好书。

用于指导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我想，应该着重提到的是，江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这篇具有重大意义的讲话中，他说：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

是实践这种结合的光辉典范。他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他在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外交和党的建设方面所做的不朽贡献，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的正确思想，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丰富和发展，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对于正确评价我们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对于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中国各族人民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

这是江泽民同志继邓小平同志之后，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对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历史地位所做的充分肯定和公正地评价。邓小平同志曾经“对毛主席有一个非常好的评价，小平同志真了不起”，今天，我以为江泽民同志同样是了不起的。这是因为，他对毛主席的评价有其独到的特点，概括地说来就是：

一符合邓小平同志的教导。邓小平同志曾说，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江总书记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正是这样，他集中讲的是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符合历史”的，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本意。

二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翻身得解放，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得到过的幸福。人们从心底里敬佩、感谢毛泽东，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救星”、“恩人”。当然，人们心里也明白，毛泽东同志晚年好心办了些错事。然而那总是第二位的。从思想感情上讲，人们不愿把毛泽东同志那些第二位的東西，常挂在嘴上，人们总是愿意首先想到、看到、听到他的功绩和伟大。我看，江总书记正是这样做的，所以

他的讲话得到人们的同情、共鸣和共识。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样做对我们的事业更为有利。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因为它有利于统一人们的意志，可以有效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起到了鼓劲作用，其中充分肯定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大概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三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每一个历史或时代的伟大人物，当他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他的形象总是崇高、完整而美好的，他或是一个群体的代表，或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一般地说，后人没有谁在提到他们的时候，在论及他们的伟大功绩、贡献、成就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加上他们的失误、缺点或美中不足。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位伟大时代的伟大人物的评价，更应如此。除非必要，一般说来是不必采取加减法的。在纪念鲁迅先生诞辰 110 周年时，鲁迅之子周海婴答记者问时说的一段话，对我们或许有一点启示，他说：

鲁迅的思想，或说精神，从科学上讲，是一个“定理”，正如“光速”——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鲁迅是不是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要从整体上去评价，要靠历史去评价，而不能像算术一样，扣掉多少分，还剩多少分。鲁迅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但从总体上讲，鲁迅是不存在污点的。

江总书记“七一”讲话中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正是采取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即“总体评价法”，他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而对毛泽东同志的失误，即“第二位”的东西，却不加苛议。可谓高瞻远瞩，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气魄。他不愧为我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无愧为人们心目中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最理想的接班人、带头人。他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特别令人欣喜的是，在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尤其为我们做出了坚持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好样子。促使“毛泽东热”出现了前几年从未有过的新境界。我看，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我党成立 70 周年之际，再版发行《毛泽东选集》1—4 卷。大家积极订购，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读一点“毛泽东”的热潮。

前些年，由于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一些人以毛泽东同志晚年犯的错误当口实，掀起了一股丑化毛泽东伟大形象、贬损毛泽东科学著作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浊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大肆泛滥。这期间，毛泽东著作遭到的厄运是有目共睹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单位竟找不到一套完整的“毛选”，在一些人的案头上、书框里竟没有一套“毛选”的位置，有的人竟然将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丢进废纸堆。1989 年春夏之交，一场新中国建国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动乱、大暴乱给一些人敲响了警钟，如晴天霹雳，从梦中惊醒。人们无不深切地感到：生活中不能没有“毛泽东”，需要读一点“毛泽东”。然而想读却无书可读，“有一位学生为求购一套‘毛选’，跑遍许多书店却空手而归。”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借助新闻媒介，发出哪儿能买到“毛选”的呼吁，不得不翘首以待了。1990 年 5 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复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报告，决定将《毛泽东选集》1—4 卷修订后再次出版，以满足广大干部群众包括青年学生对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迫切需求。

1991 年 7 月 1 日，正值建党 70 周年之际，《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终于和人们见面了。此举大长了坚持毛泽东思想人们的志气，大灭了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人们的威风。人们称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做了一件大得人心，颇有益于人民事业的大好事。

在社会上，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引起的那种强烈反响，也是人们始料不及的。据报道：上海首批发行 4.7 万套。天津 5 天发行 4.3 万套。广州 3.2 万套。山东 130 万套，北京最大的书店王府井新华书店，在一楼大厅设立专柜。7 月 7 日上午 9 时整一开门，人流就拥向《毛泽东选集》专柜。自觉排队，井然有序，仅 1 个小时，书店进的第一批 4000 套书就全部售完。买走第一套的，是一对中年夫妇。他们告诉服务员，买书是自己学习，花的是上月的奖金。据观察，个人前来购买《毛泽东选集》的，多半是干部、青年学生和解放军指战员。买走这批《毛泽东选集》最后一套的，是中国医学研究室的一位老同志，名叫王新才。他藏有《毛泽东选集》各种版本。他多年来一直在潜心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他坚信，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真理终究是真理。

到 7 月 5 日止，全国各地《毛泽东选集》总订数已达 700 万套，1992 年，总发行量已达到千万套以上。居全国所有图书发行之冠。

人们认定，《毛泽东选集》1—4 卷，虽然是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但它阐明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许多思想、原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仍有根强的指导意义。毛泽东著作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国现代史、革命史，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教科书，她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她也是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党的优良作风教育、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以及民族气节教育的好教材。她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没有哪一个历史人物

·od 的著作能够与之相比的。为适应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为了推动在人民群众中再次掀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毛泽东选集》再版发行后，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了关于学习的通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种现象，在前些年是没有的。

——在舞台和影视屏幕上，人们通过塑造的毛泽东的艺术形象，从更多的层次、更多的视角和更多的方面，窥视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从而更进一步和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和不朽的历史功勋。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溘然长逝。亿万人民群众热切地盼望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形象，能再现于影视舞台。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和干扰，但由于以江泽

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积极提倡和有关方面的努力，终究使人们的愿望得到一次次的满足。从 1977 年起，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开始走上舞台和影视屏幕。于是，人们从《四渡赤水》中看到了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从《西安事变》中人们领略了毛泽东超人的智慧和胆识，从《开国大典》中，人们不仅看到想到了毛泽东的高大身躯，而且听到了他亲切而洪亮的声音。通过一个又一个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唤起老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回忆与怀念，唤起青年人对毛泽东同志的信赖与崇敬，通过一件又一件的政治事件和一幕又一幕的战争场景的再现，使人们闻到毛泽东时代的脚步声，使人们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叱咤风云的巨大魄力，从中“感受着历史前进的铁的法则。”

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支持下，为纪念党成立 70 周年，全国各地大量拍摄了像《大决战》、《开天辟地》、《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泽东的故事》等有关历史事件和领袖人物的大作。不仅使人们看到战争和政治

历史事件中的毛泽东，而且还使人们看到了生活中的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和他的儿子》，以毛泽东失子之痛为精神链条，将家事、国事、天下事熔为一体，使人们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精神世界，“近距离”地透视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灵魂深处。把毛泽东再现为一位普通人，使人更加感到亲切和生动。

真实、可信、历史地再现毛泽东的伟大形象，虽然是初步的（在某些作品中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中青年人来说，意义更大，使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毛泽东。不但是毛泽东本人受到人们爱戴与敬仰，而且扮演毛泽东的演员古月、王仁等人，也受到观众的尊敬和欢迎，由此也可看出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对损坏毛泽东伟大形象和诋毁毛泽东伟大历史功绩的言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毛泽东思想旗帜上，取得了前几年没有的、或者说少见的新成果。

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成灾，攻击毛泽东、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和中国人民的谬论比比皆是，时有可见。1989年《百家》第3期（安徽文联主办）发表的名为《论毛泽东现象》一文，便是让人怵目惊心的一篇奇谈怪论。“其反动语论之多、之烈、之刻薄，可叹为‘观止’！”经过1990年一年的时间，在全国报刊上，竟不见哪一家发表过一篇像样的《回敬》文章。到“毛泽东热”继续升温的1991年，情况却不大相同了。《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第1期，针锋相对地发表一组批评文章，对《论毛泽东现象》一文中的荒谬论断，进行了批驳，令人“感到极大的痛快”，《中流》杂志第3期，发表《“伤疤”未好莫“忘痛”——读〈论毛泽东现象〉有感》，也对该文进行了回击，并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批评。读后令人高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7月25日上海《文学报》发表栾保俊的长篇批判文章，题目为：《这是什么“科学”态度？》对那篇奇谈怪论的错误进行了重点批驳。生动有力，读后使人扬眉吐气。

《论毛泽东现象》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学习毛选的情景是足够壮观了，但真正理解毛泽东的又有几人？……主要的障碍与其说在于中国人的智商，不如说在于毛泽东本人有意无意地设置的语言迷雾。他的著作、他的言论乃至他的思想行为，构成一个无形的磁场，把无数个中国人吸附其中，致使任何置身于这磁场中的人都无法真正弄清磁心的秘密。人们不论才学高低、功力深浅、只要一走入这个磁场就会出现各种盲点效应，仿佛走进一个神秘的黑洞。”

针对这种“东拉西扯，信口雌黄”的说法，栾文批驳说：

“凡是认真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听过毛泽东报告或者与毛泽东对过话的人，都不会不承认毛泽东是语言大师，他的文章和讲话理论联系实际，说理透彻逻辑性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革命进程中，卓有成效地团结全党，发动与组织亿万群众向旧世界挑战。”

“编造毛泽东‘语言迷雾’的慌言，是他全盘否定毛泽东的一种伎俩”。

这种批评是诚恳的、实在的。接下来对那篇奇谈怪论中诋毁毛泽东的“仇父情结”、“复仇情绪”等错误论点，及其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等进行了批评。最后指出：

“在1989年春抛出《论毛泽东现象》等奇文，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这些文章适应了国际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具体表现。”

“ 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决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 ”

江泽民总书记在陈毅同志 90 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充满深情地连续提到毛泽东和毛泽东著作，甚至连毛泽东同志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也作为一件值得追念的大事来提及。这说明毛泽东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他同我们党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同党的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江泽民总书记对毛泽东十分崇敬和信赖的表现。

江总书记对毛泽东同志如此崇敬和情赖，自然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的信仰，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心。我记得，1990 年 5 月 22 日，他到军事科学院检查工作时曾说过：

我们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要充满信心。我个人来讲，既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革命，就忠于这个信仰，我坚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在党成立 7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他说：

“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繁重的国内任务，党必须在理论上更加成熟起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我们深刻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世界形势变化的本质，不被历史长河中的旋涡和逆流所迷惑。我们要在全党普遍深入持久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

他在复刘永安同志的信中还说：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下，作为共产党员，我们都需要不断坚定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积极投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自从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变成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之日起，国际敌对势力就企图用武力把她加以消灭；但未能得逞，遂改变为和平演变的战略。可以说，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今天正处在一个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时代。在国际敌对势力极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深切地感觉到，千方百计地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真心实意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更加重要得多。

我十分赞成林默涵同志的话，他说：

“ 自从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天起，污蔑、诅咒、丑化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就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瓦解革命队伍，欺骗人民群众的惯用伎俩，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挑战的今天，这更是他们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已经证明这是一条真理，我国反和平演变的现实不是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吗？国内外的反动势力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史和国家革命史，不正是从攻击和否定我国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开始的吗？如果把反和平演变比作几道防线的话，第一道防线就是“毛泽东”，敌对势力瞄准、攻击的第一位的目标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始终处在反和平演变的重要地位。

江泽民同志于 1992 年 10 月 12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

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议的勇气和远见。”

然而，有的人对此却不以为然。有的认为“毛泽东”同自己毫无关系，

心目中生活中有没有“毛泽东”都是一样的，自己有了权，有了钱，就是一切，有的人在毛泽东的威名上打“擦边球”，遇到之时绕道走，有的人表面上虽然不敢否定毛泽东，但内心却持完全否定态度，还有的对攻击、诋毁毛泽东同志的言行听之任之。这些都是与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背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许多令人痛心的教训，但最基本的一条是如何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领袖人物，以及如何对待领袖人物遗留的宝贵精神财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恐怕最值得记取的也是这一条，在这个问题上，江泽民同志同邓小平同志一样，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比别人站得高，看得远，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表现出他的英明和卓识，可算是人民心目中当今最理想的领头人。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敌对势力采取种种手段，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阴谋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有没有希望沿着自己选择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并取得成功，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看它能不能正确地对待曾经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政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领袖人物，其中包括领袖人物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同时也包括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许多惨痛的历史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将继续地证明着这一点。

1992年3月15日，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他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又进一步肯定了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100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他还说：“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江泽民同志对于邓小平同志历史功绩的肯定，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伟大功绩的肯定，也包含着对毛泽东的崇敬。因为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等老一辈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的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个伟人毛泽东。

我们说，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能够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能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别人家不幸的今天，不会成为我们的明天，其中关键之一，就在于我们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对待曾经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

党作出巨大贡献的领袖毛泽东，就在于我们能够迎着国内外敌对势力掀起的种种风浪，坚定不移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继续前进。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罢，或者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也罢，我看，就在于是不是真正地、毫不含糊、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条不容忽视的客观真理。在这方面，江泽民同志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早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在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明确提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决心。这就进一步坚定了人们的信念，增强了人们的信心。对我们的前途难道还会有什么疑虑吗？

出于对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崇敬，江泽民总书记很关心他的子女的生活。1991年7月的一天，江总书记亲切接见了毛岸青，邵华、毛新宇一家。他对邵华、毛新宇说：岸青同志小时候生活很苦，一辈子没有享过什么福，身体还不太好，你们要好好照顾

他，使他欢度晚年。邵华向总书记汇报了岸青同志的生活、身体状况。江总书记听了汇报，又看到岸青身体状况良好，很满意。

同时对岸青生活中存在的需要解决的困难，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并特别赞扬了邵华，说她肩上的担子很重，负起了家庭很重的责任。

一年后，又是7月火热的一天。江总书记手持凉扇，冒着夏日的酷暑，利用一个闲暇的时间，带领家里人，瞻仰了丰泽园毛主席故居。他看过颐年堂当年中央开会的地方和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卧室、书房，最后来到东厢房，坐在毛主席当年曾工作的写字台前。曾为毛主席管理图书的逢先知同志和在毛主席身边服务

的其他同志，给他介绍了毛主席工作，读书和生活的情景，他一边听，一边翻阅毛主席曾读过的书籍、手迹。他在寻找伟人的足迹，他在吸收有益的教意。他十分感慨地说：毛主席虽然晚年有失误，但他老人家一身正气，他身上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的良好品德，他具有中国人的伟大气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优秀代表。他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楷模。

邓小平等评说毛泽东

在以往毛泽东在世的日子，由于党的“左”倾思想的错误，有一些老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甚至受到过严重打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如陈云同志所说，仍然是真心诚意的拥护毛泽东，对毛泽东作出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评价。他们的名字不少是大家所熟知的，如：邓小平、杨尚昆、黄克诚、丁玲和王任重等同志。也可以说，他们是被错误的对待的那些人中真心实意的拥护毛泽东、充分地肯定毛泽东、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代表。

邓小平同志——1960年3月25日，在谈到对毛泽东思想宣传问题的时候，他说：“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1977年7月21日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1980年3月19日他说：“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1980年10月25日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重大错误。”1980年8月21日、23日，他在会见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还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

杨尚昆——1986年9月5日，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光辉旗帜。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被关到1976年，确实确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始终认为他上还是想挽救这个局面的。现在有些人觉得奇怪，说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出来工作以后还讲毛主席好。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全面的估价毛主席”。

黄克诚——1980年在中央纪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讲话中，他说：“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丁玲——1980年后，社会上兴起一阵全面否定毛主席的歪风。有外国记者问她：“对毛主席的看法，与过去30年的看法相比有无变化？”她回答：“去年我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写道：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后来有人问我，你现在是否还有这种感情，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文革十年动荡，不能说毛主席没有责任。至于责任有多少，可以讨论，以教育后代。”

请看这几位老革命家的肺腑之言吧。这些话，虽然还都是在 10 多年前讲的，但仍然具有时代的意义。那么，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我们的一些老同志对毛泽东的感情、评价和态度又是如何呢？让我记述一段我亲身经历的事情，用以说明这个问题。

时光已经进入 1990 年。在这 90 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我找到了我生命道路上的新的位置，为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不能辜负亲朋好友和广大读者对我的要求与期望，我要尽我的微薄之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继续写出一点新的篇章。我自己也觉得，在人们的思想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乱了的情况之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还有许多话需要讲明。于是，我就把下文的题目索性定为：《再谈读一点“毛泽东”》。前一篇，即《光明日报》发表的那一篇《读一点“毛泽东”》，是从读有关毛泽东的传记、回忆录讲起的，中心是说通过读他的传记、回忆录，来认识他伟大的一生，那么，这一篇应该讲什么？我想，应该讲通过读他的科学著作，来了解他的思想，来认识他伟大的一生，以及在新的形势下重新评价高举他的旗帜的重要意义。但想归想，写归写，真正把它变成现实，变成文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章采取什么形式和运用什么格调来作，我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我想，在这个题目下，既要有学术文章的特点，但又不能写成完全是学术性的论文，既要有政论文章的特点，但又不能够写成政论性的东西。它应该同前一篇的风格相一致，即学术、政论、文学的特点都兼而有之的思想随笔。这种形式，一方面比较灵活随便，便于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另一方面比较活泼，富有一定的可读性，让人感到兴味，可以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前一篇之所以唤起一些读者的共鸣，除了人们对毛泽东素有的感情在起作用外，恐怕文章采取随笔的形式，大概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吧。

我对《再谈读一点“毛泽东”》这篇文章开始总的设想是，通过读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述，来重新认识与评价毛泽东，恢复毛泽东作为时代伟人的本来面貌。但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通过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来了解我们党的历史，来认识党的光荣和伟大，从而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树立信心，战胜困难，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安定团结，继续前进。把我国的经济搞上去，在当前的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情况下，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关于文章的布局，我是分为三个大的层次来构想的：

第一是讲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雄文伟著，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几十年流血奋斗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它不仅凝结着毛泽东个人一生的心血和汗水，而且也包含着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邓小平等一大群老前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和贡献。它不但纪录着我们党、国家和人民过去推翻三座大山、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指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光辉未来。然而，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他本人一样，在一段时间内遭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对毛泽东同志的议论讲得太重了的时候，竟影响到对他的科学著作的看法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从宏观到微观，都一古脑儿地彼加以否定或歪曲。认真学习和运用毛泽东科学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和科学原理，全面、准确地把握它的思想体系，这才是真正地高举。

第二是讲学习毛泽东科学著作的现实意义。用一句通俗而带有诗意的话

说就是，这是现实的呼唤。一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需要；二是克服党内腐败现象，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的需要；三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搞好四化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发展的需要。在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大逆转、大倒退的历史条件下，读一点“毛泽东”，认真学习与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富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三是讲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要从头开始。这就是说，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毛泽东的科学著作被冷落了多年，有的单位竟连一套完整的《毛泽东选集》也找不到，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这一层次中，我的具体构想是，要着重批驳三个错误观点：一是有人认为再提读一点“毛泽东”，就意味着走“文革”的老路。文中要重点说清，现在学习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进行的，是一条学以致用之路，这条路不是“文革”的路，而是过去革命成功所走的路，是一条胜利之路，没有错。应该放心大胆地走下去。二是批驳有人把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他本人晚年的失误等同起来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失误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但绝不能把他晚年的失误同他的科学著作和他的思想体系混为一谈，更不能将二者划为等号。对这一点应该有个公正的认识。三是批驳“过时论”。有些人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下，唱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的论调，也严重影响着对毛泽东科学著作的学习。这种情况，不仅在青年人中存在，就是在一些中、老年人中间也是存在的。读一点“毛泽东”，关键是个立场和感情问题，立场对头，感情浓烈，并且具有远见卓识的头脑，就不会产生什么“过时”的论调，读起来就会感到亲切有味。

经过反复字斟句酌，将文章大的框架基本定下来之后，1990年元旦，我便正式开始文章的撰写工作。

最初几天，我奋笔疾书，写作进展比较顺利，很见成效。当我看到自己内心的谋划和情感，布满一张张稿纸，由想法变成文字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与自得，并暗自琢磨着完稿的日期。

但是，好事多磨。没有几天，我患了重感冒，发起高烧，四肢无力，头重脚轻，影响了写作进度。但我没有被这点困难吓倒，我想，只要我的手能握住笔，我就要坚持写下去。一边打针吃药治疗，一边不停地写。虽然一天只能写上几百个字，我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坚持着写个不停。等到春节临近，我的病情突然加重，躺在床上爬不起来了。人们都沉浸在节日的欢快中，我却在节假日的三天三夜病卧不起。就是这样，在我清醒了一些的时候，还是牵挂着我的文章。春节过后不久，当我能下地走动的时候，便伏在案边又开始了写作。这样先后经过一个月的时间，算终于按照我原来的框架计划将文章完成了。经过一番加工修改，完稿后全篇文章15000字。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在面前。这样长的文章发给哪一家报刊呢？哪一家报刊肯拿出这么大的篇幅发表我的这一作品呢？即使是题目被人看中，但又有哪家报刊的编辑愿意在这么长的文章上下功夫呢？耗费精力不论，又能得到什么实惠呢？终究是“时代”不同了。于是我产生了有“女”难嫁的忧虑；

然而我没有却步。我首先把稿子发给向我约稿的一家报社的编辑。稿子发出数日，不见回声。我便打电话催问，得到的回答是：一是这类文章不大适合我们报纸专栏的特点，所以你的文章不好用；二是领导说了，我们是全

国有影响的报纸，我们不能带这个头。最后的一句话是：“很抱歉，请谅解！”这些话在我脑海里久久回荡。中央一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再要求大家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怎么一提到学习毛泽东的科学著作的时候，却说不适合报刊的特点，而且还说不能带这个头呢。带这个头有什么不好？难道不适合中央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神吗？难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空的吗？真是咄咄怪事。

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又把文章寄给全国比较有权威的一家党刊。几天之后得到退稿和复信，说：文章写得不错，但理论色彩不浓，经我们研究，不打算刊用，故退回。

这种情况是意料之中的，能够及时退稿并有编辑的亲笔附信，我知足了。

但我并不心灰意冷，北京不行，寄到外地试试。于是，我把

1·257 稿子又寄到石家庄——河北省委办的一家刊物。那里有一位老战友做这个刊物的领导工作，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能得到他的一点支持。又是过了那么几天，我这位老战友回信了：“大作已阅，是费了心劲的，但稿子太长了。我想取一点，但又觉得不好取。现把稿子退给你。如有读史札记之类的，可寄来。”云云，就这样，我的文章又从省城打回了京城。其命运同在京城并无两样。

我望着两次的退稿和复信，掩面深思：投寄两次，全碰了钉子。两家刊物，都是党办的，可为什么就不能在“毛泽东”的问题上，“求实”或“求是”一下呢？难道“毛泽东”成了什么“禁区”？百思不得其解。

我迷惘，我沉闷，我忧郁，但我并不感到孤独。因为我深信，我有成千上万的读者，在支持、在期待着我，有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呼唤，在指引着我。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说得好：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最大的乐趣应该是什么？

那就是为真理而抗争！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1990年元旦创刊的《中流》杂志月刊，想起这个刊物发刊词中的两句话：“《中流》是为对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提议创办的，它本身就是同这股思潮斗争的产儿。这就决定了它的根本性质与使命。”同时我也想起《中流》两位主编——林默涵、魏巍，在“创刊号”上发表的“主编寄语”中的两段话：

“创办这个刊物，主要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目前刊物过多、过滥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一个对文化、艺术、思想领域的问题能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反应。具有较强思想性、战斗性的刊物，为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一个发言的阵地……”

“本着这一信念，本刊将努力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研究、探讨、反映新形势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创作和事业，促进文化艺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基础上的团结。提倡内容、形式的多样化；鼓励探索和争鸣；倡导一种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新鲜活泼的文风。”

想到这些，我心里似乎亮堂了许多，回头再看看我的《再谈读一点“毛泽东”》，顿时觉得似乎有了一点出路。于是，我立刻决定把它发往《中流》杂志编辑部。

这时，已是3月中旬，冬去春来的时节将要来临。气候渐渐由冷变暖了。西山的背阴处，虽然还有些寒气凛凛，但寒冷的那股威力毕竟渐渐地衰竭了。

朝阳山坡处的积雪早已融化在送暖的春风中，被积雪覆盖了一个冬天的许多草根，以它那顽强的生命力开始苏醒复活，奋力地生长了。春天虽然姗姗来迟，但一个真正的春光已经到来。

我把《再谈读一点“毛泽东”》的原稿，原封转寄给《中流》编辑部。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即使不予发表，提些意见也好。很快接到一个电话，是《中流》编辑部打来的，是主编魏巍同志的声音：

“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那篇文章我早已看过了，写得不错！”

“谢谢您的鼓励。”我猜想到，他是指1989年12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我那篇《读一点“毛泽东”》。

“这一篇《再谈读一点“毛泽东”》，我看也不错，是带着感情写的。”

“文章谈不上好，不过带着感情写倒是真的，我看不惯有些人对毛泽东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和做法，我要为毛泽东鸣点不平，我是带着气写的。”

“毛主席说过，只有带着气才会写出好文章，他老人家有许多好文章，就是带着气写的。”

“从这一点上讲，毛主席也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不过，我们写文章却不能和毛主席写文章相提并论，我们很难达到他那样的

党风和文风，毛主席写文章、作诗词也是我们的榜样。”我这样感慨地回答魏巍同志。接着，话头很快转到我的文章上，他说：

“你这篇东西虽然不错，可就是太长了，能不能一分为三，

再加工修改一下，分成各自独立、又有联系的三篇文章。”他略停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这样改，如果你没有什么不同意见的话，改好后尽快送来，我再送林默涵同志和编辑部其他同志着看……”

我遵照魏巍同志的意见，把稿子改好，及时送上，适逢魏巍住院检查身体。据他老伴刘秋华同志讲，他住院前还抓紧时间处理这件事情，住进了医院还在牵挂着这件事。

3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中流》的一位副主编麦辛同志打来电话，声音清晰而宏亮，但是比较陌生。我知道他是抗美援朝的一位老同志，曾在《志愿军报》工作过，之后调《解放军报》社工作，不久前退下来，到《中流》编辑部工作。以前，虽然有过交往，只限于相互间知道对方的名字，他任文艺评论组组长时处理过我的稿子，但从未见过面，打电话这还是第一次。他说：

“你的《再谈读一点“毛泽东”》三篇文章，默涵同志着过了，我刚从他那里取回来。他觉得不错，我们编辑部其他几位同志也有同样看法，我们准备从4月号这期开始，作为系列文章，继去年《光明日报》发表的《读一点“毛泽东”》之后，作为“再谈”、

“三谈”、“四谈”连续发表。

然后，他对三篇文章加的小标题，征求了我的意见，并阐述了他们为什么要刊载这组文章的原因，他说，主要是为了适应社会客观现实的需要，为了追求一个真理：人民需要读一点“毛泽东”，人民怀念毛泽东，人民离不开“毛泽东”。听到这些话，我心中充满了惬意。我想，这叫编者、作者、读者三者想到一块了。

人生，要度过许多个春天。我觉得这个春天过得很是满有意义的，人们游过名山、胜水，赏过许多桃红柳绿的世界，呼吸到许多春风送来的阵阵花香，今天，是不是也会感到毛泽东回归人间的春意？

这天，我打开4月号《中流》，在《再谈读一点“毛泽东”：具有历史意义的巨著》的标题下，是一段编者加的按语，立刻将我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文字不长，写得精粹，富有画龙点睛的妙意。不妨抄录如下：

编者按：环顾“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深知“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人们在“寻找毛泽东热”中，提出“读一点毛泽东”，是很自然的事。

“读一点毛泽东”，要读他的传记，了解他的革命实践，更要读他的著作，了解他的革命理论。传记是他人写的，叙述的事情可能会全面一些，著作是本人写的，表达的意思就更为准确一些。要真正了解毛泽东，要寻找到真正的毛泽东，是不能不读他的著作的。

石玉山同志在去年12月1日的《光明日报》以《读一点“毛泽东”》为题提倡过学习毛泽东革命实践。现在他又以此为题，写出了再谈、三谈、四谈，着重提倡学习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本刊从本期开始，陆续予以刊载，请读者注意。

据说，王震副主席收到这期《中流》后，让秘书把《再谈读一点“毛泽东”》读给他听。秘书同志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念起来。王老听得很认真。听完后，他高兴而深情地说：

“我看，这一篇比《光明日报》登的那篇还好。”还说，“能不能有哪家报纸转载一下！”

后来，《人民日报》较详细地转发了这篇文章的文摘。

由此可看出王老对毛泽东同志的情愫之真切，更可看出一位革命老将纯朴而崇高的无产阶级情怀，真是难能可贵啊！

我也曾试着将刊有我这篇文章的《中流》杂志，送给几位老相识或把它读给他们听。希望听到他们对这件事情或对这篇文章的品评意见。有的很快就十分热情地作出反映，对文章提出他们的看法，好的方面或不足之处都有，使我受益匪浅，从中也披露出这些同志对毛泽东的敬重之情，让人为之感动，但有的却不然，他们对我写的别的方面的文章、作品，品评起来话语滔滔不绝，让人从中受到启发或教益，可是对于这篇涉及毛泽东的文章，却表现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冷漠。是他们没有自己的见解？不是。是他们对毛泽东这位伟人不敬佩？不是。是他们对毛泽东没有一点怀念之情？我看也不是。那又是因为什么？我认为，那是因为他们缺少应有的革命理智，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上有一种莫名奇妙的顾虑或误解。说不定还怕影响到自己的升迁。因此，对毛泽东表现出敬而远之的怪态，毛泽东在他们嘴里成了“禁区”。

这样一来，无形之中，“毛泽东”也就成了评量一个人道德和良心的天平。

然而，广大革命群众对毛泽东仍然富有深深的怀念之情，他们更不会对毛泽东以一眚掩大德。有位身处边远地区的读者给《中流》编辑部写信说，他对《读一点“毛泽东”》这个题目很感兴趣，希望更多地看到这方面的文章。他要重新认识毛泽东，学习毛泽东。

有位老工人给笔者打来电话说，他完全同意我在文章中讲的观点，他认为当前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尤其需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需要恢复被有些人损伤了的毛泽东的形象。他希望更多地看到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宣传毛泽东一生伟大功绩的文章。

离休干部张天锡给《中流》写的信尤其令人感叹。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编辑同志：

您好！

你们工作辛苦了。恕我来打扰诸位。

贵刊再、三、四、五《谈读一点“毛泽东”》（共四篇）和《两次历史性对话的启示》、《这个口号丢不得》，以及其他一些敲起警钟的文章，在我们身居偏僻山沟的老家伙的心里，引发了剧烈的共鸣。不，是代表我们说出了早想说而说了也无人理睬甚至讥之为老古董的正义之言。是的，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重现了阳光，突破了乌云，照彻了迷雾，能够见到你们这样的“到中流击水”的旗帜鲜明，正气磅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的勇士，首先站出来了，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前辈创建的伟大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我心里想到的话很多很多，由于水平低，只能闷在肚子里，表达不出来，请你们谅解。这里寄上邮票 0.80 元，想麻烦你们代为补购一分去年 12 月 1 日的《光明日报》，我急欲一读那张报纸上石玉山同志那篇《读一点“毛泽东”》文章，以窥全文（附带说一句：我已购读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红墙内外》和《毛泽东传》，并传给其他许多同志阅读，先后不下十来人，以致封面弄旧撕破补了又补）。如果找不到此期报纸了，则建议在《中流》上再登一次，我估计，希望读这篇文章的读者可能还有不少。就是你们发表的那四篇，我已经读过两三次，还想再读，并打算推荐给干休所的学习小组，让更多的同志学学，浩气长存，“正义的事业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为真理呐喊，当今仍大有人在。

希望你们多登载些这样的文章。

真是，“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啊，“忧患元元忆逝翁”啊！

致以

敬礼

四川西昌干休所张天锡

1990 年 10 月 12 日

好了，还是让我们把话题拉回到《中流》上来吧。办任何事业都有个成文或不成文的规格，或叫章程，或叫规定，或叫其他别

的什么。办杂志，编刊物，也是如此。《中流》杂志发稿的规定之

一是，根据读者的意见，在三期之内不能重复出现同一个作者的名字。

我的文章在四、五、六月号三期杂志上连续刊发，我的名字在三期内连续出现。看来是大大地破格了，这还不算，为了突

出这个问题的宣传效果，《中流》编辑部决定，约我再写一篇，作为“五谈读一点‘毛泽东’”，在《中流》7 月号上继续刊载。他们的想法是：无论是毛泽东的传记或回忆文章，还是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就是说，无论是他的理论还是实践，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那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且这个问题，也是当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的一个建党建政的基本思想，是值得全党着力发扬的一项优良传统。那么，以这个问题为中心，再写一篇“五谈读一点‘毛泽东’”，作为这组文章的收尾工程，是较为合适的。他们说，当然，这个问题的宣传，还不算完。日后还可以通过别种形式继续研究和宣传这个问题。

我认为，他们的这个考虑是周到的，是合乎实际的，当然也是可行的。

我便从命照办，继续写出了第五谈读一点“毛泽东”，在

《中流》7月号按计划刊发了。我这组系列随笔文章的撰写和编发，从此算打了个“结”。据《中流》编辑部讲，其结果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我想，有的人持一种不同的看法，那也是难免的。因为客观事物矛盾的规律本来就是如此。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养成这么一种习惯，每当我感到满意的文章或作品发表出来的时候，我总是要把它放在案头或贴在墙上，像对待什么心爱的玩艺儿，翻来复去地琢磨它、玩弄它、品味它、欣赏它，真有点沾沾自喜或“孤芳自赏”的味道。对于《中流》刊发的我的“几谈”读一点“毛泽东”也是如此。我把1990年4—7月号《中流》月刊摆放在眼前。一边翻阅，一边回味。我把在上面刊登的我的那几篇“读一点毛泽东”也比作心爱的婴儿。这些文章经过受孕、成长、胎动之后，虽然经受了产前的阵痛，但总算顺利地降生了。

多年的经验告诉人们，宣传阵地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十分重要。如同导弹、飞船、火箭一样，没有阵地、没有发射架就不能上天。一位作家、学者的作品、文章也是如此，如果阵地不在自己人手里，你的作品、文章写得再好，也是徒劳。许多人是吃过这个苦头的。现在的情况以我看可以分为这样三种：

第一种，和前几年没有什么两样，虽然经过班子的调整，但仍然是掌握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的手中。所不同的是这些人的气焰不像原先那么嚣张，只不过面貌有所隐伏、隐匿罢了。这虽属少数或个别，但不能排除。细心观察、体会也并不难发现。他们一旦得势，就会由小打小闹，变成大打大闹，兴风作浪，弄你个天翻地覆。因此，对这种人千万不可失去警惕。

第二种，掌握在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影响（或叫感染）的人的手里。这种人虽然经过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之后，思想有所触动，有所认识，但根本立场还没有彻底转变过来。他们骑在墙上，叫“骑墙派”，时时在观望，在等待，在探寻新的信息。一旦西风硬了起来，这种人马上就会从无产阶级的前沿阵地上退下来，将阵地让出去，或者就在原来的阵地上，把枪口转过来，向自己的兄弟开火。有人也把这种人称为“风派”，即看风转舵的意思。对这种人失去警惕，放弃教育或改造，在关键时刻也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第三种，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支持正义，反对邪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决心毫不动摇。这种人，在当前并不少见，他们构成了党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的中流砥柱，他们就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一切邪恶势力冲锋陷阵的先锋战士。

这些年来，我在有的文化人身上发现，他们往往把在那个动乱的年月，因被批斗或“蹲牛棚”、坐牢，所受的罪，所伤的心，都一古脑儿地记在毛泽东一人身上。说起毛泽东，他们就咬牙切齿，全面否定，就更谈不到全面认识、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宣传毛泽东，继续高举毛泽东这面旗帜了。有几个还成为了反对共产党的“精英”人物。而林默涵和魏巍同志也是现代有名的文化人，说起来在10年“文革”中，也曾是被错误地对待过的人，他们所受的苦并不比那些个文化人在那个时候受的苦少。就以魏巍来说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成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人物，大会批，小会斗，连他

自己也记不清准确的次数，他写的为志愿军树立起高大英雄形象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被造反派们说得一钱不值，简直成了一株大毒草。扫地、涮厕所那些劳动“改造”的事，都让他干过。一家老小也都跟他受了牵连，倒了霉。林默涵在“文革”中所受的折磨不亚于魏巍。

按照有些人的逻辑，他们“否定”毛泽东也是有话可说的吧。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没有把自己所受的痛苦都归罪于毛泽东，他们对毛泽东的感情如鲁迅对刘半农的感情一样，始终未变。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他们不计个人的恩怨与得失，他们都能站在无产阶级战略高度、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认识和评量毛泽东。立场与态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和做法也就不尽相同。

林默涵同志说：“前些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时候，有些自以为高明，其实是无知的人不正是以给毛泽东同志抹黑、给党抹黑，给我们国家和民族抹黑为荣的吗？对此，我们只能说，一个渺小、卑屑的心灵是无法认识一个伟大革命人物的。……然而，千秋功罪要由人民评说！就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一些人公开诋毁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卫士长谈毛泽东》等书所掀起的毛泽东热，即反映了人民对毛泽东同志的怀念之情。”他还说：“德国一位哲学家曾说过，要评价一个人物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躯体的大，其法则相反，后者距离愈远愈小，前者却愈远愈大。毛泽东同志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在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中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强国的斗争中，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将永远捍卫、坚持并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创造的毛泽东思想。”

这就是一个曾经被“毛泽东”打倒过的人对毛泽东的态度。“而魏巍同志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同他的同事们除了积极宣传毛泽东之外，他对毛泽东认识也是非常正确的，感动人的。我曾多次当面聆听过魏巍同志对毛泽东的评价。他说：

首先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几十年来，他都是我们党的领袖和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同我们党的历史，中国革命近代的历史，同我们党和军队的缔造，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都是分不开的。究竟该怎样来评价他，怎样来评价毛泽东思想，这不是个纯感情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我们的革命史，关系到今后我们的道路和发展方向。

在人的一生中，总是会有缺点和错误的，即使一个伟大的人物也在所难免。我们评价一个人，要严格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看。既不因为他的成绩掩盖他的错误，也不能因为他的错误，来否定他的成就。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和公正的。

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绝对不能否定。如果否定，那就势必要否定我们党，否定马列主义，否定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牺牲奋斗所获得的一切。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可能会使中国历史出现难以想象的大曲折、大倒退和大悲剧。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从毛泽东同志身上，确实可以看到一种卓异的品德。正像鲁迅先生所说，他确实是一个“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而且长期的斗争证明，他是一个胆略过人的伟大的革命家。魏巍后来把这些话写成纪念文章。他还说：在 10 年动

乱中，大家都身受其痛。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受害更重，时间又拖：得大长，留下的创伤自然会很深。他举文艺界老前辈丁玲、石油、部一位叫张永一的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吃了许多苦，但毫无怨恨之心为例，来说明问题。其实林默涵和魏巍他们自己的事例不是也很感人、也很能说明问题吗？在以后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大肆泛滥的日子里，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旗帜依然是那么鲜明，在人们“寻找毛泽东”、提出“读一点‘毛泽东’”的时候，在“毛泽东回归人间”的过程中，他们和他们的编辑部，又无私无畏地做了那么多有益的、促进的工作。对此，有谁不从内心感到敬服呢！

就在我这篇随笔定稿之前，我又听魏巍这样说：“我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问题，过去不知想过多少遍，现在想得更多。不只是一遍、两遍，而是几十遍、几百遍……。总而言之一句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丢。这是一件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这就是他们能够正确对待毛泽东、评价毛泽东、宣传毛泽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出发点。

当我的笔锋运行列这儿的时候，我想起一位电影工作者说的一段话。他这样说：

10年前的一个春天，为拍《胜利油田在胜利前进》的电视片，我们摄制组乘直升飞机从脚下这方土地，一步登天，由北镇大桥直奔黄河口。从天上看地下，只见大不见小，观全貌而不辨细微，黄河扇状般地舒展身姿，金链般地穿过顺其东流而不断拓展的两岸大地、最后缓缓地汇入渤海融入蓝天，在河与海的交合处，色彩由红而褐，由褐而蓝，无穷的变幻是任何油画大师都描绘不出的。黄河闯尾，其势之宏，其貌之壮，是登临五岳，梦游天姥所无法领略的。

我看，我在本章中提到的邓、杨、黄、丁以及林、魏等人就像那位电影工作者站在高空看黄河一样，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来看毛泽东、来对待毛泽东的。从而看到了毛泽东的全部历史、看到了毛泽东伟大历史形象，看到了毛泽东崇高的历史地位。进而涌起了高举和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的浩气与决心。

请问，他们如此执着地宣传和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有何重大的现实意义呢？有人可能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有的。它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大得多。概括地说来，至少有以下三点：

其一，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他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代表着我们党和国家的过去，又意味着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按照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指引的方向走下去，很好地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大有希望。

其二，人民怀念毛泽东，人民崇敬毛泽东。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是鼓舞人们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巨大力量。有人说得好，毛泽东活在世上时，他离不开人民；他逝去后，人民心中又少不了“毛泽东”，只要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长在，人民的思想就会产生强大的凝聚力。

其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发展、继续前进的需要。如果把马克思开创到迄今为止的国际共运，比作一条长河的话，那末今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就是这条长河的潮头，目前国

内外反动势力对这条长河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和攻击。我们对这种破坏和攻击，绝不能有丝毫地让步。如果我们从毛泽东让到列宁，再从列宁让到马克思，那就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路可走，就等于到了背水之战的危险境地。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今天重新认识毛泽东、评价毛泽东、宣传毛泽东，继承和捍卫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就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否则别人的今天将会变成我们的明天。

泰戈尔先生说得好：真理之川是从他的错误之沟渠中流过。毛泽东所代表的伟大真理之川，也是从他的错误沟渠中流过来的。这既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必然。今天宣传毛泽东、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曾被“毛泽东”打倒的人们，能够站在历史的、战略的高度，在“寻找毛泽东”的群众热潮中，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毫不含糊地树立毛泽东的英雄形象，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自然正是适应了这种历史的必然。其意义不可低估。

跋

《毛泽东回归人间》这部书稿，前面请魏巍同志作了序。这，无疑对广大作者朋友品评或阅读此书，以及如何看待当前毛泽东回归现象，是个很好的借览。但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内心还有一些话，想通过跋文，向读者朋友作点交待。

《毛泽东回归人间》一书，是进入 90 年代以来，笔者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围绕“毛泽东”这个主题，撰写的系列随笔。

集子中的文稿，虽然撰写的时间有前有后，但内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如何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周恩来同志说，毛泽东的方向始终是对的，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笔者正是遵照这些教导，用心撰写这些书稿的。

“毛泽东这面旗帜不能丢”，是现实生活做出的回答。通过笔者个人写作的一段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一些社会现象，证明毛泽东已被更多的人重新认识，在社会上出现了“寻找毛泽东”、

“读一点毛泽东”和“毛泽东热”等等，那么一股可喜的暖流。

这股暖流，无疑展示了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回归人间》还有《九九消寒图》的含义。从冬至后第一天算起，每九天叫一九，九九共八十一天。图中从冬至起，画家日画素梅一枝，共画八十一花瓣，不着色，“而逐日渲染其一，图成而九九尽，天气转暖，寒气消除，春意到来”。以此比喻毛泽东回归人间，要经过的正是这样一个由寒变暖，“九九消寒图，逐步形成的那么一个过程。从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周年的热烈气氛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回归人间的春意，的确具有洒遍神州大地的样子。但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影响之下，围绕毛泽东所造成的许多错误的思想认识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纠正，许多迷惑和疑难问题，也仍然需要进一步澄清，对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低毁、诽谤和辱骂更需要“回敬”，从爱护党和国家的事业的愿望出发，尽笔者之所能，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随笔的形式进行了论辩或评述。它虽然是肤浅的，但却是中肯、坦诚的。

随笔的特点是，它含有诗的意境，报告文学的风格，政论的锐利，散文的文笔，特写的手法，通讯的简洁，杂文的语言，甚至还有小说的柔情。这些，在写作中我都想尽可能多地吸收一些，以便送给读者较多一些的“可读性”、“知识性”或“趣味性”。但又都不够。不过，在写作这些随笔作品的过程中，我对自己有个起码的要求，这就是要用自己的眼力观察问题，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要述写自己的心怀，要描绘的是自己的思想面貌和自己的内心世界。按照西方随笔作家的要求，随笔写的成与不成，就看是不是“像”自己。说真话，抒真情。一句话，写的是不是自己的真情与实感。我的这些随笔如何呢？那就有待读者来评品了。我看，要想写好一篇或一部随笔作品，成为一个合格的随笔作家，是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人们说，报告文学是文艺的轻骑兵。我说，随笔这种文体也可称之为文学艺术的轻骑兵。我喜欢报告文学，不时也在这片土地上挥洒一点汗水，但我更喜欢随笔。我觉得它行笔更为潇洒自如，可以记叙，可以描绘，可以抒情，也可以议论。高声呐喊，或低声细语，都可以任人调节，选题也很广泛，采取阵地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方法，忽而东，忽而西，不论是自然科学领域

还是社会科学领域，不论是军事领域还是文学艺术领域，到处是它驰骋的广阔战场。取材较其他文体就更为方便，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亘古其间，到处都是它的原料产地，甚至一片废纸，一则故事，一声广播，一句格言，一个镜头，都可以为它所用。我就是常常以随笔为武器，用它来进行人生的拼搏的。有时我还把报告、散文、杂文、纪实和传记文学等文体，也作为随笔来看待，来使用。

如果归类，随笔还是散文的一种。

每一本书的作者，都有自己写作的目的和读者对象。那么，我这本《毛泽东回归人间》是写给谁的呢？在动笔之前就有个打算。它是写给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奋进在四化建设上的人们的，是写给那些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们的，是写给那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为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作出不懈努力、尽了一分心意的人们的，当然，也是写给那些愿意了解毛泽东、认识毛泽东、学习毛泽东的青年朋友们的。同时，又是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而撰写。为了纪念和学习毛泽东，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读者朋友提供一点有益的借鉴，应该说，是我始终不渝的写作追求，也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人民作家应尽的义务。

1983 年 1 月于北京西山寓所

